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路径 魏礼群 (005)

城乡一体化是最大的新动能 郑新立 (010)

• 国际经济 •

金融危机的逻辑思辨与现实观察 黄志凌 (016)

德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经验借鉴 宋 群 焦学利 (033)

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及危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陈金明 任再萍 李国菊 (044)

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动态视角 李勇坚 (059)

BEPS 方略下的国际税收新秩序及中国应对措施 甄 真 (074)

非洲国家投资政策与环境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程志刚 李 蕊 (083)

中国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研究与探讨 朱 杰 任超锋 (093)

• 宏观经济 •

建设循环城市，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杨 亮 陈波平（104）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3）



CONTENTS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China’ 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in the future	<i>Wei Liqun</i> (005)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largest new momentum	<i>Zheng Xinli</i> (010)
Logical thinking and realistic observa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i>Huang Zhiling</i> (016)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of Germany nursing service industry	<i>Song Qun , Jiao Xueli</i> (033)
The evolution and crisis of the Wall Street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i>Chen Jinming , Ren Zaiping , Li Guoju</i> (044)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s service industry: a dynamic perspective	<i>Li Yongjian</i> (059)
New international tax order and China’ s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strategy of BEPS	<i>Zhen Zhen</i> (074)
The influence of African countries’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i>Cheng Zhigang , Li Rui</i> (083)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how to financially support “going out” enterprises in China	<i>Zhu Jie , Ren Chaofeng</i> (093)
Constructing recycling c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Yang Liang , Chen Bopingi</i> (104)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路径

魏礼群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不确定性因素加大，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中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未来时期总目标是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主要方向和任务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消费结构调整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同时，必须选择好路径，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环节。

关键词：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 方向路径

作者简介：魏礼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社会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复苏乏力，已连续五年低于1990—2007年期间的平均增速。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不确定因素加大，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也不会相同。在中国，未来时期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更为丰富。概括起来说，就是持续深入推进三大转变：一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模式创新；三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这三大转变，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加大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力度，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但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繁重和艰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处于特别重要的历史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又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还是我国经济爬坡过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全局和战略上看，在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必须紧紧围绕和用力抓住全面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这条主线。2015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80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但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和经济增长效益低、供给体系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又在于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转型升级迟缓。如果不加快经济结构性调整 and 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稳定增长，更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和质量增长。

那么，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和方向任务是什么？笔者认为，总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主要方向任务应当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正与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形成历史性交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快速发展，必须运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运用新技术大幅度提升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智慧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水平，并催生新业态、新制造、新资源、新物流，使它们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化任务。第二，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又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特别要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布局、形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到 2020 年，实现“三个一亿人”的目标：即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 1 亿人居住的棚户区 and 城中村改造，引导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同时，要使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新农村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第三，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和社会风尚，持之以恒地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中国建设。第四，加快消费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随着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中高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需求趋于多样性、高端性、康乐性，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将成为我国消费

结构变革的大趋势。第五，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着力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而导致环境污染，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真正走出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集约创新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第六，加快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着力促进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提升服务贸易比重，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当前，特别要在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方面也要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破题发力。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回旋余地。问题在于，由于供给侧的政策体制不合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突出。这就需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不动摇地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政策举措。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要着力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供需结构协调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一项紧迫性的任务，又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需要既积极又稳步地推进。

未来时期中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选好路径，最重要的是把握好两大环节。

一是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更高形态、更好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发展基点和重点放在创新上，为中国经济注入创新的基因和动力，加快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催生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必须让创新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能转换。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合理的发展结构，特别要在补发展短板上多用力，在薄弱领域增强发展后劲，重点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深化开放中增强发展

新动能和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好保障基本民生，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互相贯通、相互促进，要全面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只有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开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格局、新境界。

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滞、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较低、经济活力动力不足等，主要症结在于经济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实现根本性转变。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大工夫、硬工夫、真工夫，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这样，才能显著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中，要着力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第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严格规范两者的职能边界，该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要彻底放开放活，不留尾巴，不搞变通；该由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要认真行使权力，不松懈、不敷衍。各级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全面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使之更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提高简政放权的实效，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引导、规划、调控、监管作用，努力实现灵活有效市场和正确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既考验智慧，也考验魄力。

第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要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让各类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竞争的主体、创新的主体。政府要顺应世界潮流和客观规律，制定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划、法规、政策、标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必须继续大力推进企业改革，尤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提高活力与效率；同时，进一步引导、支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要从法令和制度上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各类企业家的安全感和信心度。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幅员辽阔，发展又很不平衡，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要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从国家发展全局制定规划和大政方针，统筹重大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鼓励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和积极性。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应当按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涉及面广，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中国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包括已建立起坚实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拥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源。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会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挑战和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准备好务实有效的应对之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经历阵痛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不断升华的过程。

中国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不仅对我国当前以至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治理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成为世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话语将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力量。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治理的主张，达成“杭州共识”，就是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作出的新贡献。

当今世界经济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哪一国家单独能够完全解决的，不仅需要依靠国际政府间的全球治理协调和行动机制，还需要加强各国民间组织以及智库之间的合作交流，以有力推动全球经济创新增长和治理体系变革。

责任编辑：艾 冰

城乡一体化是最大的新动能

郑新立

摘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从理论认识到政策措施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实现了三次大的转换。当前，应重点抓住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带动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的重点在于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需要厘清认识上的误区。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新动能 改革开放 经济结构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后，我国经济遇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突出的是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动力不足。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从理论认识到政策措施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结构转换是形成新发展动能的源泉

在经济发展的长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从而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果因为体制僵化，阻碍结构转换，不能释放新的发展动能，经济增长就必然减

缓甚至停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实现了三次大的转换。

第一次结构转换，是 20 世纪 80 年代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伴随乡镇企业崛起，带动了国民经济的起飞。改革激发了蕴藏在几亿农民中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巨大潜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大幅提高。同时，针对工业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状况，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满足市场需求，仅用十几年时间，就一举结束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短缺经济。这次结构转换的特征是农产品、轻纺工业产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使最终消费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迅速提高，改变了长期以来经济结构“重重轻轻”和农业发展滞后的扭曲状态，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能，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次结构转换，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带动了经济的腾飞。1993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体规划，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激发了经济活力。同时，“九五”计划提出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使之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 8% 迅速提高到 25% 以上，改善了居民的居住和出行条件，降低了电子机械、石油化工产品对进口的依赖。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的比重由 50% 左右提高到 70% 以上，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三次结构转换，是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债券，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国民经济出现了长达十年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仅用十几年时间，我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通车里程就跃居世界第一位，大学招生人数增长 10 倍以上，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并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结构转换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只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打破思维定式和体制禁锢，为结构转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把社会资金引向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才能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二、推进城乡一体化将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2015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 8000 美元，但要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 1.2 万美元）还有一个大台阶。许多国家在这个台阶前徘徊了几十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能不能顺利跨上高收入台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活力的考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进入高收入行列的

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成功地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同，城乡居民收入基本拉平。凡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城乡发展差距明显存在，长期得不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矛盾中，城乡发展差距大是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定和影响其他矛盾。诸如区域发展差距的矛盾，本质上也是城乡发展差距的反映。中西部的城市与东部的城市相比，没有什么差距，主要是中西部农村落后于东部的农村。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2.7:1，浙江省为 1.7:1。在全国城乡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要想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很难做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4 月 30 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城乡一体化问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提出要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五化”的提出，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目标和指导原则。当前，应重点抓住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带动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发展。

劳动生产率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农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大农业，提高农业供给效率，是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由此将释放出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服务业的巨大需求，拉动农机、化工等农用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对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将提出巨大需求，由此将拉动水利建设的投资。

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城市相比，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结合村庄整治和新型社区建设，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释放对建材工业的巨大需求，逐步使农村成为美丽宜居、令人向往的地方。

全国目前共有 2.8 亿农民工，以及 6000 万留守儿童、4300 万留守妇女、4000 万留守老人，共 4.1 亿人口处于全家分离状态。实现全家团圆是他们的梦想，也是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的需要。通过提高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城市保障房和公共服务，将释放巨大的城市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除了城乡一体化之外，当前我国经济中还有一些新动能亟待释放。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通过推行 PPP 模式（公私合营），运用财政投融资和政策性金融，引导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发展交通、通讯、环保、教育、医疗、市政、养老、文化、旅游等事业，有着巨大的投资空间。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税制改革，鼓励第三产业发展，能够使第三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积极实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正方兴未艾。当然，这三个方面与城乡一体化相比，显然城乡一体化是能

量最大的新动能，调整城乡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性要求。如果说改革以来已经经历的前三次结构转换及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蓄势待发的以城乡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结构转换，必将为未来十几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新动能。

三、聚焦城乡一体化改革才能释放最大新动能

城乡结构调整需要改革来推动。习总书记最近指出，改革要“精准对接发展所需，精准对接基层所盼，精准对接群众所想。”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正是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群众所想的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的重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农村土地公有制如何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国有企业对所占有的国有资产以法人财产权，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经营主体，从而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同样，赋予农户对所占有的承包地、宅基地以法人财产权，就可以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性质的前提下，使土地的用益物权成为可以转让、整合的商品，从而为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为此，需要对农户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确权颁证。农户有了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能够从法人财产权的出让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就会根据机会成本选择自己经营土地或转移经营权，从而让土地经营权向合作社、农业公司、种田能手集中，为发展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进城农民在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及其房产，就能从市场交易中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为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

二是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016年国务院8号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全面实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精神的具体贯彻落实。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有大批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大批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必然伴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同时，由于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高，单位建设用地所容纳的人口，城市比农村高3倍多，这就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节约和耕地的增加。根据测算，全国现有2.5亿亩宅基地，如果能够实现宅基地及房产的商品化，可减少农村建设用地50%以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是增加的。我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调整政策应当与这一进程相适应。特别是前30多年劳动力的流动是全国性的，

沿海地区吸纳了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只有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全国各地城乡之间进行建设用地的调整，才能使农村因人口减少而闲置的建设用地及时退出，用以满足城市新增人口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抑制房价上涨。退出农村建设用地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用于在城市购置住房，不动产随人口的流向实现空间和价值形态上的转移。唯有如此，生产关系的调整才能称得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就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势在必行，刻不容缓。重庆地票市场的试验是成功的，如能扩展到全国，必将取得巨大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是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长期以来，由于城市的各类生产要素已经市场化，而农村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房产等还没有市场化或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就产生了一个虹吸效应，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源源不断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资源却流不进农村，长期单向流动的城乡市场，是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城市的资本大量过剩，房价一涨再涨；而农村的资本严重短缺，房价便宜得难以想象。如能以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经营权为质押，在“十三五”期间，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 20 万亿元，投入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农村面貌将发生巨大变化，不仅为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提供保障，而且将有助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到 2022 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是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重庆市近几年已有 300 多万农民进城落户，市政府为进城农民送了一笔“安家费”和五件“新衣服”，即退出宅基地拿到一笔钱，进城后可以享受到市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子女入托入学政策和所有市民的公共服务。重庆作为一个西部山区城市，财力并不宽裕，尚且能够为农民工市民化做这么多好事，沿海城市财力比西部雄厚，农民工为本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理应拿出一定财力支持农民工市民化，不能把为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会保障当作一种包袱，甩给农民工输出地。沿海城市要增强竞争力，也必须有一支稳定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把农民工留下来，是本地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加快城乡一体化需要厘清几个认识误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理论和部署，关键是要把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的精神上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当前，需要厘清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必须破除农村土地两权分离是搞土地私有化的认识误区。恰恰相反，由于找到了土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使之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从而能够更好地坚持农村土地的公有制。确认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把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农户凭借对土地的承包权，可以获得经营权转让的财产性收入。中部有些农村把每亩土地的年转让费定为 1000 斤小麦的市场价，很有创意。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按照重庆的交易价格为每亩 20 万元左右。这里所转让的是用益物权，不是所有权，所以土地的公有制性质不变。

必须破除城市资本下乡是掠夺农村资源的认识误区。恰恰相反，只有确认农村资源的市场化地位，才能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不动产增值的财产性收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生产要素总是朝着获利较多的地方集聚。农村生产要素有了交换价值，才能吸引资本进入。资本又是要素流动的龙头，资本流向农村，其他生产要素就会随着进入农村，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必须破除城乡一体化会冲击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认识误区。恰恰相反，实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可以减少农村宅基地的浪费，根据经验，退出的宅基地至少 40% 可以用于增加耕地。至于占好补劣等问题，可以通过建立耕地质量监管等制度加以解决。

必须破除解决三农问题主要靠财政投入的认识误区。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吸引大批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进入，才能迅速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面貌。目前，用于三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达 10% 以上，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已经尽了很大的力。应当把对三农的财政支持方式由补贴为主改为引导为主，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入农业农村发展。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经济 ·

金融危机的逻辑思辨与现实观察

黄志凌

摘要：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过剩导致价值循环受阻，再生产难以为继，引发经济衰退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继而信用违约集中爆发使得金融机构大面积倒闭，最终产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特别是 2007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则表现为宏观政策催生的经济泡沫在紧缩货币政策下迅速破灭，大规模信用违约导致金融危机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引起经济衰退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基于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及中国经济现状，梳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讨论现阶段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特点及需要关注的要点，结合全球经济现状，得出了短期内再次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概率极低的判断。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 金融风险 宏观审慎 预期管理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就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逻辑关系而言，传统理论认为，生产过剩导致价值循环受阻，再生产难以为继，引发经济衰退亦即经济危机，继而信用违约集中爆发，致使银行大面积倒闭，导致产生金融危机。然而 2007 年美国爆发的危机则展现出另一种情形，宏观政策催生出的经济泡沫在货币紧缩政策下迅速破灭，由此引发行业性信用违约并酿成金融危机，继而金融机构破产与债务工具急剧减少波及其他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循环受阻并最终引起经济衰退亦即经济危机。2015 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全球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忧充斥论坛和专业媒体。为此，我们开展了对于金融危机逻辑与现实判断的深入思考。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逻辑思辨

纵观经济发展史，尤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贯穿始终。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理论。与此同时，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方法和路径也逐渐地系统化和清晰起来。18世纪初，约翰·劳将纸币引入欧洲，刺激了信用市场的飞速发展，法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但随后法国政府错误地运用股票超额发行，使经济进入不正常的上升轨道，股市暴涨拉动工业呈现虚假繁荣，最终狂热投机导致的泡沫还是破灭了，银行信用迅速萎缩，资本大量外逃，脱轨的繁荣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在整个18世纪，英国经历了大大小小18次经济危机，似乎每次繁荣便意味着接下来会出现经济运行脱轨。进一步观察，每一次经济脱轨导致的经济危机都会得到自我复苏，甚至多数情况下经济都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但在每一次复苏后，新的危机又出现，并再次摧毁经济。这种经济危机具有怎样的内在逻辑？为什么经济具有自我脱轨而后再复轨的能力？亨利·桑顿从信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信用体系是内在不稳定的，增加或减少信用都具有非常大的欺骗性，因此非计划的信用收缩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也就是说，信用问题导致了经济运行脱轨，而经济自我复轨的根源也是基于信用修复。

1826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纸币与商业困境》中提出了“竞争性过度投资”的理论，认为商人们对需求的过高估计可能很快演变成供应过剩，同时引发大量的投机，从而使得原本繁荣的经济走向完全脱轨。随后发生的危机间接验证了穆勒理论。1837年美国的经济萧条更多地表现为脱轨的繁荣，对于土地的投机使得经济进入了不正常的上升轨道，房价出现暴涨，这种严重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和严重依赖土地的政府财政在1837年初出现断裂，繁荣最终崩塌。

早期研究者发现了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多个踪迹，包括货币因素、实际因素以及信心、恐慌等。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理论本身值得商榷，但却验证了另外一种现象，即某些事物本身虽不能对经济直接产生影响，但却能改变一般人的预期从而产生间接影响。瑞典教授古斯塔夫·卡塞尔认为利率可能在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高利率是触发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庇古则从心理因素的角度给出了解释，认为“破产很少毁灭资本，但会造成恐慌，而这才是重要的因素”。丹尼斯·罗伯逊认为，“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再投资的浪潮造成自然利率出现变化，从而导致经济不稳定”。霍特里在《商业的盛衰》中把经济周期归咎于货币供给的波动，经济繁荣最终会走向脱轨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和内在的货币不稳定性相互作用。冯·米塞斯相信，“由信用扩展带来

的经济繁荣最终出现崩溃是无法避免的”。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则再一次证明，金融行业的无限制发展带来了畸形的经济结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虽然表面辉煌，实则积聚了极高的风险，最终演变为严重的经济危机。^①

传统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包括：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失业激增，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或倒退。而在现代经济中还越来越表现在货币和金融领域：利率上升，投机大量出现，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破产，股市受到重创。从本质上讲，存货、资本性支出、房地产建造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它们通过利率和资产定价的变动来共同影响经济运行。存货增加是工业增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存货库存水平通常反映着企业主体对未来需求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决定了存货投资的周期性；对于收益的预期促发资本性投资浪潮，与实际需求渐行渐远，最终引发投资急速下降，带来周期性；房地产投资也是如此，初期的供应紧张意味着租金与销售价格的大幅上涨，与利率相比较高的资本化率和投资收益率使得对于房地产的投资趋向疯狂，同时也带动了股票、艺术品等其他行业出现繁荣，但最终房地产建设出现严重过剩，消费者支出超出限度，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信用崩溃，房地产市场从繁荣走向脱轨。对房地产、存货及资本性设备的过剩投资、过度杠杆化的消费者、随之发生的债券紧缩、现金偏好以及流动性陷阱相互重合，繁荣便走向脱轨，最终形成经济危机。

在这整个周期中，一些因素还具有“加速器”功能，如货币、心理和情绪、资源耗竭、信用崩溃等，它们能够使得繁荣加速迈向脱轨。从其内在机理来看，对于存货、房地产和资本性设备的投资和实际需求的差异难以避免，而人类心理因素所发挥的“负向作用”也无法消除，经济繁荣走向脱轨具有必然性。

周期性繁荣必然伴随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被证实，也被重视。但许多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状态下出现虚假繁荣并由此产生的恶性经济危机，似乎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一些国家依靠某些部门或产业的极端表现，呈现了虚假的繁荣，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部风险加速积聚，畸形结构愈演愈烈，最终走向危机。观察其特定的表现形式，除利率上升、投机大量出现外，还包括：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单个部门（如投资、消费、出口等），泡沫经济膨胀，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历史上关于脱轨的经济繁荣例子有很多，比如 17 世纪 20 年代发生于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拉美经济危

^①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同金融体系的演变有着直接关系，金融体系中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也就是常说的影子银行，从规模和重要性方面都超越了传统银行，导致监管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最终从流动性危机演变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机、21 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等。虽然畸形结构也可以带来非常规的经济繁荣，但过度消耗经济潜力、过度损伤经济系统正常机能、过分掩盖经济系统内部矛盾的“不健康”辉煌，最终只能走向崩溃，而这种崩溃很可能带来损失更加巨大、伤害更加猛烈、恢复更加漫长的影响。

这其中，前苏联的例子可谓“生动贴切”和印象深刻。依靠强大的国家意志，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极端重视重工业和军工产业，轻视轻工业）、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技术结构等问题被长时间掩盖，经济发展甚至呈现了较长时间的繁荣。但是这种畸形模式下内部积聚的矛盾与日俱增，最终经济崩溃，政治体制颠覆，走向了不可逆转的结局。

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也是造成脱轨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这在现代经济中尤其突出。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形式，实际上是依附于实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转移市场运作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其超常发展极易引发投机，呈现出一段时间的繁荣，但同时也导致大量资本从事非生产性投资，资产价格泡沫化，经济发展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带来危机。2007 年次贷危机是一个典型例子。过度膨胀的金融虚拟经济带来无节制的金融工具创新，与实体经济越走越远，最终积聚巨大风险并导致信用崩溃。

除了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外，其它泡沫经济也是脱轨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房地产泡沫和互联网泡沫。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房地产建造成本应逐步下降，但是房地产价格却不断上涨，带动整个经济呈现繁荣。房价上涨的过程就是泡沫不断积累的过程，当房价大大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时，泡沫就会破裂。一旦房地产危机爆发，房地产吸收流动性的功能将逐步丧失，实体经济中其他资产的全面通胀也将随之爆发。1998 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房地产泡沫就发挥了极为负面的作用。互联网泡沫更是脱轨的经济繁荣的生动体现。对于互联网产业的过度投资和过高估值给经济带来了“非理性繁荣”，但同时也掏空了对其他行业的投资。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也证明了畸形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短暂繁荣必将走向终结。

从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大规模经济金融危机来看，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总是相伴相随。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先后顺序关系？是经济危机在前还是金融危机在前？从历史上看，历次危机呈现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以 1882 年银行股票投机引发的法国经济危机为界，以前的经济危机大多数始于实体经济领域，而后再传导至金融领域；而 1882 年以后的则几乎全部都是先发生金融危机再引发经济危机。

以 2007 年至今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为例。一开始风险集中于房地产金融领域，房地产泡沫不断扩大致使美联储不得不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由此引发整个行业性的信用违约，^① 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众多金融机构，迅速升级为金融危机。到 2008 年下半年，危机又向实体经济大面积蔓延，迅速引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萧条，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种先金融、后经济的危机演化方式也见于 1907 年、1929—1933 年、20 世纪 70 年代、1997 年、2000—2001 年等历次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但在 16—19 世纪，经济危机则大多始于实体经济某一领域的生产和投资过剩，价值循环受阻，发生经济衰退，而后引发信用违约，银行倒闭，由此扩散到金融领域。比如 1793 年英国经济危机是始于运河投资泡沫，1857 年全球经济危机始于铁路投机，其他历次危机所涉及领域还包括羊毛纺织、粮食贸易、采矿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全面论述过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普遍性生产过剩，实体经济出现问题导致银行信用违约，引发货币危机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这个理论能够非常好地解释 16—19 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危机，但是与 20 世纪以后的情况却好像并不那么相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实际上 20 世纪以后所出现的情况并未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进入 20 世纪后，金融行业获得快速发展，越来越扮演起实体经济基础的角色，同时也成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各项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种投融资工具和风险产品延伸至国民经济的每一个微观领域，货币及资本与生产、消费的每个环节都紧密结合。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通常都能反映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创新带来的高杠杆和风险链条又会使得这些问题不断放大。由此，危机的爆发总是首先发生于金融领域，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或金融恐慌，但其根源却还是实体经济领域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美国各行各业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金融行业为了帮助实体经济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更是为了从中获取超额利润，就设计出一系列远远高出民众实际购买力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假的消费能力导致信用链条过长，带来了高杠杆，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表面上看，次贷危机属于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但实则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实体领域出现的问题在金融领域首先爆发，反过来又加重了实体领域的问题，不断演化，由此产生经济金融系统的全面危机。

^①房价下跌引爆一大批金融产品与工具的风险触发，直接触及设计软肋，出现流动性危机，传统机构与影子银行，创新产品与工具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撼动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体系对经济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金融领域的一些产品创新便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这些创新一方面大大提高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但另一方面也积聚了风险，使得金融体系更加脆弱。那么我们到底是要这些创新还是干脆不要？以资产证券化为例，它能够有效增加社会融资总量，但却使得风险传播更加快速，对金融危机具有加速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资产证券化能够使存量风险流量化，具有非常好的资产负债期限匹配和风险分散及转移功能，可以说这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证券化，金融在加速资金流动、提高配置效率方面的功能将大打折扣。

资产证券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创新，它并不会自己创造风险，而风险总是来自于实体经济中的标的资产以及对证券化工具的错误运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好金融创新。首先，从资产标的来说，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须明确只有那些有现金流支持、价值可以评估、风险可以计量的资产，才能作为证券化的标的资产；^① 其次，要对标的资产的价值做到准确评估，估值过高是产生风险的重要原因；再次，要对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做到充分揭示，防止对投资者产生误导，从而积聚风险；最后，须明确资产证券化与资产交易或债权交易有本质区别，资产或债权交易可能都是大宗的、批发的，但证券化的资产交易不一定是批发的，涉及零售性质的证券化交易还是会承担零售性质的风险，例如雷曼迷你债券。^②

二、对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几点思考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各类金融风险也开始凸显，近年来外界对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言论不绝于耳，以至于我们“谈虎变色”，对金融风险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我们所要力图避免的是金融危机而不是金融风险，要防止的是金融风险失控，演化成金融危机。当前我们需要格外关注政策调整的操作风险、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尽快从体制、机制、政策和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做好预案，防止这些风险最终演变成为金融危机。

（一）我们要力图避免的是金融危机而不是金融风险

有许多人谈论如何避免金融风险，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金融机构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避免了风险，金融机构也就失去了生存基础和存在的意义。也有人说金融危机是周期性的、不可避免的，其实这种观点本身也是充满争议的。观察 20 世纪以来的若干次国

^①这次出问题的证券化资产主要是可证券化资产，如抵押贷款、信用卡等。

^②准确地说，雷曼迷你债不是证券化产品，而是结构化产品，具体说来是信用衍生品。

别层面的、区域性的、特定市场的以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都是有先兆的，如果相关政策当局及时、正确应对是可以化解的，至少可以降低危害程度。

历史上大部分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均是由以下两种原因引起的：一种是未被发现的金融风险，当其集聚到一定程度，出现系统性违约、流动性丧失、机构大量破产等，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第二种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虽已被识别，但在化解过程中，由于错过最佳政策时机、操作方式和政策力度不当等原因，反而引发恐慌，放大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金融风险的识别与监测，并通过合适、合意的政策操作来降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的幅度，谨防出现断崖式的剧烈波动。政策当局在进行个案监管惩罚，试图给某些市场主体以教训时，尤其需要警惕由于考虑不周全，反而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那么，如何把握好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这个“度”呢？如何辨识金融危机呢？至少应注意把握三个特点：第一，金融危机不同于金融风险，不能简单化。金融危机一定是金融风险集聚及处置不当引发的，但金融风险不一定最终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只要有金融活动，就有金融风险，金融风险能否转化为金融危机，取决于风险的扩散度、风险的消除度、风险的承受度等因素，即金融风险是否会转化为金融危机，有一个量的集聚与恰当处置的问题。第二，金融危机一定是金融市场大幅度萎缩，但市场大幅度萎缩不一定是金融危机。这里有一个时间因素，如果金融市场在较长时间内出现了被动性萎缩，即便是萎缩幅度很大，也不一定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在较长时间内，各个市场参与主体有空间和时间进行自我判断和主动消化。反之，如果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市场出现了断崖式萎缩，则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第三，区别恐慌与趋势性悲观判断。针对市场变化，市场主体做出趋势性悲观判断，并开始自我调整市场行为，进而导致市场交易量的萎缩，但只要与流动性无关，就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如果市场主体不是出于趋势性悲观判断，而是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中，则一定会引发流动性危机，进而诱发金融危机。悲观性预期引发的市场长期萎缩和下行，并不能通过市场干预、政策刺激得到彻底解决，只能从改善基本面入手，辅之以预期引导。但市场恐慌则不同，必须及时干预，这是国际经验。对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一书中提出：在当前这场危机的直接诱发因素中，最显著的两个因素就是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但这场危机之所以导致付出如此惨重的经济和金融代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恐慌本身，可以说，恐慌造成的代价不会小于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造成的代价。

对此，我们也有过惨痛的教训，2015 年的中国股灾就是例证。第二季度股市泡沫迅速增加并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引导更高的投资预期；2015 年 7 月初股指连续大幅度跳水，

监管当局突然失声，市场开始恐慌，以至于流动性完全丧失，在此基础上被迫仓促推出的救市措施，被强大的市场预期所淹没。错失时机，缺乏预案，应对失当，风险最终演变成危机。关于这次股市危机影响的认识分歧很大，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看，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是投资者信心遭受严重挫折，使股票市场功能丧失，直接影响经济恢复进程；二是市值急剧减少产生财富萎缩效应，直接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三是市场操纵行为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市场情绪有可能演变成社会情绪；四是中国股市虽然开放度不高，但对国际金融市场仍会产生较大影响，间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中国现阶段最值得关注的金融风险之一，是在政策调整和市场监管过程中“目标与行为背离”导致市场无法预期，加剧市场波动，加大金融风险

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已逐渐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市场价格变动成为明显的经济运行信号，但是中国的宏观调控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敏感性和前瞻性，严重滞后于市场变化。通常在市场价格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调控政策却迟迟不作调整，反倒是等到滞后的经济金融统计数据公布之后，才开始进行宏观调控，导致市场主体对宏观调控政策无法预期，以至于市场开始进行反向观察，去猜测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背后原因，而不是去分析政策出台后可能带来的影响，最终导致政策效果欠佳，甚至是适得其反。

我们试图学习欧美日等国的宏观调控手法和艺术，但市场至今也没有找到政策关注的核心指标与目标，有些反复强调的指标，但后来的政策调整几乎与这些指标没有关系，最终的结果只是强化了政策权威的神秘感，降低了透明度，反倒是加剧了市场波动。如“8·11 汇改”，虽然大家都知道汇改的方向，但市场主体却不知道央行的最终目标所在，导致政策出台之后，汇市剧烈波动；还有股灾发生前，证监会清理场外配资，市场主体也同样知道方向，但却不知道证监会清理配资的目标何在、清理到什么程度、清理哪些配资，都是含糊不清；另外银监会的很多政策操作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我们的宏观调控部门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不让市场主体摸清底牌，担心市场主体提前做出调整，从而削弱了政策效果。这种自我证明政策价值的思维是非常有害的，从历次的实践来看，往往在政策出台之后，市场主体在短时间内去消化调整，导致市场的剧烈波动，而宏观调控部门似乎还很乐见这种政策的突然性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乐见这种“看得见”的市场反应。监管部门的“方向正确、目标不清”，除了思维方式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数据基础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金融统计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虽然法律明确赋予央行金融数据统计职能，但实际上央行也仅仅是

掌握部分的银行数据，致使央行无法根据金融统计数据对市场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进而导致政策出台的滞后性和目标不清。

反观美、欧、日等国的宏观调控，除了设定明确的政策目标之外，也加强了对预期引导的管理，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设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再通过官员、专家等给出预期性言论，让市场主体对政策的出台有所预期，不仅可以提前自发调整适应，而且也减少了市场主体的政策风险，进而实现政策预期目的，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美联储通过对政策工具的清晰界定、对政策调整时机所应具备条件的明确解释，以及定期通过每季度的议息会议，及时公布会议纪要等手段，使政策调控的意图被市场所预见，从而有效引导市场预期。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一直维持超低利率，对于调整时机，则明确提出三个数据门槛：通货膨胀、就业指标和产能利用率水平。欧洲央行原本拒绝做任何“预先承诺”的政策宣示，但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尤其是市场预期被美联储有效“引导”的情况下，果断开始“预期管理”。日本政府在安倍上台后，“预期管理”成为实施“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抓手，安倍曾多次要求日本央行设定 2% 的通胀目标，进而提升市场对股市上涨、日元贬值和通胀上升的预期。

总而言之，当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已成为发达国家调控经济、提升调控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时，中国政府也因时应势，依据自身情况推出自己的预期引导措施。一是预期引导应建立在研究分析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大量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才能对当前及未来的形势进行合理的判断，这是进行预期引导的基础。二是明确预期引导的量化指标。预期引导需要有相应的指标来度量、来统一市场的预期，需要构建系统性的量化指标，并明确量化标准目标，而非含糊其辞。三是增加金融调控政策透明度，加强与市场的沟通。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透明度本身就是强化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与市场的沟通，可以更好地让市场形成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合理预期，并以此做出决策。四是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在市场对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形成预期，并做出决策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合适的时机出台。如果出台不及时或出台政策和市场预期不一致，就会导致市场产生较大的波动性，同时也会对后续的政策预期产生负面影响。

（三）现阶段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金融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应该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越来越复杂，但国家层面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不够，更不用说有效监测与形成应对预案。

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跨市场风险传染不一定是多米诺骨牌，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网状传播。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已经深刻吸取了教训，在重点防范系统

性金融风险方面形成了一些新的监管理念与模式。金融危机后，美国强化了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责，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基础设施划归美联储监管。英国主要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核心作用，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宏观审慎监管，设立金融审慎局（PRA）和金融行为局（FCA）共同负责微观审慎监管。

目前，我们缺乏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专门研究，缺乏对市场风险的预警、监测，尚无应对市场风险的整体机制与体制安排。“自己孩子自己抱的时代”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的市场风险事件，我们不知道是谁的孩子，该由谁来抱。同时，即使自己的孩子都管好了，也不一定不发生金融危机。如果按照旧有的监管框架和思维，很容易出现监管空缺，或者犹豫错过时机，以至于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又随意指定责任，最终由于没有经验积累，只好简单化处理，这样势必放大风险，甚至引爆危机。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迫在眉睫。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逆周期调控机制。一是继续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二是增加资本监管制度的逆周期要素，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动态调整资本充足率；三是建立逆周期的信贷调节机制，平抑信贷周期；四是注重新工具的开发和运用，如拨备要求、杠杆率和流动性要求等，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通过完善逆周期调控机制，在金融体系中设置“内在稳定器”，释放系统性风险。

其次，要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规模巨大，且与其他机构和投资者的关联性强，具有较高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一旦陷入困境，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导致危机迅速升级和扩散。为此，应强化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督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降低风险集中度。

再次，要扩大金融监管范围。一是将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近年来比较活跃的“新金融”纳入监管范围。这些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产品在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刺激整个金融系统的过度信用扩张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为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多潜在风险；二是要加强对金融体系内机构与市场间关联性和溢出效应的评估。由于金融市场中的“合成谬误”，众多单个金融机构符合监管要求的一致性行为可能会诱发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此外，鉴于高杠杆会直接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美国去杠杆对其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要注意区分宏观杠杆与微观杠杆的差异，前者是全社会非金融部门负债与国内生产

总值（GDP）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一个负债主体的资产负债率或负债的净资产倍数。宏观杠杆与金融结构有关，而且调整金融结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千万不可操之过急。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不要搞运动式去杠杆，但必须承担部分企业破产重组或破产清算以后的社会保障责任；对银行要加强资本约束，出资人和经理人必须真正为放纵经营行为承担责任，防止系统性风险；对企业则要加强信用约束，使投资人和经理人承受切肤之痛，实施投资人和经理人承担法律责任的真正意义的破产重组或依法破产，打击“跑路”等失信行为。

三、关于近期（2016—2017 年）再次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判断

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虽然比 2014 年有所下降，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增长势头强劲，日本欧洲经济趋于平稳，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似乎也在接近谷底。然而进入 2016 年以后，全球各大股市连遭重挫，大宗商品市场“跌跌不休”，国际油价更是频频刷出新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攀升和债券市场违约频现，尤其是英国脱欧更是让全球经济蒙上浓重的阴影。基于以上种种，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子，宿命论的“金融危机十年一个周期”（1987 年美国股市崩盘、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众多围观，金融危机即将来临不断见诸媒体。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一般与国别或者经济体因素有关，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市场都必须具备足够大的经济与金融体量；近年来虽然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但由主要经济体自身经济问题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很低。

（一）美、欧、日等经济体复苏困难，但总体趋稳的态势基本确认；中国经济地位虽然更加重要，问题也很明显，但难以成为全球危机策源地

虽然美国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 2016 年其经济复苏态势有望进一步延续。一是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失业率已从 2009 年 10 月危机时的 10% 回落至目前 5% 以内。虽然短期非农就业新增人数有时不及预期，但主要表现为短期波动，就业向好趋势仍未改变。二是在低利率、加息预期以及就业市场持续好转等多重因素推动下，2016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增长态势有望延续。三是低油价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将逐步显现。美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中长期看，油价下跌对美国整体经济影响利大于弊。四是美国政府支出、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具备提升潜力，美联储预计 2016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 2015 年。

欧洲经济虽然因英国脱欧事件的影响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不会出现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严重衰退。一是得益于低油价、弱势欧元以及欧洲央行采取的积极货币政策

等因素，欧元区经济将不断趋稳。二是内需增长成为推动欧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盟统计局数据也显示，欧元区和欧盟的家庭消费支出、公共部门支出都在恢复。三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有所改善。在经济复苏带动下，欧洲各国失业问题有所缓解。欧洲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2015 年失业率比 2014 年明显下降，为 2011 年 10 月以来最低。欧盟 27 国 2015 年失业率也处于 2009 年 6 月以来最低点。

受益于日元贬值和宽松货币环境，日本经济总体平稳。整体上，日本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运行平稳，且经济景气动向指数也维持在正常高位。失业率一直较低，就业市场接近全面就业状态。更值得重视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逐渐提升，工业产量有复苏迹象，且出口也小幅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高，破产率降至历史最低。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大幅提升，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杠杆率水平攀升引起市场担忧。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今非昔比，如果发生债务危机，甚至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策源地。然而，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抑或是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这些担忧在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目前中国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高杠杆和泡沫化问题，但政府层面早在两年前就开始着手解决这类问题，如加强地方债管理，清理股市场外配资等。此外，加强金融监管模式调整，整治各类以理财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行为等，都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尽管中国还面临人民币贬值、部分地区房价较高与房地产库存过高并存等压力，但当下的中国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的日本、次贷危机发生时的美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一是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和资本市场有序开放，保证了人民币汇率风险不会失控。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状况。预计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速将运行在 6.5%~7.5% 的区间，构成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支撑。随着利率市场化完成和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后，资本项开放有所提升，但多数资本项仍实行管制。而且，外汇储备仍然充裕。中国外汇储备从 2014 年的高点 3.99 万亿美元下降到 2015 年底的 3.3 万亿美元，但仍是全球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对于保障中国金融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房地产泡沫问题与美国次贷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住房按揭市场目前首付三成的总体杠杆是合理的，而美国曾出现过 5% 甚至零首付的情况；中国金融衍生产品规模相对较小、复杂程度较低，而 2008 年次贷危机时，美国在房贷上搭建了几百倍乃至上千倍的衍生品市场，造成了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当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保持着最基本的形式，中国商业银行尚未大面积创新个人房贷金融衍生产品，不足以对金融体系造成致命伤害。三是债务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政府债务仅占 GDP 的 50% 左右，且与美欧日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主权债务的本质区别在于政府支出中投资占比很高，大多

数债务都对应相应的资产，而且中国中央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是其他国家政府无法比拟的。

（二）全球银行业监管持续加码，风险管理得到强化，银行体系风险正在逐步得到抑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监管改革不断推进和强化，银行体系的风险管控要求全面收紧。一是监管标准和强度大幅提升，提高资本质量与资本覆盖面及其资本要求，其中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最高可达 24%。^① 这些监管措施正在倒逼国际银行业去杠杆，改善经营，充实资本实力。二是强化银行的风险治理，提升银行审慎经营的理念和能力。要求完善战略管理、集团组织架构、控制环境、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责和薪酬要求，公司治理政策程序必须与银行的风险状况、系统重要性相匹配，内部定价、绩效考核要与风险挂钩，及时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报告、控制或缓释所有实质性风险。三是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系统性重要银行监管，确立识别标准，增加附加资本要求，提出恢复与处置计划要求，建立跨境监管机制等，进一步降低“大而不能倒”机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监管加码不断迫使国际银行业想方设法改善经营，提升资本实力，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银行体系风险出清。一是通过各种手段补充资本金，强化损失吸收能力。例如，汇丰银行在 2009 年增资 178 亿美元；巴克莱银行 2009—2014 年度通过股票增发、可转换债券转换普通股的方式补充资本约 169 亿英镑。二是调整业务结构，剥离非核心业务，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如，花旗银行 2014 年贷款发放量降低约 3%，同时也在削低贷款承诺并减少西班牙、希腊等国家的业务及风险敞口，降低风险加权资产 298 亿美元；汇丰银行从 2011 年至 2013 年处置了 63 个非战略性业务和非核心投资，包括关闭或出售拉丁美洲业务、约旦银行业务、美国人寿保险业务等，削减风险加权资产 950 亿美元，较 2010 年底减少 9%；巴克莱银行在 2014 年将 Barcalys Global Investors（BGI）出售给 Black-Rock，出售所得税前收益为 63 亿美元。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监测报告显示，^② 截至 2015 年 6 月，一级资本超过 30 亿欧元的国际性活跃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分别达

^①根据 FSB2015 年 11 月 9 日发布的监管文件，2022 年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即资本十自救债）应不低于风险加权资产总量的 18%（2018 应不低于 16%）。对于单个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说，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最高可达到 24%（18%TLAC 最低要求+2.5%留存资本缓冲+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要求 1—3.5%）。

^②Basel III Monitoring Report, BCBS, March 2016, www.bis.org.

到 11.5%、12.3%和 13.9%，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已不存在缺口，而在 2011 年 6 月时，其充足率水平分别为 7.1%、8.6%和 10.6%，核心一级资本缺口达到 4856 亿欧元；标杆率的平均水平从 4.4%提升到 5.6%；流动性覆盖率（LCR）平均水平则从 90%提升到 124%，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平均水平则达到 112%。从结果来看，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已得到较大改善。

从危机后各国的监管实践来看，对银行的监管益发严苛，客观上有助于提前化解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例如，美国提出的“沃尔克法则”和全面资本评估与评审（CCAR）要求。沃尔克法则禁止银行从事自营性质的投资业务，以及禁止银行拥有、投资或发起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核心是让银行在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界线。这对于美国乃至国际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及盈利结构将产生直接影响，将加快银行体系的去杠杆进程。CCAR 则要求银行在不同压力情景下对损失与收益进行动态估计，对资本进行前瞻性规划，以保证银行在各类压力之下仍有足够的资本保持正常运作。根据 2015 年美联储的评审结果，31 家银行有 28 家获得通过，其中，美国银行获得有条件通过，主要原因是在收入的建模和内部控制方面有一些缺陷。德意志银行信托公司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美国分公司未获通过，主要原因是存在为数众多而重大的缺陷，包括治理架构、风险识别、计量和加总过程、收入和损失的预测、内部控制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这对于银行全面强化风险管控、增强经营的稳健性起到了强制性的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释放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三）中国风险总体上可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动能有限

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超出国际一般水平，经济景气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势必带来更大范围企业违约，系统性风险不可避免。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高与中国经济结构有关，不能依此低估中国债务市场健康水平。

首先，正确理解债务违约风险很重要。标准普尔违约定义包含：债务到期时，债务人在宽限期内未偿付债务。最常见的“宽限期”为 30 天或者更短。因此，标准普尔的违约定义大体上等价于“30 天限期支付”的违约定义（标准普尔的违约定义与国内银行业的违约定义有所不同。差异主要在于标准普尔的违约定义更为严格，即宽限期为 30 天，而国内银行业的宽限期为 90 天）。关于政府债务风险：影响政府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治理、财政收入、财政管理、预算管理、流动性和债务负担水平等。评估政府债务的风险是否可控，一般采用政府在债务期限内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政府债务。该指标越

高，风险越小。政府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关于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影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是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其中企业的偿债能力受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竞争实力、经营环境、盈利水平、营运效率、负债水平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影响居民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就业情况、收入支出情况、可支配收入、房价变化和居民存款情况等。

其次，对中国债务违约风险宜做技术观察。其实，中国社会总体债务水平并不高。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数据，虽然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比重达 123.1%，但政府债务占比、居民债务占比仅分别为 57.8%、36.4%，显著低于多数主要经济体。总体债务水平（政府债务、居民债务以及非金融企业债务之和与 GDP 的比率）为 217%，位于中等偏低水平，远低于日本（400%）、西班牙（313%），亦低于法国（281%）、意大利（259%）、英国（252%）、美国（233）、韩国（231%）、加拿大（221%）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高与中国经济结构、历史因素、居民风险偏好等密切相关。中国金融市场欠发达，债务融资占比高而直接融资占比低是历史形成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仍然体现为企业负债水平高。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晚，IPO（首次公开募股）、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股权融资耗时长、费用高、信息不对称、结果不确定，导致融资综合成本较高。而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债务融资方式效率高、耗时短、程序便捷，综合成本相对低，是企业青睐的融资方式。中国企业高负债结构与居民风险偏好程度低相适应。长期以来，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风险偏好较低，2015 年末总储蓄率仍然高达 47.6%，而商业银行具备较强的吸储能力，有利于迅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是企业债务规模快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企业的违约概率与 GDP 增速有较高相关性。我们观察到，金融危机以来，GDP 增速从 2010 年的 10.5%，逐步降到 2015 年的 6.9%，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确实在逐步攀升；但 2015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已趋于平稳，经济增速稳定在 6.5—7.0% 区间，企业违约概率从 2015 年四季度也开始逐步企稳，至 2016 年 6 月底，违约率比年初出现小幅回落。预计将来亦不会有大的波动。观察企业债务风险变化，应着重关注违约概率，而影响违约概率的主要因子是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而不是债务占 GDP 的比重。决定企业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的主要因子是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从数据上看，近年来中国工业主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非但没有恶化，大部分行业的负债率还呈好转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41 个主要工业行业资产负债率情况，2014、2015 年底分别有 28、27 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上年末，其中最大降幅分别为 4.3%、3.6%。

此外，就目前市场十分关注的信用债风险而言，也应前瞻性、技术性观察。2016 年

以来，虽然信用债市场主体评级下调数量呈逐月升高态势，且国有企业及央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级别下调的名单上，煤炭、钢铁、有色等产能过剩行业较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调发行人信用级别的次数也达 150 家，主要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可以看出债券市场信用发行主体的风险并没有表现为系统性特征，而是出现了结构分化局面，投资者对城投债的偏好不降反增。随着经济改革和债券市场调整的深入，预计未来仍将存在一些违约个案的发生，但违约总体风险相对可控，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债市违约潮，出现系统性债务偿还危机的概率很小。当然，对产能过剩行业个别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还是要高度关注。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杠杆问题并不十分严重，非金融企业总体债务风险可控。因此，经济总体运行将处在平稳区间，短期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更不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

（四）虽然总体来看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很小，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将明显上升，市场参与者仍需谨慎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由一个国家的货币或一个金融市场紊乱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该货币或市场必须有足够的动能。比较而言，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交易货币的占比也非常低；资本市场的开放度有限，资本市场波动、汇率波动还不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但是，2015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频繁波动，投资者出现“草木皆兵”“惊弓之鸟”“快进快出”等几个趋同的行为变化。预计未来市场波动会更加剧烈，在短期内将对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形势下，各类金融市场投资者在投资交易时，越来越重视对波动的应对。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伴随着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必须重视交易风险，也必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把握更多交易性机会。

从主要金融市场利率走势来看，长期利率下行趋势确立，投资交易业务面临新机遇。全球范围内通缩大势已定，长期利率下行趋势随之确定，短期内很难逆转。在此判断下，市场参与者可有四点应对策略：一要增加主动投资。目前金融机构客户端的风险暴露得比较充分，为其加大主动投资提供了可能。二要加大交易性金融业务发展。全球货币政策在应对通缩方面“无力化”特征明显，但各国央行实施逆向操作、加重通缩政策的概率极低，整体货币环境有利于商业银行加强交易性金融业务发展。三要加大国债、地方政府债投资。该类债券不仅违约概率较低，而且在资本占用、税收等方面具有优势，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四要加大对优质企业信用债投资。在信用债投资方面，除了考虑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外，更应该关注发行体的经营表现，尤其是 2012 年以来收入利润增速持续

高于 GDP 增速的企业，商业银行可加大对其信用债投资力度。

虽然全球经济处于复苏进程中，但近期金融市场波动反映出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对全球经济前景不宜过分乐观。中长期而言，需要格外关注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四种货币汇率走势，一旦其中之一发生颠覆性变化，可能诱发全球货币危机。但就目前这四个区域的经济基本面来看，还不存在四大货币颠覆性变化的基础。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将进入区间均衡状态，即围绕 6.6 为中心上下 5% 的区间波动，突破 6.3 和 7 的概率低于 1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变化对于全球经济恢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元又是全球最主要的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希望美国财政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美国经济恢复的客观需求，也要充分考虑其可能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的影响。

此外，通缩时期商业银行应更注重对风险的弹性管理。在通胀与通缩时期，大型银行的风险策略有较大区别，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便是物价状况。通胀时期，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上升，当通胀到达顶点并进入消退期，银行的信用周期也开始滑向低谷。因此，通胀时期商业银行风险策略应该更加侧重刚性管理，设置风险限额等指标体系，密切关注企业的信贷风险变化，提高信贷风险定价能力，防患于未然。而在通缩时期，商品价格走低意味着企业贷款抵押物价值缩水，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其风险策略应更加侧重弹性管理，即注重宏观趋势分析，适当调整风险偏好，寻找发展趋势向好的行业、客户、产品，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运行和市场走势的变化。未来几年会出现大量企业并购重组的要求与机会，相应中国股票、债券和票据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商业银行应积极参与由此带来的业务机会，尤其是投行业务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伴随着信贷市场中大型客户融资需求将越来越多地由股票、债券和票据市场满足，商业银行信贷市场的客户重心需要更多侧重中小型和个人客户。

责任编辑：沈家文

德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经验借鉴

宋 群 焦学利

摘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就中德养老护理培训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选择了三个试点城市：承德市、自贡市和贵阳市。该项目计划执行四期培训活动，培训对象分别为试点市养老院、医院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卫生护理院校老师和学生、养老院护理人员和医院的护士等。2015 年分别完成了两期培训。通过培训和调研发现，由于我国养老护理体系不健全，制度建设及政策指导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了养老护理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亟需借鉴德国的相关经验，并进行顶层设计，推动我国医养结合的养老护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德国 养老护理 经验借鉴

作者简介：宋 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咨询专家、研究员；
焦学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总监。

一、德国发展养老护理服务业的主要特点

德国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国家，目前人口约 8300 万，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 23%，而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9%。预计到 2050 年，德国人口将下降到约 7000 万，超过 50 岁的人口将超过 50%，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德国总人口的 35.5%。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伴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进程，德国步入老年化社会，养老护

理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与政府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德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养老护理体系与制度，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形成了多元化的养老护理服务体系

根据德国社会发展需要及制度基础，德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养老护理体系。

一是从养老护理机构来看，已形成了多元化机构并存的发展格局。2013 年底，德国养老机构总数 25775 所，其中养老护理机构有 13030 所，约占养老机构总数的 50%；在养老护理机构中，私立机构 5349 所，约占 41%；教会及慈善机构 7063 所，约占 54%；国立机构 618 所，约占 4.7%。德国从事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有 12746 所，其中私立机构 8140 所，约占 63.8%；教会及慈善机构 4422 所，约占 34.7%；国立机构 184 所，约占 1.4%。鉴于德国的社会制度及市场化程度高，其养老护理机构主要以私人机构与社会化的教会及慈善机构为主。

私人养老院收费最高，主要服务对象是富人。一般而言，私立养老院的设施更为先进、齐全，娱乐项目更丰富，护理水平更高。公立养老院收费最低，接纳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因此，只具备基本的设施、提供最低标准的服务。而慈善组织的养老院价格居于两者之间，其设备和服务处于中等水平。由于公立养老院床位有限，而且入住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所以多数人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慈善机构或社会组织办的养老院。无论是哪种养老机构，政府均提供相应的补助，每个床位给予 16000 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

二是从从业人员来看，养老机构服务人员要统一接受专业培训，队伍建设稳定发展。德国很重视养老护理人员的队伍建设，从业人员都要接受统一的专业培训后才能上岗，入门严格，因而队伍比较稳定。2013 年，德国护理从业人员有 1005524 人，约占总人口的 1.2%，其中养老护理机构 685447 人，占护理从业人员的 68.2%；居家上门服务机构 320077 人，占护理从业人员的 31.8%。

三是从养老方式来看，已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与职业护理机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为辅助的三位一体模式。根据法律规定，德国人 67 岁退休。由于德国生活费用不高，而养老金相对丰厚，因此退休后的老年人较为富足。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工作压力，也不需要承担抚养儿女的责任，日子过得比较滋润、放松。一般到了 75 岁，德国人开始选择如何养老的问题。事实上，去养老院安度余生的老人只占 75 岁以上人口的 33%。多数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也就是老年人自己在家中居住，靠养老金和存款度日，他们依旧居住在自己原有的居所内，依靠周边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护理服务，并提供日间护理中心和短期托老服务。

另外一种形式是“社区养老”。这种养老方式则居于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养老之间。老年人搬离原有老旧住所，入住社区内居家服务公寓中，公寓整体采用无障碍化设计，另附加许多老人服务硬件设施，如电子信号器等，相比原有的住所更适宜老人养老，并且也提供相应的上门护理服务。社区养老的好处是，老人生活在社区之内，不脱离社区的人际关系，而且还可以在社区内组织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如今，这样的社区养老形式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认可和欢迎。

2013年，德国共有260万人接受护理。其中，家属亲友居家养老约45%，机构养老约占30%，职业护理机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约占25%。

（二）养老护理服务已纳入法制化轨道

德国养老护理服务的法制化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4年德国老年救助委员会发出一份鉴定书，该鉴定书从那些生活在养老院中无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出发，对老年保险系统要确定老年人从业时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功能提出质疑。于是，如何立法保障生活困难的老年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1980年联邦政府委托成立的专门小组在认真考察各种不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将护理需求作为应对新的生活风险纳入国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立法目标。在此背景下，1985年《护士执业法》得以出台。该法对护理的任务、职业标准、教育训练、护士的资格和权利、义务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在此基础上，1994年德国颁布了《护理保险法》，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护士执业法》和《护理保险法》是德国护理事业的奠基石。特别是《护理保险法》实施后，对德国的养老护理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为养老护理从业人员提供了法律保障。据保险公司估算，法规为护士增加了两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也为护士建立自己的家庭护理机构铺平了道路。该法颁布前，德国护理行业也并不吸引人就业，这与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低与工作辛苦有很大关系。护理保险法保证了护理费的来源，提高了护理人员的收入；同时，由于护士人数的增加，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对工作的满意度也随之上升。德国护理保险的广覆盖性（法定护理保险覆盖92%的人口，义务性的私人护理保险覆盖人口约占7%）也客观上要求有一支庞大的护理队伍为之配套服务。目前，德国护理行业从业人数高达100多万，雇员人数超过德国汽车工业雇佣人数（70万人）的总和。二是对护理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护理人员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护理保险法》对德国医院护理管理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规定医院要设立护理院长或护理部主任，只有接受过护理高等教育和管理专业培训的人才才有资格担任。护理人员除护理院长（主任）外，还有护士长、高级护士、注册护士、助理

护士 4 个级别。注册护士以上资格的护理人员才能直接护理患者，助理护士只有为护士或医师做一些准备和协助配合工作。同时，对住院护理的 3 类护理患者的护理时间及护患比都提出具体规定，如规定 2、3 类患者的护患比为 1:4，1 类患者的护患比为 1:2.5（或 3）。三是对护理管理的监控系统提出要求。为了提高护理的效率，法规对护理机构的管理监控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各病区都要有终端与主机联网，护理院长或主任每天都要审阅各科室的护理信息；还可随时开通监控电视系统观察各科室护士的工作情况；并能与各病区双向交流，能应病区护士长要求及时调配护理人员等。

（三）护理保险是养护制度与政策体系的主体

护理保险是德国“第五大支柱”险种。按照“护理保险遵从医疗保险的原则”，即所有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但国家公务员、法官和职业军人由国家负责，他们患病和需要护理时有专门人员负责并承担有关费用。除此之外的所有公民则纳入法定护理保险体系，但对于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的人，或者每星期工作不足 15 个小时，且在原联邦州月工作时间仅为 15 小时、月收入在 610 马克以下或在新联邦州月收入 520 马克以下的人，不用交纳保险费，学生的临时性工作也不必交纳这种保险费。

保险税税率的确定按照投保人的收入计算，1996 年税率固定为 1.7%，在原联邦州（西德）每月税费为 6000 马克，在新联邦州（原东德）每月税费为 5000 马克；1999 年西德和东德分别为每月税费 6375 马克、5400 马克；保险税一半由投保人支付，另一半由雇主支付。

德国法律赋予德国养老企业双重任务，即养老护理和医疗护理。养老护理采用养老保险补贴政策，并按护理级别给予补贴。护理保险补贴又分为居家养老补贴和机构养老补贴。居家养老补贴（护理保险）分为四级，即：0 级，231 欧元/每月；1 级，468 欧元/每月；2 级，1144 欧元/每月；3 级，1612 欧元/每月。机构养老补贴（护理保险）分为四级，即：1 级，1064 欧元/每月；2 级，1330 欧元/每月；3 级，1612 欧元/每月；4 级，1995 欧元/每月。在此基础上，针对老年痴呆症（失智症）的老人，每个级别的补贴金额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护理保险补贴只承担基础护理和家政服务。医疗护理费用由医疗保险 100% 承担。此外，德国政府为扶持养老护理企业，还对其实施免征营业税和消费税的优惠政策。

（四）护理教育多元化与高质量

德国的护理教育已有 160 余年的历史。目前，德国的护理教育有 3 个层次：中专、专科培训、大学本科。德国的护理教育以中专为主，现有公立护士学校 943 所，接受护理教

育的最低要求是完成 10 年的基础教育，入学年龄为 17 周岁。德国的继续护理教育，也称专科培训，主要是为临床培养专科护士，其资格由地方政府予以确认。全德国有 50 所护士学校开设了继续教育有关专业，所设专业主要有重症监护、精神科护理、手术室护理、癌症护理、社区护理和公共卫生等。德国的大学护理教育起步较晚，1992 年开设了护理科学、护理教育学、护理管理学的学士专业，但发展比较快，目前有 8 所大学招收本科生。Agneskarll 护理研究所是德国一个可以招生、培养护理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人员的研究所。

为保证各个层次护理教育的质量，《护士执业法》对护士生的学制、学时都有明确规定。中专护理教育的学制为 3 年，课时不少于 4600 学时，其中理论课 1600 学时、实践课 3000 学时。专科护理培训根据各州有关法律要求，可脱产学习 2 年，也可在业余时间学习 3~4 年，学时 3000 课时，其中理论 2200 课时、实践 800 课时。大学水平的学位课程为全脱产 4 年制，非大学水平的学位课程为全脱产 2 年制。护理教育考试大纲由国家考试委员会统一制订，考试分笔试、口试、实践 3 部分。其中实践评分占重要比例，主要是护士与患者的交流能力、专业能力、应变能力等。如果某一项考试不及格，允许有第二次补考机会；若仍不及格，就取消继续学习的机会，不容许再学护理。通过考试者由学校颁发欧盟承认的毕业证书和护士职业许可证。

二、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已经进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阶段，老年人口具有规模大、来势猛、占比高、分布不均衡等特点。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达到 2.22 亿，占人口总数的 16.1%，其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1.44 亿。随着老年人口的迅猛增长，对养老护理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发展养老服务业既有利于形成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又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社会压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13 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35 号文）、《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0 号文）等政策性支持文件，对推动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各地区由政府、社会民间和企业等多种主体参与，由养老院、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托老所、养老机构、老年宜居社区、老年公寓等多种养老护理模式组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

老服务体系正在初步建立，老年消费市场初步形成，老龄事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制度体系逐步建立

截至 2015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均出台了实施意见，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制定了养老服务专项地方性法规，各地陆续出台居家社区养老补贴、养老信息化平台、购买养老服务等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 30 多个配套文件，提出了明确的支持发展举措。比如，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方面，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在价格政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创新投融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在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方面，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在医养结合方面，卫计委、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方面，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在土地使用方面，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在加强督促落实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业发展工作。

目前，全国有 19 个省份建立了高龄津贴制度，23 个省份建立了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全国普遍推广实施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制度、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扶助制度。各省均出台了老年人社会优待政策，在交通出行、医疗卫生服务、文体休闲等方面对老年人实行优待，老年人社会福利和优待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建设规划（2011—2015）》，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08 亿元，带动社会投资 300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连续五年投入，支持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进一步要求各地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大政府投入和土地、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发挥价格、税收、政府购买服务等支持作用，促进社会资本愿意进、进得来、留得住、有效益。

（三）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迅速推进，规模扩大，结构改善，质量提升

“十二五”时期，全国养老床位数达到 669.8 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达到 30.3 张，比“十一五”末增长 70.2%，重点改善了老年养护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敬老

院的条件。全国建有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840 个。15 个省份举办了不同类型的老龄产业博览会。江苏、天津、浙江、重庆的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超过 50%。全国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高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持续增长，专业养老护理人员队伍不断扩大。42 个地区开展了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8 个省份开展养老服务业产业试点。

例如，从我们调查的承德市情况来看，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95 所，总床位 17491 张，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60 所，床位 14151 张，公办养老机构和床位分别占总数的 63.16% 和 80.9%。全市养老护理人员共 1715 人，所有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都经过民政部、民政厅的培训，具备一定的护理技能。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3702 所。其中：三级医院 4 所，二级医疗机构 28 所，二级以下及未定级公立医疗机构 9 所，企事业医院 4 所，民营医院 32 所，乡镇卫生院 204 所；村卫生室 2575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67 所，门诊部 25 所，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744 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设置床位 18228 张，卫生技术人员 17176 人，执业（助理）医师 7837 人，注册护士 5741 人，药师 866 人，技师 823 人，医疗机构体系比较健全。在此基础上，全市已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9073”养老服务格局，也就是 90% 老人居家养老，7% 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 的老人到各类养老机构养老，同时养老护理服务功能在逐步完善。从我们考察的双滦区元宝山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情况来看，在养老服务方面已建立社区老人档案制度、“电子保姆”自动呼叫服务系统、半自理与不能自理老人的集中照顾体系，以及健康老人的多种有益活动功能等综合养老服务体系，并已成为全市养老服务推广的样板示范。

三、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我国的养老事业起步较晚，但需求却急剧增长，导致护理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加上市场发育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养老护理机构与专业护理人员严重缺乏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失智等老龄人口已达 4000 多万人。按平均照护比 1:4 计算，需要一线护理人员至少 1000 万人，而目前一线护理人员仅约为 30 万~50 万人。根据调研发现，目前我国普遍养老院护理人员与老年顾客（患者）比例为 1:7 至 1:10。北京市唯一一家公办民营“医养结合”试点养老机构（汇晨养老）为 1:3，接近德国同行业 1:2.5。

同时，我国养老机构单一，主要靠公办的养老机构，数量非常有限，民营及社会机构发展严重不足。如承德市养老服务的提供，也是以政府提供公益性服务为主，供养对象大部分是城市“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等特殊群体，养老服务受益人少。现有的护理人员普遍没有经过专门业务培养，护理人员大多是 40 岁以上临时聘用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养。承德市目前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年龄、学历、技能与实际工作要求差距较大，加上目前尚无专门的养老服务技能培训、鉴定机构和统一的国家职业标准，致使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难以实施，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难以涌现。此外，国家财政资助新建的养老院大多为酒店式布局，硬件设施设计不合理，服务种类不适应养老护理需求。同时，养护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目前我国养老护理职业院校只有 40 多所，专业教师严重匮乏，并且也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专业培训教材。

（二）传统观念制约养老产业的发展

由于传统观念，老年人不愿意入住机构养老院；年青人不愿意选择养老院就业。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儿女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怕邻里朋友议论“儿女不孝”，家庭没面子；另一个原因，养老院条件差，怕老人被虐待，得不到好的照顾。不到万不得已不让父母住进养老院。另外，中国老年人习惯为儿女考虑多于为自己，舍不得给自己花钱，也是不愿进养老院的原因之一。年青人不愿选择养老院就业，主要是因为待遇低，伺候人不体面，工作时间长，很辛苦，选择养老院就业觉得社会地位低等原因。一般卫生护理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医院就业。

（三）政府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严重影响养老服务业发展

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政府对养老护理业的管理呈碎片化多头管理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如养老问题归属民政系统管理；残疾人员归残联系统管理；医疗归卫计系统管理；卫生职业院校归口人社系统和教育系统（中职归人社系统、高职以上归教育系统）；职业水平证书归人社系统管理等。一个平台，多部门管理，加上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往往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自 2013 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养老服务产业指导性支持文件，但落实很难。主要原因是涉及多部门管理，遇到问题需要多个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费尽艰辛才能得以解决；有些具体问题涉及多个部门，职能不清，难以解决，严重影响了我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例如，承德市各级政府长期对养老机构建设投入有限，政策支持面较窄，社会养老机构建设发展迟缓，数量较少，养老服务供给明显不足。而且由于社会养老机构设立审批涉及到民政许可、工商、卫生等较多相关部门，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用地问题、规划问题落实难度较大。从目前已经运作的民办养老机构用地

情况看，大部分都是租赁土地，仅有极少的几家是土地自有自建的，有的又受到前后政府规划立项变化的影响，严重影响了鼓励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

（四）养老护理资源配置不合理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不成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到位，导致了我国养老护理资源配置不合理，削弱了养老护理服务功能的发挥与社会效率。一是养老床位紧张与闲置浪费并存。目前，公办养老机构约有 4 万多家，公立养老院费用偏低，只面向三无孤寡老人，低收入老龄群体，入住门槛高，一床难求；而民营机构约有 570 万张床位，却门庭冷落，空置率达 48%。二是高护理费用与低专业水平、低服务质量并存。目前，我国社会民间承接的日间照料中心，接收中等收入老龄群体。企业兴办养老院和养老公寓，面向高收入群体，市场化运营，养老床位和护理费用很高，一般护理费每月支付 3000 元以上，中度护理每月支付 5000 元以上，重症护理每月支付 1 万元至几万元不等。而我国大量的护理人员却是几乎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没有受到正规专业培训的农村护工，且不说应具备更多的医学、药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就连基本护理技能都还谈不上。这种低专业水平必然导致低服务质量。

（五）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现行养老机制主要还是以公办为主，行政色彩较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主要原因是养老服务市场还不成熟，缺乏有资质的品牌养老服务实业机构和中介组织的龙头引领；社会办养老服务业收益周期长，运营风险高，优惠政策偏少，落实政策较难，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老年人受靠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影响，自费购买所需养老服务的理念尚未形成。

四、政策建议

中德两国尽管在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及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老年社会发展及养老护理方面仍有一定共性。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并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推动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业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鼓励中外合作办学，加快培养护理人才队伍

鉴于我国卫生职业院校养老护理专业刚刚设立，面临师资匮乏，没有统一标准教材等现状，建议出台鼓励我国卫生职业院校与发达国家养老产业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鼓励专门开办养老护理专业学院，批准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大专学历、大学学历、研究生学历

等文凭。兴办社会在职养老护理培训，恢复养老护理职业等级证书制度等。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鉴定和承认国外发达国家养老护理职业院校培训水平的认证资格，从而加大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培养力度。

（二）提高政府引导及管理的有效性

面对“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建议“十三五”时期把养老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养老护理服务事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首先，要加大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力度，改变政出多门的局面，提高政策制定、落实及管理的效率。结合供给侧改革，“十三五”全面构建以法律为基础，以制度为支撑，以政策为导向的我国养老护理制度体系。其次，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养老护理服务和培训的扶持力度；加快落实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增强政府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入。建议各级政府拨专款对养老护理人员给予培训专项补贴，对养老护理人员实行免费培训，提高人们参加养老护理服务培训的积极性。应加快通过培训和鉴定取得“养老护理水平证书”等方式，让这个职业展现出应有的职业优势；让更多的人愿意从事这个职业。推进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同时，由政府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并采用多种方式，加大对大学养老护理专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构建适合我国社会需求的养老护理各类职业教育体系。

（三）尽快出台国家标准，提高护理人员的地位和待遇

建议尽快出台《养老护理人员国家职业标准的规定》，创新多种形式培养符合标准要求的养老护理队伍，从学历上保护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鼓励在岗护理人员长期从事此项专业工作，直接纳入专业技术职称系列，出台相关政策，适当放宽认定或评定条件，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社会地位。建议实行护理人员注册登记制度，对经过注册登记的且在养老机构从业一定年限的护理人员，政府财政按月发放补贴性工资，并免收其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应缴部分，再加上养老机构发放的工资，这样可使护理员的工资有较大提高。按现在的物价水平，如果护理员的月实际收入能达到 3000 元以上，将会吸引更多有志于养老事业的人员从事护理员工作。

（四）出台养老护理保险险种

1995 年德国护理保险法实施，后来对日本等国护理保险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护理保险法保证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和机构养老的护理费来源，提高了护理人员的收入；同时，由于护士人数的增加，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对工作的满意度也随之上升。该法对护理的任务、职业标准、教育培训、护士的职业资格和权利、义务等方面都做了具

体规定。借鉴德国经验作法，建议尽快开设法定护理保险，推广“个人服务时间存储”制度。在一个人均收入很低并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度，如何就地解决日益突出的护理费用过高与护理需求增大的矛盾、人力资源浪费与人力资源短缺的矛盾，德国经验值得重视和推广。很多发达国家都鼓励学生从小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和义务服务活动，在社区免费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甚至把这种活动列入各个年级的必修课，达不到要求不准毕业，把它视为评判学生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指标。我国城市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而独生子女通常缺乏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建议我国选择试点城市借鉴和推广德国模式，出台符合中国实际的养老护理保险改革方案。

（五）推广居家养老护理上门服务，出台统一的改革试点方案

在德国，居家养老护理上门服务受法律保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执行的“中德养老护理培训项目”，德国执行机构是蕾娜范集团公司，该集团在德国 13 个城市设有 20 个养老护理上门服务站点。服务项目包括：基础护理（身体护理）、医务护理（医疗）和家政服务。居家养老护理上门服务深受全民的欢迎，但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调研组走访了北京汇晨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医养结合、公办民营的养老机构，也有居家养老护理上门服务业务，但服务也只局限于基础护理和家政服务业务，医疗护理不允许上门服务。中德养老护理培训引智项目三个试点城市已向所在省申请开展“医养结合”试点示范。该项目也将为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鉴于此，建议出台允许医院和养老院（医养结合）持证上岗的医护人员上门提供医务护理服务的改革方案和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 张啸、王海涛、李皖、欧阳铮：《德国养老》，中国出版社 2010 年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承德养老服务体系调研组：《承德市养老服务体系调研报告》，2016 年 5 月。

责任编辑：艾 冰

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及危机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陈金明 任再萍 李国菊

摘要：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研究的基础上，详细论述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演变及其危机，总结美国支撑美元—华尔街体系所采取的措施。结合美国对欧元、人民币等新兴货币国际化所采取的遏制政策措施，通过创建泡沫指数并分析其预警价值，揭示了该体系运作的实质与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参考价值，对中国自贸区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警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元—华尔街体系 金融泡沫 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陈金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任再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国菊，北京九鼎丰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济师。

一、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随着“去工业化”及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转变为依靠贸易资本输出和金融资本输入，金融资本地

^{*} 本文为 2014 年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金项目《美元—华尔街体系对自贸区金融政策改革的启示 Z085ZTYJ14006》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085 项目《人民币汇率变动的 FDI 企业决策行为与国际收支的动态关系研究（Z085YYJJ13035）》的阶段成果。

位日益上升。特别是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的建立，使人们转向华尔街寻求资金，全球经济受制于美国的金融体系。虽然该体系并未形成一个像“布雷顿森林协议”那样的公告，但却发挥着实际作用，不仅对全球经济及政治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发展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及货币国际化形成更大的冲击和遏制。40 多年来，美元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相互扶持、相互壮大，以此实现和巩固该体系。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其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拥有作为全球范围内结算、计价和储备的主要货币美元与主宰全球金融市场的华尔街的结合体，即美元—华尔街体系。

国内外学者对该体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更多是在美元与经济危机、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彼得·高恩（2003）从新自由主义运动和全球化运动角度研究认为，该体系使美国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其他国家，这就是该体系所不为人知的一面。罗伯特·吉尔平（1989）认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和它的威慑扩大到包括各个盟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理查德·邓肯（2008）认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是美元贸易赤字政策的代名词。麦金农（2005、2013）认为，国际美元本位是全球失衡与危机的根源；美国为达到国内利益，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惜牺牲整个世界的利益，阐述了美元未来崩溃的可能性。国内学者陈雨露等（2005）研究认为，货币发行国可能获得的各种利益，或许是对现代信用货币竞相国际化的最好解释。他计算出美元获得的国际化利益，同时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进行了估算。李伏安和林杉（2009）通过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及演变，分析了日元国际化进程无起色的原因以及日本进行的战略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设性方案。李稻葵和尹兴中（2010）研究认为，危机后美元信用基础发生根本动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难以为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岳华（2012）认为，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该体系下金融结构力量变革的分水岭，此次危机给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了机遇。李扬和黄金老（1999）、何帆和张明（2005）、程恩富和夏晖（2007）、张纯威（2007）、夏斌（2009）、朱民（2009）、尹应凯和崔茂中（2009）等众多学者认为，美元霸权包含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也是美元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并提出中国的应对建议。

可以看出，目前对美元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掠夺性以及引起危机的根源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借鉴该体系运行 40 多年的机制，并跻身于国际主要货币，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意义方面研究的并不多。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以期为人民币国际化及中国自贸区金融改革提供经验支持。

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不甘心失去美元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美元及华尔街金融市场这两大机制，使世界各国重新依赖于美国。

（一）美元环流的形成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为了重新巩固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优势，美国找到了黄金替代物——石油，使之成为美元的“内在价值”。美元环流的最初形式是石油—美元环流。1973 年美国政府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达成协议，在全球石油交易结算中使用美元，任何国家要使用石油必须拥有美元。从此，华尔街利用美元控制石油进而控制世界。美元与石油挂钩后，美国便开始以战争的方式提升油价，在产油地区及国家挑起事端，发动局部战争，推动油价飙升，从而增加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和依赖。美国通过印刷美元，形成石油—美元—美债环流，石油出口国通过石油资源换取美元，然后用换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表面上美元与石油资源等价，回流的美元与美国国债等价，但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发行不包含社会劳动及资源，仅仅是一种基于美国国家信誉基础上的金融产品，美元的一进一出使美国不劳而获、轻松地控制了世界。第二次美元环流是通过全球化强化的。美国抛出全球化概念，创造出以全球自由贸易、货币自由流动、经济与金融开放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石油—美元—美债环流形成的原理一样，其他国家以商品换取美元，然后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美国通过美元控制世界财富的本质是一致的。从图 1 可以看出，美国历年贸易流与资本流总体上对称，说明美元环流的存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资本净流入呈现增加态势，同时贸易赤字也不断扩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美元环流特征非常明显且基本对称，贸易流与资本流变化相对平稳。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特别是在 2000 年及 2008 年前后波动比较大，虽然贸易流和资本流在对危机的反映速度上有所差别，但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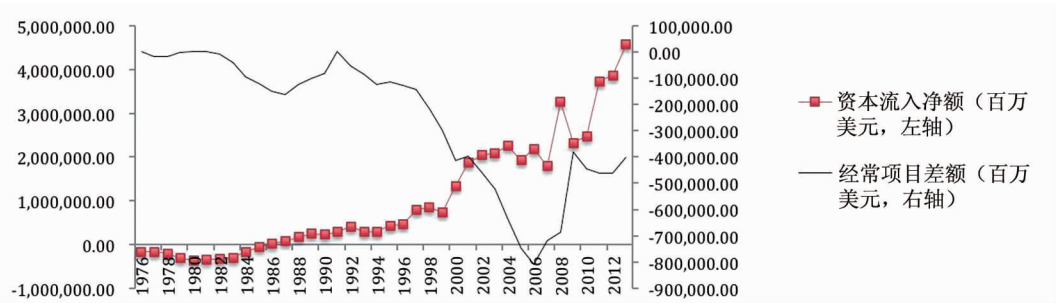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历年国际资本流入净额与经常项目差额的对比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能看出经济危机的影响。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显示，近 30 多年以来，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平均回报率为 6.82%，而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平均回报率只有 3.50%，二者相差 3.32%，可以看出美元环流掩盖下世界财富流向美国的本质。^①

（二）美元资产的全球置换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基础还相当脆弱。在美元大幅贬值及通货膨胀预期下，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如图 2 所示，在 1979 年底达到当时历史最高水平，突破 800 美元/盎司。在此情况下，美国刻意利用美元购买海外资产，然后通过美元大幅贬值以实现海外资产升值。这么一置换，美国就可以实现 78% 的海外资产增值。^②为了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国内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美国把制造业等高污染、高消耗行业纷纷转移到海外，把产业链最高端的环节保留在本国，生产组织方式由垂直一体化转向全球生产网络，其组织结构采取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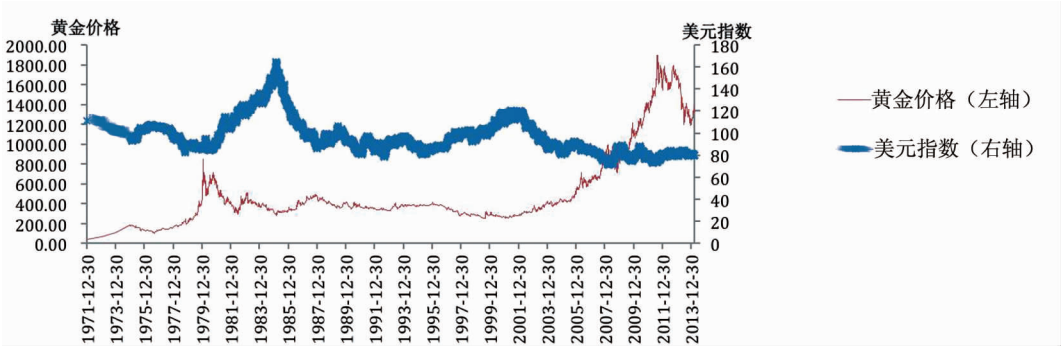


图 2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指数与黄金价格对比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从图 2 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该体系的建立，使美元指数再度达到峰值，美元重新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控制世界财富。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说，这一新体系使得美国对整个世界货币体系和金融关系更具控制力，世界及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左右，华盛顿政府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杠杆利益。

（三）全球资产的美元定价

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垄断全球资产定价权是美元崛起的又一个法宝。美国首先通过美元垄断石油交易，并不惜制造战争、推高油价，以维系和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1973

^①向松祚：《美元超级特权创造超级利益》，《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 10 月 19 日。
^②潘英丽：《双管齐下解决外汇储备安全隐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8 月 23 日。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OPEC 宣布石油禁运，造成油价上涨。原油价格在 1973 年为每桶 2 美元多，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该体系正式建成时，已涨到 36 美元/桶以上。具体价格变化可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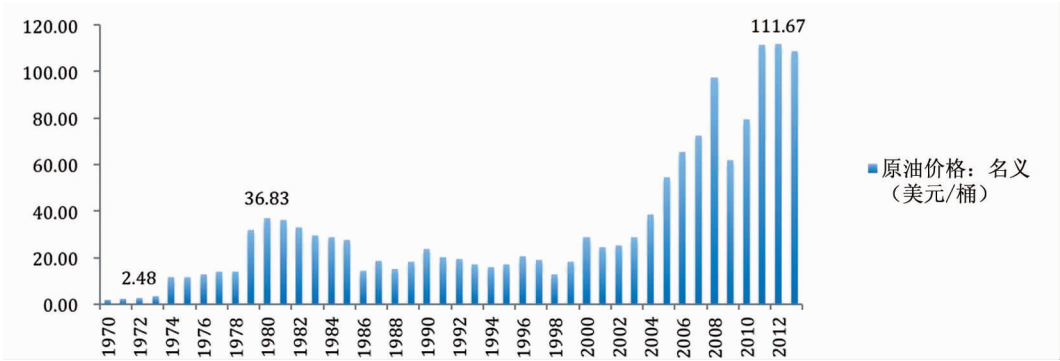


图 3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原油价格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美国在利用油价制造流动性泛滥的同时，还控制了世界粮食等农产品、大宗商品及资源的定价权，输出通货膨胀并影响各国货币政策。世界粮食价格的标志性定价权就在芝加哥交易所，以农业自由贸易为主要目的“东京回合”谈判（1973—1979 年），强化了美元对全球粮食的定价权。石油和粮食这两个控制国家和人类命脉的商品，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得以稳固。美元通过与石油、粮食挂钩，从而控制了世界各国，而美元的信用也就从此牢牢地与全球大宗商品及能源需求挂钩。随着美元境外发行的高速增长，金融投资市场吸纳货币供应量能力的增强，美元成为全球资产定价的必然货币。与金融创新相对应，急速膨胀的财富效应，对以美国企业为主体的跨国公司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该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货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推出

为了强化和巩固美元的定价权，货币期货应运而生。1972 年 5 月，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设立国际货币市场分部，并推出了货币期货交易。其他国家的交易所也相继推出各自的外汇期货合约，不仅扩大了期货交易的影响力，丰富了外汇期货交易品种，而且推动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当时推出的几种外汇期货合约均以美元报价，强化了美元对金融产品的控制能力。美国的货币期货市场最为活跃，仅芝加哥的货币期货交易量，就占世界货币期货交易总量的 50%。1982 年，世界第一个场内货币期权市场在美国诞生，此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竞相成立各自的货币期权市场。

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金融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美国的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生产和贸易转移到金融经济上。自 1972 年 5 月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货币期货推

出后，相继在 1975 年 10 月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了第一张利率期货合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的抵押凭证期货合约，1982 年 2 月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开办了价值综合指数期货交易。这标志着金融期货三大类别的结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该体系的确立。

三、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演变、危机及影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到现在，美国为了维护该体系先后抛出多种理论，但难以阻挡经济危机和金融泡沫的发生，也给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带来重大影响。

（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演变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使全世界都纳入美国的金融体系之中，使世界财富在美元一进一出中悄悄地流入美国，而其他国家又难以觉察。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美国采取一系列经济和军事策略，其实质都是为了巩固和强化该体系。

首先，美国抛出了全球化策略。为了得到接受和认同，便抛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极力推广，认为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金融投机收益私有化。自由市场理论对促进金融创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期看，这套理论也是危机的根源。金融机构在宽松的监管体系下，使金融创新如火如荼。但是，债务证券化和信贷违约保险等金融创新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 2007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金融泡沫破裂后，美国在实体经济难以短期内恢复的情况下，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超发美元，通过美元贬值和金融衍生品把经济危机的风险扩散到全球，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自由市场理论→金融投机→泡沫膨胀→导致危机→政府救助→超发美元→危机转移。世界各国在看似平等的交易中为美国的危机买单，并维持美国的高消费。这就是该体系的实质，在看似公平的交易中包含着不公平，利用全球化席卷全球，并得以进化和发展。

其次，美国频繁发动战争，挑起各种争端保持该体系的运转。看似政治目的背后，隐含的却是美国振兴经济的需要。1973 年中东战争，使原油价格暴涨，吸干了西欧各国的外汇储备，使那些曾经抛售美元的西欧国家，重新依靠出口赚美元，以应对高涨的油价。^①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启动，1 欧元兑 1.07 美元，强势的欧元对美元形成威胁和压力，两个月后美国制造事端，发动科索沃战争。深受战争创伤的不仅仅是南联盟，欧元汇率下跌到 1 欧元兑 0.82 美元，贬值高达 30%。与中东战争一样，科索沃战争也是

^①雷思海：《大对决：即将爆发的中美货币战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美国维护该体系的一个手段。2001 年“9·11”发生后不久，大量资金逃离美国，为了振兴经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打回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① 2003 年 3 月，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主要动因就是控制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石油价格，打击欧洲经济。同时，美国利用种种手段，挑起欧债危机，使欧洲经济和欧元丧失抗衡美元的能力。可以说，欧债危机是第三次美元环流的载体。近年来，中国周边的领海争端，也是美国挑起事端，遏制中国经济，维护该体系的一种手段。

（二）美元—华尔街体系对金融泡沫的推动

本杰明·科恩（2006）^② 认为，在关键时期，美国往往以美元贬值、输出通胀的方式，将货币贬值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美国最方便、最无风险及成本的一种特权。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迅速将制造业以及相关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建立了金融主导的经济模式，进而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在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使虚拟经济泡沫快速膨胀，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使虚拟经济规模数倍于真实财富，导致整个经济体系严重失衡。1971 年，美国基础货币量只有 381 亿美元，而 2009 年已经超过了 6.2 万亿美元。2009 年，金融衍生品的总值超过了 600 万亿美元，而全球生产总值（GDP）才 58 万亿美元。^③ 可以看出，金融衍生产品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推手之一，其恶性膨胀不仅不会增加人类真实财富，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纵然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陷入了持续贬值态势，但世界各国的美元储备资产却几乎直线攀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4 年 6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3.99 万亿美元，逼近 4 万亿美元大关，占了世界外汇储备的近 1/3；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数量亦屡创新高。可以看出世界经济越动荡，汇率越波动，全球美元的需要量就越大，出现美元贬值与美元储备和美元资产日益增加的现象，形成“美元悖论”。在全球贸易、外汇交易、债券买卖主要以美元为计价货币的情况下，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或是为了稳定市场，或是投机买卖，导致全球美元需求量上升和美元储备量增加，美元的发行量也急剧上升，随之世界经济陷入虚拟金融资产泡沫，到一定时期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该体系对金融泡沫的推动作用，也是世界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

① 乔良：《为了美元：美式战争的全部秘密》，《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9～140 页。

② Benjamin J. Cohen, “The Macro 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 in David Andrews, 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46—49. 2006.

③ 向松祚：《美元霸权制度，才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南方都市报》2009 年 1 月 4 日。

对金融泡沫有各种衡量方式。笔者认为，金融泡沫指数应当涵盖三方面，即信贷、股市及国家外债。银行未偿信贷总额和国家债务总额意味着要还息，股市市值意味着要派息，这三者合起来意味着一个国家总体偿还债务利息的大小。所以，定义金融泡沫指数为：一个国家银行未偿信贷总额、股市市值与国家债务总额之和除以当年该国 GDP 所得的值。从金融危机发生的数据分析来看，如果该数值在 3 左右，说明该国金融市场是正常的，如果远远高于 3 达到 6 左右，说明市场泡沫比较严重。从图 4 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美国金融市场日益膨胀，每当泡沫指数创新高，就会发生金融危机使泡沫破裂，从而泡沫指数暂时有所回落。当下一次再创新高时，就意味着危机的来临。1999 年泡沫指数 4.9 创新高，2000 年网络股泡沫破裂；2007 年泡沫指数 5.5，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虽然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泡沫指标稍微有所下降，但不能完全改变泡沫日益膨胀的趋势。从 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当年泡沫指数稍稍回落，从 2007 年的 5.5 降到 2008 年的 5.1，但 2009 年开始又不断上升，到 2013 年达到 5.9 再创历史新高，从经验来看，新的经济危机很快将爆发，这都是该体系推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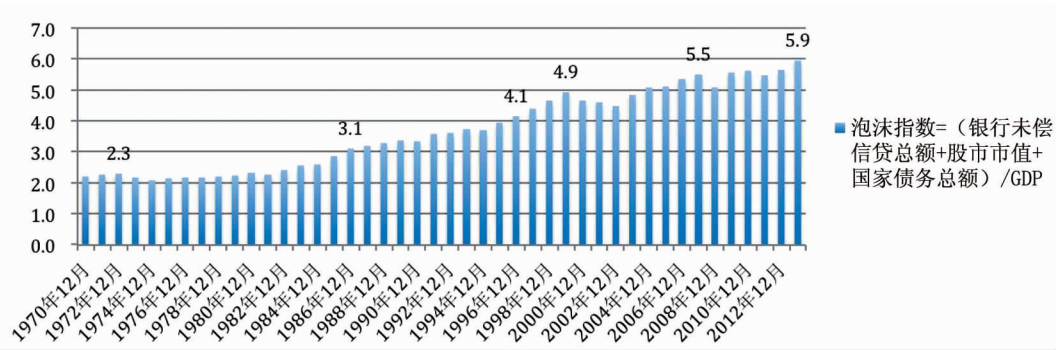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金融泡沫指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三）金融危机后美国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维护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联邦债务法定上限迅速增加。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国会对美国政府债务总额规定上限，本意是希望国会利用立法权对联邦政府的举债规模进行约束，防止联邦政府滥用国家信用，维持联邦政府的债务偿付能力和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定债务上限几乎从来没有对联邦政府的债务进行过真正有效的约束。如图 5 所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国会调整法定债务上限多达 100 多次，而且全部是单边上调。可以看出，美国主权债务的恶化，不仅与联邦政府长期的赤字财政有关，也与国会对联邦政府赤字财政的放纵有关。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看，2012 年、2013 年，美国年末联邦债务法定限额基本与同年 GDP 大体相当，接近 17 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美国经济基本靠国际资本在支撑，是典型的借款“依赖型”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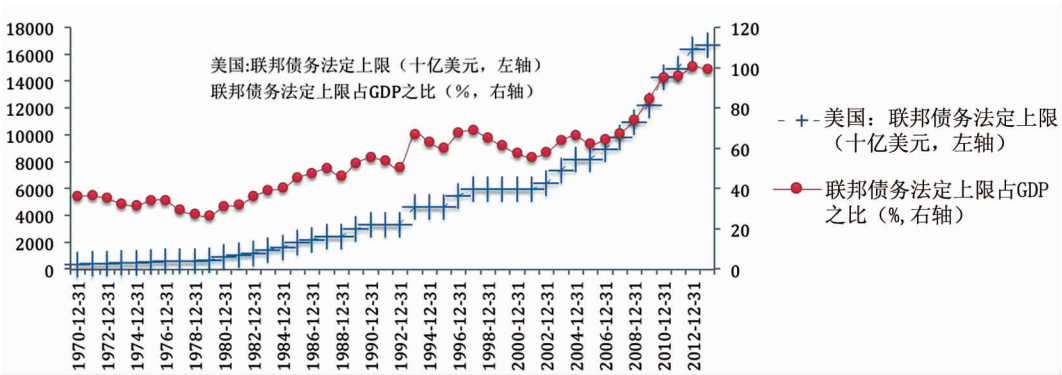


图 5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债务法定上限及其 GDP 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针对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于 2009 年 7 月 21 日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但美国的监管体系受制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制衡，任何严厉的监管措施都会导致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和反抗。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间接向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会出现“监管俘获”现象。比如，通过游说国会修改国策，甚至有些集团通过执政代言人直接影响乃至控制金融监管机构等。而且，美国监管体系在很多问题上都留有相当的余地，使金融企业很容易规避管制。

（四）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美元—华尔街体系不仅是经济体系，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利用自身的发行优势、信息优势、技术优势，通过美元环流获得全球性铸币税收入和溢价收益。该体系的建立及演变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美国找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重新控制世界的载体。第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使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和盈利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全球利益分配的竞争更为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快捷和顺畅地利用华尔街金融市场，把经济危机转移到其他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转移风险和污染的基地。金融所得成为世界利益分配的重要渠道，全球利益分配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国际经济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趋向多极化，将有更多的货币成为美元的潜在竞争对手和替代选择。

四、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货币体系的三足鼎力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地域已从亚洲扩张到欧洲和拉美国家，中国已经与欧洲央行、英国、阿根廷、瑞士等近 30 个国家及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或合作备忘录。随着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在英国成功发行，人民币作为英国的储备货币表明，西方国家对中

济和货币前景的肯定，也使国内外金融机构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充满信心。人民币初步具备了国际货币功能。

（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人民币已经被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人民币每年跨境流量大约有 1000 亿元，在境外的存量大约是 200 亿元，境外人民币大约占人民币总量的 1%。根据《2015 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15 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 2014 年 6.55 万亿元基础上增长 10.4%，累计达到 7.23 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比 2014 年的 1.05 万亿元增长 120.95%，达到 2.32 万亿元；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中，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 2014 年为 6565 亿元，2015 年上升至 8432 亿元，增速达到 28.4%，货物贸易 2015 年为 6.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从中国周边地区开始逐步向纵深化发展，人民币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被普遍当作硬通货。2014 年 6 月以来，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等欧洲多地正在逐渐形成离岸人民币中心。

（二）美元—华尔街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阻挠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影响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在东亚地区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国使出各种手段百般阻挠，试图削弱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的区域政治与经济影响力。

1. 迫使人民币升值制造流动性陷阱。对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日益国际化，以及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美国不仅让美元贬值，还利用它所拥有的工具——国际货币合作，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对于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等同于掠夺，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突破 1 万亿美元，随后几年扶摇直上，2013 年末已经接近 4 万亿美元。中国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又引入大量的境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中国把自己的资金低利率借给美国，又以高利率借进来，这是一笔亏损生意，但不得不为之。对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境外资金源源不断流入，致使中国人民银行不断降低人民币资产利率，由于投资渠道的局限和政策的不完善，造成中国的储蓄过高，极易掉进美国设下的“流动性陷阱”。

2. 利用新的贸易规则排斥中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美国不甘心中国快速发展对其带来威胁和挑战，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虽然这些协议在短期内未必达成，但其架构和谈判进程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国际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而近期以美国为主发起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新经济联盟谈判，掀起

了区域贸易协定的序幕，并将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纳入其中，却把中国拒之门外。这实际是美国利用控制贸易规则的手段，使中国对外贸易陷入孤立状态。在亚太地区，美国积极推行 TPP，不只是为了增加出口，其真实目的之一就是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削弱中国在亚洲的话语权、号召力，以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美国主导的这新三大贸易规则，设置所谓的“高质量”门槛，使中国面临重新“入世”的境地。其实质是尽可能强化和巩固美国在国际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孤立和弱化中国的优势。可以看出，美国利用新的贸易规则，以贸易联盟的形式阻碍中国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实质是为了巩固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地位。

（三）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必然性

虽然美国竭尽心力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但 2008 年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已使美元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难以阻挡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① 报告的预测，中国有望在 2025 年前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经济体、政治体之一，未来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格局，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新的博弈与变革，在一个多元博弈过程中，人民币将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交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欧元的诞生，使伦敦的金融枢纽地位逐步受到威胁。欧元区成为德国产品的倾销地，过去英国的贸易大多在欧洲内部进行，现在要面对巴黎、法兰克福的竞争，英国又不能完全依赖美国。很明显，欧元区削弱了英国经济和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近年来，欧债危机让欧盟陷入困境，德国、法国经济也不容乐观。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对外贸易和投资不断发展。可见，在美元不断下行而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欧元只有与人民币联手，才能在与美元的较量中取得较多筹码，这也会促进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形成持久的、势均力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翼。

五、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随着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已进入了重要阶段，我们要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演变过程中，借鉴经验去其糟粕，同时吸取欧元国际化过程中与美元博弈的教训，不再落入美元陷阱。

^①世界银行著，王辉、朱振鑫等译：《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

（一）控制风险，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美国在欧元、日元国际化过程中设置各种障碍，但在对抗人民币国际化、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欧盟、日本和美国是在同一战壕，其利益一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以及“美日欧同盟”使然，他们处心积虑地逼迫人民币升值，企图让中国承担金融危机的损失，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他们不希望中国富强，更不希望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分得一杯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争端，真正的决策者和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从维护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战略利益出发，根据形势变化，时而拉拢、时而打压相关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主要是为了方便自身战略的施展及随时调整。

自贸区汇率的开放，在带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也会引起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国内民众的资金可能大量流向海外，热钱也可能通过虚报订单金额等手段取道香港进入内地获益，将带来更多套利机会，这其中不乏有意为之。在中国金融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之前，将对国内资本市场造成冲击，对利率市场化改革造成干扰。从理论上讲，浮动利率、开放的资本项目及完善的债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但在中国整个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宜太快。

（二）金融服务实体产业

剖析美元—华尔街体系半个世纪以来的基础可看出，一个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并保持强势地位，一定要有先进产业构成的庞大经济规模作为支撑。二战后，美元逐步取代英镑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必须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先进产业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中占据一定份额，二是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服务实体的意识，这样才足以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金融领域保持更多的话语权和竞争优势。

对中国而言，金融服务实体、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刻不容缓。商业银行应对高科技企业贷款设置合适的风险容忍度，注重其潜在的投资回报，推动金融服务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同时，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在综合化经营及业务创新等方面予以倾斜和政策支持，引导资金流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引擎行业和实体产业，赋予银行定价自主权，逐步放开对特定部门贷款的利率限制，分部门分行业渐进推进利率市场化，优先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引擎部门的资金需求。

（三）加快发展国债市场，为人民币回流做准备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美国国债市场是吸收美元环流的重要工具，在弥补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方面具有蓄水池的作用，并且稳定了美国国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加快发展中国的国债市场，为人民币资金回流做准备。目前，中国国债市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待提高，从国债二级市场交易量、买卖价差、换手率、市场债券余额等指标上看，都和欧美成熟债券市场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债券市场还不完善，规模及品种难以和发达市场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满足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是必要的。但是从人民币资金回流和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国债应该是主要的调控工具和投资工具，所以在自贸区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加快完善国债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不容忽视。

（四）逐步获得资产定价权

从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的过程来看，美元获得全球资产的定价权至关重要。从微观角度来看，资产定价权事关商品和金融市场走势及对应的经济活动秩序；从宏观角度来看，它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政府与 OPEC 达成石油交易使用美元的协议以及货币期货等衍生产品均以美元定价，使美元获得了全球资产的定价权，这些对于该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

对中国而言，要形成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必须尽快建设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通过国际并购等手段进行全球布局，以获得与中国最大买家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及定价权。金融资产定价权不仅是参与全球顶层分工并获取国际收益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维护金融主权及货币国际化的内生性要求。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正在利用自身金融产品优势，来抢夺中国的金融资产定价权，以建立更加牢固的领先优势。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亟需掌握人民币相关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加快债券期货、外汇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建立和巩固人民币相关产品的定价权。中国目前不仅应当建立健全各种相关制度体系来维护人民币相关产品的定价权，而且要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防范人民币金融产品定价权被国际资本所操纵，同时不断争取在国际市场上对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的话语权与定价权。

（五）建立健全法律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

以前，跨境资金流动必须提供用途证明，现在可以是无因的，以需求和不同利率、汇率的安排来进行资金调配，但这会导致虚假贸易、虚假实业投资、套利洗钱等一系列风险。为防范资金跨境流动风险，需要设立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各个金融机构严密监视每日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严密监视、统计本机构每日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状况，根据标准差大小确定上报的不同级别，从 1 个标准差、2 个标准差、3 个标准差等依次分层级向更高的主管领导汇报，及时采取措施防范资金流动性风险。也可以考虑在自贸区引入巴塞尔协议Ⅲ的指标体系，执行比其他地区更严格的标准，同时

授予监管机构处置风险的紧急特权。多个银行同时出现大面积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或交易异常情况时，应启动监管特权，控制资金跨境交易或暂停交易，或采取其他更严厉措施。

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如尽快制定金融混业经营、金融期货发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对于“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隐患，必须完善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出台混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措施，以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递与扩散，确保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六）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出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

美国正在积极推动新贸易规则，旨在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对于目前的状况，中国可采取两手抓的策略：第一，积极争取加入 TPP、TTIP、TISA 的谈判，从新规则的非约束性承诺入手争取机会再逐步过渡到严格实施；^① 对于 TPP 中有关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等措施，可以在自贸区先行先试，然后逐步扩大。虽然短期来看，这些对中国有很大的冲击，但是长期来看，用 TPP 等新的贸易规则倒逼行政改革未必是坏事，可以打破既得利益，为实施改革创造条件。第二，联合周边国家制定由中国主导的新规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各国的路径选择也许各有不同。目前，美国主导的 TPP、TTIP、TISA 新规则，把中国（全球第二大新兴经济体）、俄罗斯（资源性国家）、印度（人口大国）等都排除在外，无疑给推出新规则留下很大的空间。中国可基于金砖五国的基础，构建亚洲区域合作的框架，把中国与金砖五国、东南亚、日韩的经贸关系用新规则的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扩大与印度、巴基斯坦等经济贸易交往，形成泛亚洲经贸与投资规则；进一步可邀请欧盟、南美、非洲等国家加入，在时机成熟时迫使美国对中国加入 TPP、TTIP、TISA 等予以妥协与接受。

可以看出，美国不断用各种手段强化美元—华尔街体系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借鉴其发展演变、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同时防止美国将打压欧元、日元的伎俩在中国重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大力推进自贸区金融改革，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支持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以制约和抗衡美元，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 李扬、黄金老：《美元化问题研究》，《金融研究》1999 年第 9 期。

^①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国际贸易》2014 年第 2 期，第 4～9 页。

3. 潘英丽：《双管齐下解决外汇储备安全隐患》，《中国社会科学报》2001 年 8 月 23 日。
4. 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5. 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6. 何帆、张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财经问题研究》2005 年第 7 期。
7. 张纯威：《美元本位、估值效应与季风型货币危机》，《金融研究》2007 年第 3 期。
8. 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9. 理查德·邓肯：《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0. 夏斌：《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时报》2009 年 3 月 7 日。
11. 朱民：《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研究》2009 年第 5 期。
12. 李伏安、林杉：《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现状——兼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选择》，《金融研究》2009 年第 5 期。
13. 向松祚：《美元超级特权创造超级利益》，《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 10 月 19 日。
14. 尹应凯、崔茂中：《美元霸权：生存基础、生存影响与生存冲突》，《国际金融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15. 李稻葵、尹兴中：《国际货币体系新架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究》，《金融研究》2010 年第 2 期。
16. 李国平：《中国如何成为国际金融强国——我看〈华尔街〉》，《理论视野》2010 年第 11 期。
17. 乔良：《为了美元：美式战争的全部秘密》，《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
18. 世界银行著，王辉、朱振鑫等译：《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 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
19. 岳华：《危机后全球金融结构力量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20. 罗纳德·麦金农著，李远芳等译：《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 年版。
21. 雷思海：《大对决：即将爆发的中美货币战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22.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国际贸易》2014 年第 2 期。
23. Benjamin J. Cohen, “The Macro 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 in David Andrews, 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46~49. 2006.
24. McKinnon, Ronald I., 2005, Trap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ollar Standar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27, pp. 477~485.

责任编辑：李 蕊

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动态视角^{*}

李勇坚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服务业总量、人均服务业发展情况、服务业对外开放、服务业长期增长情况的国际比较，对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以及未来增长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虽然我国服务业增长较快，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但在服务业占比、人均服务业发展情况、服务业对外增长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开放 国际比较

作者简介：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根据《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 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0863 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274278 亿元，增长 6.0%；第三产业增加值 341567 亿元，增长 8.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0.5%，第三产业^①增加值比重为 50.5%，首次突破 50%。按照美元计算^②，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54840 亿美元，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行为对第三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4BJL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在我国官方的统计报告中，使用的是“第三产业”的概念，本文将“第三产业”视为与“服务业”同等概念使用。

^② 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1 美元兑 6.2284 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 1.4%。

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已高居第二位。根据《2015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5 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达到 32839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 42.4%，成为全球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

本文旨在通过对服务业总量、人均服务业发展情况、服务业对外开放、服务业长期增长情况的国际比较，对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以及未来增长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我们主要使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汇率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平均汇率换算。在具体比较方面，主要将中国的数据与全球平均数据（或总量数据）、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据（或总量数据）、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据（或总量数据）进行比较。为了突出国别特征，我们还将中国的数据与美国以及印度进行比较。选择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球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而印度则与中国有着差不多的人口^①，且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强劲，服务外包等方面发展较快，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具体比较时，我们都使用现价美元作为单位。不使用购买力平价（PPP）的原因在于：各国名义汇率与 PPP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服务业方面，而这方面缺乏较为权威的数据，因此我们使用 2014 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同时，考虑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情况，我们也根据 2020 年的基准数据预测进行了国际比较。

一、我国服务业发展总量的国际比较

从总量上看，2015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54840 亿美元，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已高居第二位。

从全球比较看，2014 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约为 549622 亿美元，我国为 49783 亿美元，占全球的份额约为 9%。同期，我国 GDP 增加值占比约为 13.3%。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全球的份额远低于 GDP 增加值份额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事实。从长期增长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2000 年，我国服务业占全球份额仅为 2%，到 2014 年增长到了 9%，14 年间增长了 7 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增长 0.5 个百分点（见表 1）。

从未来发展看，夏杰长（2015）等预测，到“十三五”末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预计将达到 53 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保持在 6.4 左右，折合美元为 8.3 万

^①2014 年，印度人口达到 12.95 亿。据 2015 年 7 月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统计，2022 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亿美元，占全球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将为 13%。也就是说，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在全球的地位将有明显的上升，其在全球的份额将上升 3.9 个百分点左右。

从服务业占比看，2014 年，全球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为 70%，而发达国家为 73.9%，中等收入国家为 55.5%，中高收入国家为 56.8%，而我国仅为 48.1%。无论是从哪个层面比较，我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见表 2）。

表 1 服务业增加值的国际比较 单位：10 亿美元

	国家名称	GDP		服务业增加值	
		2000	2014	2000	2014
1	美国	10, 289. 70	17, 611. 50	7717. 275	13746. 2
	相当于中国（%）	859	170	1651	276
2	中国	1, 198. 50	10, 352. 10	467. 415	4978. 3
	相当于全球（%）	4	14	2	9
	全球	32, 874. 70	72, 489. 70	22026. 049	54962. 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DI 数据测算而得。

表 2 2012—2014 年全球服务业占 GDP 比重 单位：%

国别组	农业		工业		其中：制造业		服务业	
	2012	2014	2012	2014	2012	2014	2012	2014
全球	3	3	27	26	17	16	70	70
低收入国家	28	32	24	22	10	9	48	46
中等收入国家	10	10	36	35	22	21	54	55
下中等收入国家	17	17	32	31	16	17	51	52
上中等收入国家	8	7	38	36	23	22	54	57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11	10	36	35	21	21	54	55
高收入国家	1	1	25	25	15	15	74	74
美国	1	1	20	21	13	12	79	78
中国	9. 5	9	45. 5	43	38	36	45	4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整理而得。

从就业看，2014 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 31364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 40.6%，保持着我国第一大就业部门的地位。而从全球看，2014 年，全球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 51%。而发达国家为 71%，中等收入国家为 44%，中高收入国家为 50%。这一事实说明，我国服务业还有较大的就业吸纳潜力。值得注意的是，从近几年的发展看，服务业已成

为我国就业吸纳的主力军。自 2013 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工业与农业就业人员同时下降的现象。而这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在服务业中进行就业（见表 3）。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在性别上的差异。根据各国的数据表明，服务业在吸纳女性方面的能力非常强（见表 4）。2014 年，全球女性就业人员的 54%在服务业领域，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高达 83%。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在吸纳女性就业方面的能力越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服务行业就业。

表 3 2010—2015 年我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 单位：万人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服务业新增就业	1475	1728	1946	408.1	949.6	475
总就业新增人数	198	276	273	284	315	277
农业转移人数	871	1381	1602	821.2	1336.3	960
工业新增人数	-406	-71	-71	697.1	701.8	761.9
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例（%）	138.0	104.3	103.8	36.9	57.5	38.4

资料来源：2010—2014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5 年数据来源于《2015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表 4 全球服务业就业比例及性别差异

国家性质	服务业就业占比（%）	从事服务行业的女性就业人员占全部女性就业人员的比重（%）	从事服务行业的男性就业人员占全部男性就业人员的比重（%）
高收入国家	71	83	60
中等收入国家	44	45	41
上中等收入国家	50	56	47
全球	51	54	4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整理而得。

从总量上，也可以将中国服务业与其他典型国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2014 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为 137462 亿美元，相当于我国的 276%。从数量上看，美国服务业增加值比我国多 87648 亿美元。应该看到，同期美国的 GDP 比我国多 72594 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经济超过中国的部分，全部体现在服务业方面，如果中美之间服务业发展差距能够缩小，则中国经济与美国的差距也会相应缩小。我们预测，到 2020 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 17 万亿美元，大约是我国的 2.04 倍，差距较 2014 年相比有所缩小。

从占比看，美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78%，远远高于中国。从近几年发展看，美国服务业占比增加速度较慢，预计到 2020 年，将仍保持在 78%~79% 之间。而我国到 2020 年，服务业占比将上升到 55% 左右（夏杰长等，2015），比例上的差距将有所缩小。从就业看，2000 年时，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过 75%，自此之后，仍保持着较强的增长态势，到 2012 年时，服务业就业占比超过了 82%。

印度一直以服务外包、服务业发展领先于工业发展而著称。由于其经济总量的差距，与中国服务业发展在总量上存在着不小的差距。2014 年，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为 10561 亿美元，相当于我国的 21%。印度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要高于我国，达到了 52%。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2000 年时，印度服务业占比就达到了 51%，之后十多年间，服务业占比一直围绕 50% 波动。这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大国来说，越过工业化发展服务业，似乎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从就业看，印度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在 2005 年达到 25% 之后，一直小幅增长，到 2014 年时，达到 28%。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速度有超过中国之势（2015 年，印度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国），估计 2016—2020 年，印度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到 2020 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将相当于我国的 23% 左右。

二、我国人均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我国服务业发展总量虽然较大，但是，由于人口较多，我国服务业人均差异相对总量差异更为突出。2014 年，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为 3640 美元（2015 年为 3989 美元）。同年，全球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2014 年为 7570 美元，我国相当于全球水平的 48.1%。这一数据，比我国 GDP 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比例要少 22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将接近 6000 美元左右，相当全球平均水平的 68% 左右。我国服务业平均水平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明显。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4.7%，预计到 2020 年，将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9%。

与全球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相比，我国服务业的人均差距更大。2014 年，美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43111 美元。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 8.4%，或者说美国相当于我国的 11.8 倍。而同期，美国人均 GDP 仅相当于我国的 7.3 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人均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接近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即使与世界平均水平比，我国也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在未来 10~15 年内，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50% 以上，才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们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到 2030 年，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见表 5）。

表 5 中国人均服务业发展情况的国际比较

	人均服务业增 加值（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人均服务业增 加值（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中国	3640	7568	中国	3640	7568
全球	7570	10, 799	中等收入国家	2409	4, 681
中国/全球（%）	48. 1	70. 1	中国/中等收入国家（%）	151. 1	161. 7
高收入国家	24741	38301	上中等收入国家	4140	7, 926
中国/高收入国家（%）	14. 7	19. 8	中国/上中等收入国家（%）	87. 9	95. 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整理而得。

三、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国际比较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

2011 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第一大产业。之后，服务业 FDI 占全部外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到 2015 年，该比重已超过了 60%（见表 6）。

表 6 2010—2014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金额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其中： 制造业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除金融业）	非金融领域实际 利用外资投资金额
2010	1057. 4	19. 1	538. 6	495. 9	499. 7	387. 3	1046. 1
2011	1160. 1	20. 1	557. 5	521. 0	582. 5	391. 6	1141. 0
2012	1117. 2	20. 6	524. 6	488. 7	572. 0	360. 0	1096. 0
2013	1175. 9	18. 0	543. 4	455. 5	614. 5	429. 1	1152. 6
2014	1195. 6	15. 2	518. 0	399. 4	662. 4	645. 2	1195. 6
2015	1263	15. 32	475. 88	396. 4	771. 8		

资料来源：2015 年数据来自《统计公报》，其他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全球看，服务业 FDI 在整体较弱的情况下保持稳定。2014 年全球跨国 FDI 流量下降了 16%，约为 1.23 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FDI 增长 2%，达到了新高，即 6810 亿美元。服务业 FDI 在全球 FDI 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其下降幅度较小，仅从 6780 亿美元下降到 6700 亿美元，下降 1%。从发展中国家看，虽然 2014 年也略有下降，但是

下降幅度小于发达国家，其在全球服务业 FDI 的占比从 2012 年的 60%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67%。这说明了全球 FDI 向服务业转型的趋势（见表 7）。^①

从整体上看，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总量持续上升的同时，其占世界比重也平稳上升。这代表了我国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见表 8）。

表 7 2012—2014 年全球服务业 FDI 情况

年份	全球服务业 FDI (亿美元)	其中：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2	5930	3560	2370
2013	6780	4520	2260
2014	6700	4480	22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整理而得，在计算服务业 FDI 时，仅统计了绿地投资额与并购投资额。

表 8 2012—2014 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全球比重 单位：%

年份	中国占全球服务业 FDI 的比重	中国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
2012	9.65	24.1
2013	9.06	25.4
2014	9.89	25.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服务业 FDI 因投资方式不同而受到了影响。从绿地投资看，2013—2014 年，服务业绿地投资金额从 4030 亿美元下降为 3410 亿美元，下降了 15.4%。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项目减少明显（从 2013 年的 2590 亿美元下降到 2014 年的 2110 亿美元）。从跨国并购投资方式看，服务业跨境并购大幅度增加，从 1550 亿美元增加到了 2130 亿美元，增幅达到了 37.4%。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跨国并购的发动机是金融行业的增加（从 180 亿美元到 610 亿美元），特别是在东亚与东南亚。外商并购投资趋势对中国也有着明显的影响，2015 年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66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77.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和 137.1%，并购在全部实际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上升到 14.1%。

^①从更长期的数据看，全球 FDI 向服务业转型的特征十分明显。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2001—2012 年，服务业占全球 FDI 流量的比例提升了 5 个百分点，达到 63%。从 1990 年开始，服务业占全球 FDI 存量的比重提升了 14 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则从 41%下降到了 26%。

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全球服务业 FDI 一直向贸易、金融、商务活动^①三大行业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在 1990 年，这三个行业占据了全球 FDI 的近 39%，而到 2011 年，超过了一半（见表 9）。85%以上的服务业 FDI 集中于贸易、金融与商务活动。服务业 FDI 集中于这些行业，也说明制造部门不再是服务部门 FDI 的基础，FDI 转向服务部门的长期趋势得到了强化。同时，应该看到，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内部行业也发生着变化，总体来说是与国际发展趋势同步的。但是，我国金融与商务活动所吸引的 FDI 占比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见表 10），仍有一定的差距。这说明未来我国服务业吸引 FDI 的重点将转向金融与商务活动。

表 9 服务业重点行业内向 FDI 存量占全部内向 FDI 存量的比重 单位：%

	1990			2011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全球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转型经济体	全球
贸易	12.83	7.13	11.77	10.36	7.96	8.59	9.63
金融	18.15	26.28	19.65	25.90	20.45	13.34	24.07
商务活动	7.88	4.60	7.27	14.10	22.01	27.72	16.66
合计	38.86	38.01	38.69	50.36	50.42	49.65	50.3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表 10 中国服务业重点内向 FDI 存量占全部内向 FDI 存量的比重及国际比较 单位：%

	中国（2014）	发达经济体（2011）	发展中经济体（2011）	转型经济体（2011）	全球（2011）
贸易	10.85 ^②	10.36	7.96	8.59	9.63
金融	17.35 ^③	25.90	20.45	13.34	24.07
商务活动	11.59 ^④	14.10	22.01	27.72	16.66
合计	39.79	50.36	50.42	49.65	50.3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及《中国统计年鉴（2015）》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注：中国没有公布内向 FDI 存量，使用历史投资总额数据替代。中国数据与国外数据不具完全可比性，但近似可比。

①贸易（trade）包括批发零售等，金融（finance）包括房地产（real estate），商务活动（business activities）包括商务服务、总部经济等。
②包括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以及交通运输。
③包括金融业与房地产业。
④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二）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比较

自 2010 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增长。2010 年，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份额为 5.1%，2014 年上升到 6.2%，2015 年将大幅度上升到 7.7%左右。出口份额一直保持在 4.5%~5%左右，而进口份额由 2010 年的 5.5%上升到 2015 年的 8.8%。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表示，旅游消费已经连续 4 年增长，增速超过国际贸易。2015 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出境旅游 1.2 亿人次，旅游花费 1045 亿美元，继续位列世界第一，比前一年增加 25%。自 2012 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这些事实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全球排名看，2012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入全球前三，2014 年排名全球第二，服务贸易额达到 6069.57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11877.12 亿美元）的 51%。其中进口额相当于美国的 80%，但出口额仅相当于美国的 31.5%（见表 11）。

表 11 2010—2015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①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金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占世界 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占世界 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占世界 比重 (%)
2010	3624	26.4	5.1	1702	32.4	4.6	1922	21.5	5.5
2011	4191	15.6	5.2	1821	7.0	4.4	2370	23.3	6.1
2012	4706	12.3	5.6	1905	4.6	4.4	2801	18.2	6.8
2013	5396	14.7	6.0	2106	10.6	4.6	3290	17.5	7.6
2014	6043	12.6	6.3	2222	7.6	4.6	3821	15.8	8.1
2015	7130	14.6	7.7	2881.9	18.6	5.2	4248.1	9.2	8.8

资料来源：2010—2014 年数据来自《中国服务贸易统计 2015》，2015 年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

应该看到，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仍较弱。我国服务贸易从 1995 年至 2015 年已连续 21 年逆差，而且逆差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2008 年逆差额首次超过 100 亿美元，达到 115.5 亿美元；2013 年逆差额首次超过 1000 亿美元，达到 1185 亿美元。2014 年达到创纪录的 1599.3 亿美元；2015 年虽有所缩小，但仍达到了 1366.2 亿美元。从国际比较看，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非常强，顺差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印度因大力发展

^①遵循 WTO 有关服务贸易的定义，服务进出口数据不含政府服务。

服务外包，在服务贸易领域也体现较强的竞争力（见表 12）。

从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看，近些年中国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从 2005 年的 7.17% 下降到 2014 年的 5.84%，且长期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美国发达国家，更低于印度这样的以服务出口著称的国家。从发展趋势看，全球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大经济体，如美国，其服务贸易在 GDP 中的份额也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预计，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美国 TPP 和 TIPP 等区域战略的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在互联网经济等新业态的引领下，通过各区域自贸区建立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动，仍将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增长率为 5% 左右，高于世界贸易 4%~4.5% 的增速。到 2020 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将超过 13 万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也将提升到 8.7%~9%，但是，与中国 GDP 在全球的比重（预计到 2020 年为 16%~17%）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见表 13）。

表 12 2005—2014 年服务贸易顺差/逆差额

年份	中国（亿美元）	美国（亿美元）	印度（亿美元）
2005	- 57. 14	685. 53	50. 126
2006	- 69. 66	755. 73	109. 257
2007	- 48. 40	1158. 21	163. 776
2008	- 136. 75	1237. 64	183. 152
2009	- 366. 70	1259. 18	125. 400
2010	- 764. 73	1540. 19	23. 293
2011	- 378. 62	1920. 15	134. 869
2012	- 804. 79	2043. 99	158. 656
2013	- 1244. 88	2241. 89	223. 930
2014	- 1599. 3	2331. 41	83. 64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整理而得。正数表示顺差，负数表示逆差。

表 13 2005—2014 年服务贸易额/GDP 单位：%

年份	中国	世界	美国	印度
2005	7. 17	11. 05	5. 17	11. 91
2006	7. 15	11. 47	5. 47	13. 48
2007	7. 26	12. 09	5. 95	12. 65
2008	6. 68	12. 54	6. 40	15. 83

续表 13

年份	中国	世界	美国	印度
2009	5.57	11.81	6.24	12.69
2010	5.16	11.71	6.50	13.57
2011	5.87	11.96	6.85	14.36
2012	5.72	12.02	6.86	15.02
2013	5.67	12.46	6.87	14.77
2014	5.84	13.23	6.82	14.8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整理而得。

四、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服务业内部结构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例如，传统的批发零售与餐饮旅店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批发零售与餐饮旅店业来看，美国从 1979 年的 25.3%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19.3%，下降了 6 个百分点；欧盟 15 国从 1979 年的 20.3%下降到了 2003 年的 17.0%，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日本从 1979 年的 34.2%下降到了 2002 年的 27.5%，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从交通运输仓储与通讯业来看，美国从 1979 年的 10.8%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7.5%，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欧盟 15 国从 1979 年的 12.8%下降到了 2003 年的 10.2%，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日本从 1979 年的 11.7%下降到了 2002 年的 8.3%，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

我国传统服务业发展的内部结构调整没有发达国家那么明显。从 1995 年到 2014 年间，批发零售与餐饮旅店业占比从 10%上升到了 11.6%。但是，从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看，批发零售与餐饮旅店业还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45%下降到了 34%。而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从 5.3%轻微下降到了 4.5%。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从 16%下降到了 5.4%。

从现代服务业看，我国现代服务业整体增长较快，占比有所上升。就金融保险业来看，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了明显的增长趋势。美国从 1979 年的 8.3%上升到了 2004 年的 11.5%，上升了 3.2 个百分点；欧盟 15 国从 1979 年的 8.3%上升到了 2003 年的 8.4%，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日本从 1979 年的 8.6%上升到了 2002 年的 9.9%，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我国金融保险业发展也非常快，从 1995 年到 2014 年间，金融保险业占比从 5.3%上升到了 7.3%，上升了两个百分点。房地产业也是我国上升得非常快的行业，1995 年到 2004 年间从 3.9%上升到了 6%，是所有行业中占比上升最快的行业。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传统服务业发展占比仍然较高。2014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三大传统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 33.75%。这一比重，从纵向比较看，从国外主要国家的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服务业（零售、批发、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行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过大。除俄罗斯和印度外，中国传统服务业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外主要国家，如比美国（23.41%）高 10.34 个百分点，比日本（28.20%）高 5.55 个百分点（均为 2012 年数据）。

我们也可以将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与美国及印度进行比较。

从服务业结构上看，近年来美国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占比发生了小幅变化。2014 年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占 GDP 的 20.2%，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同年我国仅为 13.3%）。专业服务占 12%，自 1997 年起（1997 年为 9.8%）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在服务业各行业中名义增速最快，2014 年专业服务业增加值从 19817 亿美元增加到 20983 亿美元，增长率为 5.9%。教育健康服务业占 8.2%，1997—2009 年间该行业从 6.8%增长到 8.4%。近年来，美国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稳定，2014 年占 GDP 比重约为 4.9%。

表 14 2006—2012 年印度与中国服务业内部构成（占 GDP 比重） 单位：%

	运输、仓储及通讯业		贸易、旅馆和餐饮业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	
	印度	中国 ^①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②
2006	8.09	5.6	18.23	9.8	15.14	9.4
2007	7.94	5.4	18.59	9.9	15.40	10.9
2008	7.70	5.2	18.59	10.4	16.30	10.5
2009	7.57	4.8	18.33	10.4	16.14	11.8
2010	7.16	4.6	17.96	10.7	16.47	12.1
2011	7.12	4.5	18.66	10.8	16.90	12.1
2012	7.35	4.4	18.72	11.1	17.76	12.5

数据来源：印度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印度服务业内最大的部门为贸易、旅馆与餐饮业，2012 年该行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18.54%；第二大行业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2012 年该行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7.76%。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 10 年间，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占比上升了 3 个百分点，而贸易、旅馆与餐饮业上升了不到 2 个百分

①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通讯业。
②中国的数据不包括商务服务业。

点，而且自 2006 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第三个大的服务行业是运输、仓储及通讯业，2012 年该行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 7.35%。考虑到印度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存在着相似之处，我们将印度数据与中国进行了详细比较（见表 14）。

从表 14 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的服务业内部结构有着相似之处，即金融保险、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呈现上升趋势。贸易、旅馆和餐饮业等保持稳定或微增。而运输、仓储业保持着轻微下降。但是，印度服务业中，贸易、旅馆和餐饮业的比重要远远高于中国。这说明两国服务业结构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五、我国服务业长期增长的国际比较

从长时段看，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上升是一个普遍的过程（见表 15）。从世界发展看，从 1971 年到 2014 年，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从 52.8% 上升到了 71%。从中国发展看，中国服务业占比从 1980 年的 21.6%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48.1%。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服务业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了服务业发展仍具有较大的潜力。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服务业在 GDP 中比重的上升表现为一个全面的过程，即任何经济水平的国家，在长时段看，服务业占比都呈现了上升趋势。例如，发达国家在 1971 年时，服务业占比达到了 55%，此后的 40 多年时间里，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到 2014 年增长到 74%。而且，增长最快的时段出现在 1990—2000 年，10 年间上升了 7.1 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了此前的 1971—1980 年（3.4 个百分点）、1980—1990 年（4.2 个百分点）。从 2000 年开始，服务业占比的上升速度有所减缓。从世界平均水平看，四个时段，1971—1980 年（2.7 个百分点）、1980—1990 年（5.0 个百分点）、1990—2000 年（6.1 个百分点）、2000—2012 年（3.4 个百分点）也呈现了类似的趋势。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1971—1980 年（0.2 个百分点）间服务业占比基本保持不变。1980—1990 年（4.3 个百分点）、1990—2000 年（4.5 个百分点）间快速变化，而 2000 年之后，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增长较缓的增长阶段。从数据上看，说明服务业占比在保持着上升趋势的同时，其上升速度有着较大的波动。

第二个现象。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见表 16）。1990—2014 年，各个收入组别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上升的速度差距不大。其中，低收入国家上升的比重仅为 4 个百分点，是各个收入组里增长最慢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很多服务业上升速度快的国家都在此期间从低收入组迈入了中等收入组。中等收入组整体服务业占比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但是，下中等收入组上升速度要快于上中等收入组。高收入国家仍保持了较快的服务业上升速度。这说明服务业发展存在着一个门

槛效应与水平效应，即收入要迈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服务业才可能实现突破式增长。而到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服务业占比可能会停滞一段时间。从大的经济体来看，当一个国家服务业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之后，其占 GDP 的比重不会无限上升。例如，美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 1990—2004 年间上升了 7 个百分点，但是，在 2004—2014 年间，只上升了 1 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大的经济体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水平限制。

表 15 1971 年以来世界服务业的增长

国家	1971			1980			1990		
	农	工	服	农	工	服	农	工	服
世界平均	8.3	38.9	52.8	6.4	38.1	55.5	5.4	34.1	60.5
发达国家	5.2	39.8	55	3.9	37.7	58.4	3.4	34	62.6
发展中国家	21.0	35	44	15.8	40	44.2	15.9	35.6	48.5
中国				30.2	48.2	21.6	27.1	41.3	31.6
国家	2000			2012			2014		
	农	工	服	农	工	服	农	工	服
世界平均	3.8	29.6	66.6	3	27	70	3	26	71
发达国家	2	28.3	69.7	1	25	74	1	25	74
发展中国家	11.8	35.2	53	11	36	53	10	35	55
中国	14.7	45.4	39.8	9.5	45	45.5	9.2	42.7	48.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中国统计年鉴（2015）等数据整理而得。

表 16 不同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占 GDP 比重 单位：%

国别组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90	2004	2014	1990	2004	2014	1990	2004	2014
全球	5		3	34		26	61	69	71
低收入国家	32	33	32	26	28	22	42	49	46
中等收入国家	16	10	10	39	37	35	46	53	55
下中等收入国家	19	12	17	39	41	31	42	46	52
上中等收入国家	10	6	7	39	32	36	51	52	57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18	12	10	37	36	35	45	52	55
高收入国家	3	2	1	33	26	25	65	72	74
美国	2	1	1	28	22	21	70	77	78
中国	21	13	9	47	46	43	32	41	4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整理而得。

六、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服务业发展总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相当于世界第二的水平，占全球服务业的份额从 2000 年的 2% 上升了 2014 年的 9%。但与世界第一服务业强国美国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服务业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36% 左右，服务业增加值差距的绝对量已超过了 GDP 差距的绝对量。从人均水平看，我国服务业人均水平仍较低，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48%。我国服务业保持了一定的开放度，服务业利用外资约占全球 10%，而服务贸易占比大约为 7.7%，虽然仍低于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但呈现了一定的增长趋势。但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服务贸易过程中，服务逆差较大。从国际服务业增长的长期趋势看，服务业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了我国服务业长期增长潜力较大。

参考文献：

1. 夏杰长等：《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5）》，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年版。
2. 戴建军：《中美服务业结构比较及启示》，《发展研究》2012 年第 8 期。
3. 戈松雪：《印度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政策及其统计指标体系》，《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2 年第 4 期。
4. 魏作磊：《美、欧、日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贸探索》2010 年第 1 期。
5. 联合国贸发组织：《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www.unctad.org。

责任编辑：艾 冰

BEPS 方略下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及中国应对措施

甄 真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已成为当前全球最热议的税收议题之一。本文在系统回顾国际税收秩序背景与 BEPS 方略，梳理主要国家及地区的 BEPS 实践做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应当如何适应《BEPS 行动计划》，努力实现中国国际税收现代化做出探讨。提出提升中国国际税收话语权以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加强国家税收主权建设以防止税收流失和维护跨境税收新平衡，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以形成利润分享与税基良性竞争的国际税收新形势，更积极主动参与 BEPS 方略以促成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及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中国国际税收新格局。

关键词：税基侵蚀 利润转移 国际税收 新秩序

作者简介：甄真，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以下简称“BEPS”）已成为当前全球最热议的税收议题之一，引起了各国首脑、国际组织、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已成为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国际组织及国家所着力推动的发展目标。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多边谈判与协调，在一系列国际税收规则和管理制度方面达成重要共识，

并适时提出《BEPS 行动计划》。这无疑是经济全球化及跨国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税源国际化和税收安排国际化的必然结果，标志着国际税收的空前成功且新的国际税收秩序已经确立。

《BEPS 行动计划》的提出，有利于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气候的改变，促使国际税收制度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化。可以说，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跨国避税问题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此可见，国际税收问题已经突破传统主权和地理边界，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更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议题。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 BEPS 方略的产生背景，深入分析其机制设计，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科学的应对之策。当下，世界各国积极广泛地参与到《BEPS 行动计划》中，其行动之迅速、成果之突出，都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以 OECD 合作伙伴身份参与其中，为该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税收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中国应积极主动地抓住《BEPS 行动计划》下国际税收秩序重建的重大机遇，迎接挑战、主动担当，构建符合中国根本利益、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中国国际税收新秩序。

二、国际税收秩序背景与 BEPS 方略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旧秩序

1. 20 世纪 20 年代至 2007 年

传统的国际税收秩序确立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主要是基于国际税收协定的两个范本，即《OECD 范本》和《联合国范本》，其一般仅涉及实质性的经济往来。而当时各国已意识到，各国税制的相互作用会引起在行使征税权时出现交叉重叠，从而导致双重征税。20 世纪 50 年代，OECD 及成员国共同开发了一系列国际税收工具，包括 OECD 税收协定、跨国企业与税收机关的转让定价指南以及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等。虽然后来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和 20 世纪 80—90 年代电子商务的兴起，使得传统国际税收秩序开始受到挑战，但是由于税收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以及传统国际税收利益固化效应的影响，国际税收秩序改革的步伐一直落后于国际投资、贸易和金融的发展。

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BEPS 产生于金融资本主义困境和全球生产相对过剩的时间点，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向国际税收提出了挑战。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激进的税收筹划，以转移利润并侵蚀税基，这种行为侵害了政府的税收权力，侵害了其他企业的公平竞争权利，侵害了广大纳税人的公平税负权利，造成国际税收秩序的失衡。如，美国星巴克公司在英国 14 年

的营业额达到 14 亿英镑，但累计缴纳企业所得税仅为 860 万英镑，其避税手段是应用公司的生产链，将利润分配给其他位于低税率管辖区的分公司；仅 2011 年，苹果公司在美国就少缴纳税款 24 亿美元，也是使用了复杂的避税手段，造成美国税收的巨大流失。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 2010 年，OECD 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幅度飙升，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8%，其中爱尔兰高达 32.5%、美国为 12.2%、希腊为 11.3%、葡萄牙为 11.2%、挪威为 11.1%、英国为 9.6%。而金融危机前，OECD 成员国有一半财政是结余的，财政赤字只占 OECD 国家 GDP 的 1.3%。因而各国不得不被迫缩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并大规模地实行紧缩财政政策。随着各大媒体头条揭露部分高盈利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全球仅负担了不足 5% 的实际税负，国际税收仿佛一夜间倍受公众瞩目，BEPS 演变成了全球性的政治问题。

（二）BEPS 方略下的国际税收新时代

1. BEPS 方略的形成过程

BEPS 方略产生于金融危机深化发展的情况下。OECD 为应对国际税收难题，提出 BEPS 方略，将近百年来国际税收领域消除双重征税的主题转向打击国际避税。这标志着国际税收秩序格局的根本转换，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BEPS 方略的独特性在于它史无前例的政治背景，它是由 G20 国家领导人背书并委托 OECD 研究，旨在推动国际税收新秩序建立的重要方略。OECD 于 2013 年 7 月发布了《BEPS 行动计划》，而此前他们已经先行发布了该计划的背景报告《BEPS 报告》。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2015 年 9 月 OECD 财政事务委员会第 90 次会议在巴黎召开，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54 个国家及地区的 200 多名与会代表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BEPS 全部 15 项行动计划最终报告，并在 2015 年 11 月 G20 安塔利亚峰会上由领导人背书。这标志着重塑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努力及其成果得到国际政治层面的高度认可，国际税收秩序转入后 BEPS 议程，全球转入税收与经济实质相匹配的新时代。

2. BEPS 方略主要内容

BEPS 方略共包括 15 项具体计划，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包括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协调各国企业所得税税制、重塑现行税收协定和转让定价国际规则、提高税收透明度和确定性、开发多边工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同时，《BEPS 行动计划》根据约束性强弱分为“最低标准”“共同方法”和“最佳实践”三大类，这三大分类代表着参与国家在 BEPS 最终建议的形成过程中达成不同程度的共识。其中，“最低标准”约束性最强，将纳入监督执行机制，共有 4 项：防止税收协定滥用、防止有害税收竞争、转让定价国别报

告和争端解决。“共同方法”是未来可能发展为最低标准的规则，但目前统一监督执行时机尚不成熟，如混合错配、利息扣除等。“最佳实践”则是推荐使用的，约束性相对低一些的规则，如受控外国公司制度等。还有一些报告没有明确属于哪一类，如数据统计等。

3. 对 BEPS 方略的评价

BEPS 方略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化挑战，遏制利润向低税地转移，为国际政治经济合作重建健康秩序的时代性举措。在此过程中，展示了政府间在 G20 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促进国际税收环境的稳定和高效，这已然超越了国际税收技术本身。虽然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利益分配，但该方略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国际社会共识，解决 G20 共同面对的 BEPS 问题。另外，整个 BEPS 方略遵循的机制基本是公平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控制或主导规则制定过程，所有参与国享有同样的表决权。最重要的是，全体参与国遵循共同的指导原则，即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这反映了代表世界经济 80% 份额的集体意志和愿望。

但是，BEPS 方略主要局限于如何为各国政府取得“节流式”税收效果，从而使其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色彩。而且，BEPS 方略会加剧实体经济活动的税收竞争，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特殊、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特定的经济活动，这会造成对相关国家税基的侵蚀。然而，在造成各国间涉税争端的数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却不能保证给国家一定带来新的投资。同时，BEPS 方略的实施将导致较长时期的国际税收政策不确定。因为各国需要 10~15 年时间来落实 BEPS 方略所要修订的内容，不可避免的是各国对签署的税收协定进行调整的时间不一致所带来的大量资源耗费，且国与国之间的协调涉及各自力量大小的差异，也很难取得各自满意的成果。因此，《BEPS 行动计划》必然表现出相应的战略局限性。

三、主要国家及地区的 BEPS 实践

自 OECD 2013 年 7 月发布《BEPS 行动计划》以来，世界各国积极响应，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按照成果给出的建议修订国内相关税法或税收协定，推动方式和侧重方面可谓众彩纷呈。

（一）泛亚太地区

泛亚太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采纳和推进 BEPS 项目的情况各有不同。G20 国家和 OECD 成员国一直积极参与 BEPS 项目，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已通过或已草拟立法（或法规）提交国别报告（CbC 报告）。其中，美国致力于税收征管透明化建

设；日本、墨西哥已经通过立法解决混合错配问题，俄罗斯、新西兰正在考虑是否立法；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已经通过了关于利息扣除限制的法例，印度等国家已经提出或正在考虑立法限制利息扣除；加拿大正在进行转让定价立法，以争议解决机制避免重复征税，建立裁定信息交换机制；新加坡、韩国已实施或已有相关提案提议实施第 13 项行动提出的主文档及本地文档的有关措施（或条例）等。而文莱、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缺乏外国投资和税制发展落后，其税制建设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 BEPS 行动并不合拍。目前来说，泛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税收合作及整合程度仍有待提升，没有开发用于修订双边协定的多边工具迹象。

（二）欧洲地区

大体来说，欧洲国家在税收上整合程度较高，欧洲大部分国家是 OECD 的成员国，采纳 BEPS 项目的力度和广度最为整齐一致。欧盟已经采取了重要举措，务求在欧盟内迅速、协调、一致地实施 BEPS 建议。BEPS 项目的各种行动计划也与欧盟执委会在 2013 年提出的许多方案异曲同工。欧盟推行 BEPS 项目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提高透明度，如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强制披露规则等；二是消除混合错配的影响及打击有害税收实践，维护公平公正的税收管辖主权；三是处理 BEPS 项目与其他税种的关系。

具体来讲，奥地利、法国、挪威等国家已经通过立法解决了混合错配问题，比利时、捷克、塞浦路斯等国家则正考虑是否立法。欧盟委员会于 2016 年 1 月发布的 ATA（硬盘接口技术）指令中包括实施消除混合错配规则。此外，于 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混合错配法则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必须否决在子公司层面可抵扣的股息分配的参股免税优惠。英国、比利时、挪威（正在评估是否应将利息扣除法例伸延至向第三方支付利息）、芬兰等国家已经通过了关于利息扣除限制的法例，斯洛伐克、瑞典已经提出或正在考虑立法限制利息扣除。ATA 指令包含了将限制借贷成本扣除的规则：借贷成本超出利息收入至纳税人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A）的 30% 或 100 万欧元（以较高者为准）不予扣除。ATA 指令提案还对可证明其股权/资产比率等于或超过其集团的同一比率的纳税人构想了分离规则。同时，欧盟委员会于 2016 年 1 月已提出自动交换国别报告的建议。欧盟各财长于 2016 年 3 月 8 日达成了政治性协议，通过了对自动交换国别报告建议的多项修改，包括提出次级机制的条款。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同意，若一个非欧盟的集团公司的最终母公司或另一被指定提供报告的企业（代理母公司）没有向相关成员国提交国别报告，那么该成员国则可延期一年提交该集团在欧盟内子公司的报告，该条例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倾向采

用次级报告的成员国而言，也可选择适用上述延迟递交的规定。除上述已经引入国别报告要求的国家外，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等国家也有望引入国别报告要求。此外，芬兰、丹麦、荷兰等国家已实施或已有相关提案提议实施转让定价相关资料复查计划，提出了主文档及本地文档的有关措施（或条例）。

（三）非洲地区

非洲已采取了区域性行动。南非、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和赞比亚通过会面一致认为，有必要降低执行标准以便于国别报告的有效实施，同意依照现有双边或多边协议交换各国国内和各地区内有关恶意税务筹划的相关信息。南非、莱索托已经提出或正在考虑立法限制利息扣除。当前，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也有望引入国别报告要求。此外，南非已经通过立法解决了混合错配问题，并已通过了关于利息扣除限制的法例。

就目前的趋势而言，BEPS 项目在不同区域各个国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利息扣除限制、转让定价和信息披露领域。而在修订税收协定上，许多国家都还在持续观望 BEPS 项目的后续发展。就现阶段而言，各主要国家还是以出台国内法的方式居多，这也许是着眼于时效问题，毕竟与各个缔约国协商修改协定旷日持久，若是协定伙伴持反对意见，更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四、积极适应《BEPS 行动计划》实现中国国际税收现代化

（一）BEPS 在中国

1. BEPS 在中国的问题

中国是货物生产和服务的主要市场，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 80 多万家，这些企业的母公司都在境外，很多设在国际避税地。BEPS 方略关注的是从经营活动所在地向低税收管辖区转移利润，中国内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高于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爱尔兰为 12.5%，新加坡为 17%，英国、泰国、柬埔寨均为 20%，瑞典为 22%，由此致使跨国公司很容易利用转让定价将在中国产生的利润转移到这些低税区。同时，BEPS 并不局限于外国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和个人也参与了 BEPS，将中国利润转移至海外，通常是转移至位于避税地的控股实体。因此，中国是国际逃避税较为严重的受害国之一。

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应对税收收入减少和遵从成本增加的问题。BEPS 行为包括利用各种安排和结构规避中国的来源地法规，对非居民关联方进行可以税前扣除的支付，并

利用转让定价方法增加风险和无形资产的价值，利用位于协定国的中间体，从中国的税收协定中获益。同时，征税权所在地与实质性经济活动之间的脱节，损害了中国税制的整体性。由此带来中国税收收入匮乏，致使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投资资金不足，资源的总体配置没有实现最优。对中国而言，BEPS 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2. 《BEPS 行动计划》是中国改革的契机

一是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制定国际税收规则，在维护跨国税收公平秩序方面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于今后的国际税收管理中更好地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二是有利于推动中国国内税制改革。通过借鉴《BEPS 行动计划》成果，将促进中国建立适应现代商业模式的税收制度，推动中国税收法律的发展和完善，提升中国税收征管水平，以更好地与各国税收制度衔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影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税基安全。BEPS 项目在中国落地，有利于中国堵塞避税漏洞、打击跨境逃避税，从跨国公司跨境交易的利润分配中得到公平合理的份额，进一步维护中国税收权益。四是有利于促进国际税收合作。BEPS 有利于促进各国税务机关在情报交换、争端解决、多边协议等领域加强税收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遏制利润向低税地转移，保障税制健全国家的税基安全。

3. BEPS 对中国的挑战

一是与发达国家更熟悉国际规则相比，中国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时间尚短，缺乏实际经验和相应资源。虽然中国全程参与此次行动计划的制定，但是效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还是未知数。二是中国承诺跟 G20 的其他国家一样在 BEPS 方略下展开税制改革，意味着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管理将受到 BEPS 方略的影响，面临接受新规则和履行义务的压力，中国企业也将面临适应新的国内税收改革的压力。三是 BEPS 方略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中国享受了国际税收协定规则修改带来好处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将面临来自外国税务机关更加严格的税务审查。这将使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甚至给企业增加双重征税的机率。

（二）中国在国际税收中的担当

1. 中国积极参与 BEPS 的最新成果

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和 G20 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全程深入参与 BEPS 所有行动计划。2013—2015 年，中国共参加 BEPS 相关会议 86 次，与其他 G20 成员一道提出“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的总原则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推动各项成果顺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向 OECD 提交中国立场声明和 1000 多条建议。其

中很多意见得到采纳并体现在最终成果中，为书写新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内层面，从 2015 年开始，中国全面引入 BEPS 的研究成果，完善反避税制度体系建设。其中，《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成为中国落实 BEPS 成果的第一项行动，得到国际社会好评；《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从制度上解决了境外投资者间接转让中国财产、规避中国税收的问题；《关于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防止 BEPS、维护税基安全所做出的制度贡献与规则引领；《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是借鉴 G20 国际税改最新成果，进一步完善关联申报，增加国别报告，并按国际标准丰富同期资料内容，有效增强税企间信息透明度。同时，“十二五”期间，中国进行反避税调查 1203 件，结案 1048 件，增加税收 2187 亿元，反避税收入由 2011 年的 239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610 亿元，增长了 1.55 倍，年均增长 26.4%。

2. BEPS 方略下打造中国税收现代化

(1) 提升中国国际税收话语权。国际税收话语权是一个涵盖国际税收发展战略、征管、操作及合作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是国家的软实力。中国应坚持规则制定的主动性，深化税务系统征管体制改革，与 BEPS 项目成果转化紧密配合，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 BEPS 项目最新成果转化，制定和完善国际税收相关法规。同时，中国应从接受既有规则参与国际税收事务，转向在拥有发言权、参与决策权和议程设置权的国际税收话语平台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税收事务，建立提升中国国际税收话语权的制度框架，在夯实税收话语基础、拓展税收话语平台、涉及税收话语议题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利益，从而进一步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2) 加强国家税收主权建设。在当今国际税源争端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家税收主权十分敏感，如果国与国利益相冲突，难免会遭到各国税收主权的抵制。此次《BEPS 行动计划》是通过协调各国的税收制度从而形成新的国际间税收规则。因此，中国更要加强税收主权建设，进一步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强化跨境税源管理，以有效防止税收收入流失和国家税收主权受损。同时，中国也要在各方利益面前做出权衡，改变本国税收制度的同时，赋予各国主权以一种弹性的平衡调整性质，有选择地接受其他国家税收制度，在国际税收中履行新义务。

(3) 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

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这实际上有利于欧美亚各大区域形成自成一体又相互竞争合作的多极化经济格局。中国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由此，在 BEPS 方略主导的国际税收新秩序下，中国要做好国家乃至洲际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体系化，为区域一体化打下基础，也为世界多极化提供条件，以形成利润分享与税基良性竞争的国际税收秩序。

(4) 更积极主动地参与 BEPS 方略。要高度重视 BEPS 成果在国内层面的转化，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法规和理论体系，修订相应的国内税法，包括在税收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中增加反避税条款，为堵塞税收漏洞提供法律依据；在协定谈签和修订相应双边税收协定中逐步引入 BEPS 成果，将国际最新规则、理念与反避税实践管理经验相结合，继续出台规范性文件，规范一般反避税调查实施程序，进一步明确间接股权转让的执行等问题；深化国际税收征管协作，建立分行业、分地区、分年度、分投资国的跨国企业利润水平指标监控体系，在案件调查和对外谈判中应用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新理念，加大反避税调查力度，开展双边协商等，共同打击 BEPS 行为；牢固树立大国税务理念，充分展现大国责任担当，努力升级 BEPS 方略，乃至到 2020 年构建成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格局相适应、符合中国根本利益、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中国国际税收新秩序。

参考文献：

1. 郝昭成：《国际税收迎来新时代》，《国际税收》2015 年第 6 期。
2. 李金艳：《中国与 BEPS——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撼动者（上）》，《国际税收》2016 年第 1 期。
3. 王国武：《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回头看》，《国际税收》2016 年第 3 期。
4. 帕斯卡·圣塔曼：《国际税收进程以及 OECD 税收征管论坛日益提升的作用》，《国际税收》2016 年第 5 期。
5. 克里斯·桑德：《从集思广益到实干践行》，《国际税收》2016 年第 5 期。
6. 翰霖、高阳、王平：《FTA：税务局长访谈录》，《国际税收》2016 年第 6 期。
7. Stef van Weeghel, General report of tax treaties and tax avoidance: Application of anti-avoidance provisions, *Cahiers de Droit Fiscal International*, Vol. 95a. 2010.
8. US Treasury Department, Treasury Releases Select Draft Provisions for Next U. S. Model Income Tax Treaty.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il0057.aspx>.

责任编辑：李 蕊

非洲国家投资政策与环境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程志刚 李 蕊

摘要：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已步入中期或中后期水平，而非洲工业发展正处在萌芽状态，中国工业制造业可以借此机遇在非洲落地生根。非洲有发展工业的基础和潜力，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对政策、资源、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存在企业运营成本较高、技术工人短缺、产品竞争力低等问题。在能源开发、重点项目投资方面，非洲国家对中国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土地、税收、用工等方面的优待，促进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步伐。

关键词：对外投资 政策环境 风险评估 工业潜力

作者简介：程志刚，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秘书长；

李 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助理研究员。

一、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增长放缓，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属于增长较快的国家，外汇储备量也列世界前茅，国内企业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中国企业对非洲扩大直接投资具有了可能性。中非关系不断得到改善与发展也为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提供了政治基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市场与丰富的资源，这成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必要条件。虽然非洲大部分国家比较贫穷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但是发展机

遇仍然大于挑战。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对政策、资源、环境的依赖很强，存在企业运营成本较高、技术工人短缺、产品竞争力低等问题。但近几年，中非领导人互访频繁，加强了中非友好合作的基础。

（一）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历程

非洲的早期贸易和投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发展，2000 年以来中非贸易投资进入快车道。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涉及建筑、餐饮、医疗、汽车制造、化工等多个领域。

以坦桑尼亚为例。从 1981 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开展对坦桑尼亚劳务承包业务，而劳务承包也成为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的主要领域。1997 年 12 月，“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在坦桑尼亚挂牌运作，中国企业对坦桑尼亚投资进一步向规范化、扩大化发展。随后几年，中坦贸易开始以年均 30% 以上的速度增长，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到 20 世纪末，在坦桑尼亚从事贸易、工程承包的中国企业已达 200 多家，直接开办贸易投资企业近 100 家。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最初是从从事劳务合作、层次较低的工程承包以及援助合作，目前正向工业制造业方面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较早地熟悉了坦桑尼亚的经济与投资环境，先于西方国家占有了坦桑尼亚基础设施与工程项目的较大份额，并在非洲赢得了市场和声誉。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对坦桑尼亚给予足够的重视，大量企业和资金撤离，为中国企业留下较大空间。对于许多后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跨国公司来说，坦桑尼亚往往是它们通往世界的第一站。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显示，截至 2014 年 1 月，中国在坦桑尼亚投资的各类商业企业有 120 多家，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畜牧业、自然资源开发、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中国民营企业在坦桑尼亚的投资截至 2014 年累计约有 4000 多万美元，产品包括凉鞋、卫生纸、绢花、建材、水产、果汁等及开办餐馆、旅游、旅馆、诊所等。

随着国内企业对非洲关注度的逐步提升，中国向非洲投资的企业数量稳步提高，目前已有 3000 多家。2015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有所减少，2015 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下降 40%；非洲对中国商品需求则有所增加，2015 年中国对非洲出口 1020 亿美元，增长 3.6%。2015 年 12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举办的“中非峰会”上宣布向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援助和贷款，表明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增强。而无论从数量还是投资额看，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比例仍有很大上升空间。目前，中国在非洲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矿产石油、制造业、通讯、建筑、金融机构、自然资源、农业、旅游业、运输和服务业。根据《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2015》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最多的 10 个国家

是加纳、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刚果（金）、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埃塞尔比亚、毛里求斯、刚果（布）。

表 1 2007—2015 年中国对非洲及非洲部分国家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非洲	157431	549055	143887	211199	317314	251666	337046	320193	297792
加纳	185	1099	4935	5598	4007	20849	12251	7290	28322
肯尼亚	890	2323	2812	10122	6817	7873	23054	27839	28181
南非	45441	480786	4159	41117	- 1417	- 81491	- 8919	4209	23317
坦桑尼亚	- 382	1822	2158	2572	5312	11970	15064	16661	22632
刚果（金）	5727	2399	22716	23619	7518	34417	12127	15756	21371
阿尔及利亚	14592	4225	22876	18600	11434	24588	19130	66571	21057
乌干达	401	- 670	129	2650	991	979	6060	6050	20534
埃塞俄比亚	1328	971	7429	5853	7230	12156	10246	11959	17529
毛里求斯	1558	3444	1412	2201	41946	5783	6107	4943	15477
刚果（布）	250	979	2807	3438	681	9880	10994	23860	1500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2015》整理而得。

（二）中国对非洲投资特点

1. 对政策的依赖性过强。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并不稳定，经常出现较大波动。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对非洲的政策导向以援助为主，相应地加大了对投资非洲的企业资金支持及政策倾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但是过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目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度依赖国内资金和政策扶持，导致管理体制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员工普遍生产积极性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大。一旦中国减少了对这些企业的支持，企业很容易出现亏损。
2. 中非贸易潜力巨大。总体而言，中非贸易虽然发展很快，但贸易总量并不大，2014 年中非进出口总额为 2216.66 亿美元，仅为当年中美进出口总额（5551.24 亿美元）的 40%。虽然从 2010 年起，中非贸易从顺差转为逆差，但中国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贸易仍是顺差。中国与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中非贸易还有持续大幅增长的潜力。在农业和矿业资源方面，非洲的许多出口产品是中国长期发展所短缺的，且非洲的许多矿

产和农业产品远未充分开发，中国与非洲具有广泛的经济合作空间。此外，据统计数据显示，非洲 24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60%，中产阶级约 3.7 亿人，都是潜在消费者，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目前，已有部分中资企业在探索开辟贸易方面的合作途径，但其力度还比较小。需从战略高度考虑，鼓励和扶持各类外向型企业扩大进口贸易及在非洲进行资源开发。

表 2 2007—2014 年中非贸易差额 单位：万美元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进口总额	3635920	5596694	4333124	6709196	9323987	11325064	11745472	11563138
出口总额	3729773	5123992	4773456	5995405	7308303	8531061	9279937	10603475
进出口差额	- 93853	472702	- 440332	713791	2015684	2794003	2465535	95966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而得。

3. 产品竞争力低。由于国际竞争压力增大，内外竞争性并存，中国在非洲投资生产的产品竞争力较低。以纺织业为例，欧盟与非洲国家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欧盟将其占有技术优势的纺织面料出口到非洲国家或直接在这些国家投资设厂，利用当地便宜的劳动力加工生产成服装成品再销售。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纺织品依托于欧盟强大的技术实力，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纺织业，由于技术水平较低，相对来说除了价格优势外，没有其他显著优势，并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长期以来，其市场份额必然会不断萎缩，最终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效益。

4. 企业运营成本较高。非洲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交通状况较差，目前交通主要以公路为主，但是很多地方公路建设不完善；水、电、燃料价格高，电力工业发展滞后，电力供应严重短缺，断电现象经常发生，工业用电价格较高约为中国的 2~3 倍；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官员贪污腐败等现象严重。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目前在非洲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加大，影响企业扩大投资。

二、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

近年来，非洲大多数国家保持快速经济增长，虽然大部分国家比较贫穷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但是发展机遇仍然大于挑战。

（一）非洲的政治环境

非洲各国主张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注重经济外交，把争取外援、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外交工作

的重点，注重学习借鉴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同时，鼓励投资不仅仅是某一个非洲国家独自面临的任务，需要本地区的多数国家共同合作和相互配合。为了更好地促进投资，非洲国家成立了许多地区性国际组织，其中重要的包括东非共同体、东部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中部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对于非洲各国投资促进制度建设起着指导性作用，代表了非洲国家投资促进制度的发展方向。

（二）非洲的宏观经济环境

自 2000 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长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较活跃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争夺也更加白热化。非洲的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量巨大，同时非洲的市场广阔，作为全球投资的最后一块处女地越来越吸引投资者的关注。2014 年非洲的资本投资增长了 65%，约 870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上升了 6%。其中，北非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6 倍，从 100 亿美元增长到 260 亿美元；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吸收投资从 420 亿美元上升到 610 亿美元。对非洲投资中，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占比约为 1/3，达到 330 亿美元；其次是房地产业，为 120 亿美元；再次是通信业，为 60 亿美元。

表 3 2016 年上半年非洲 GDP 增长率前 10 名国家排序

序号	国家	GDP 增长率	序号	国家	GDP 增长率
1	埃塞俄比亚	9.6	6	肯尼亚	6.2
2	象牙海岸	9.5	7	贝宁	6.1
3	坦桑尼亚	7.9	8	马里	6.0
4	刚果（金）	7.7	9	布基纳法索	5.9
5	吉布提	6.7	10	多哥	5.8

数据来源：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CAIF）信息中心。

（三）非洲的工业基础环境

1. 工业基础薄弱。大多数非洲国家以持续、高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富有前景的巨大市场，非洲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各国对工业化进程的重视。由于历史和自身发展等因素影响，许多非洲国家尚未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工业基础落后、工业环境较差是目前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现状，初级产品的收入占到了非洲生产总值（GDP）的 40%以上。

2. 积极实施工业战略。近年来，非洲国家工业落后的局面正在好转。许多非洲国家

意识到了自身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已经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总体而言，近几年随着非洲国家一系列的改善措施，非洲经济及投资环境有了显著好转，投资风险下降。南非、加纳、纳米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等国的投资环境日益提升，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3. 重建项目合作机会多。非洲国家正处在发展初期，很多工程、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建设或重建，未来 5~10 年重点工程项目都将建设或完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水电、通讯、水资源开发等。而在大型基建项目中，中国企业拥有较大优势，这是众多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最大的机遇。

（四）非洲的法制环境

非洲大陆每一个国家在独立之前都历经了坎坷的道路，殖民统治的经历和外来法律制度的嫁接及渗透，使得当代非洲各国在总体上都属于混合法系国家。

1. 非洲国家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与鼓励。第一，关于国有化的保证。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政府不对经营企业实行国有化或没收，法律不强迫拥有经营企业全部或部分资本的任何人向其他人割让其资本利息。虽然个别国家规定了重点行业的国有化，但有前提条件，比如由本国企业或个人持股 51% 以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外方企业或个人可以将股份转让给该国国民或企业。同时还规定，国家不可从经营企业索取各类好处，获得投资许可的企业及属于该企业的任何财产、权利、利益不得被强制征用或剥夺。第二，关于外国投资利润所得及汇出保证。非洲大部分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汇出要求都比较宽松，只要具有投资许可证的投资者，就可以通过银行自由兑换货币汇出。汇出项目包括：投资所得的净利润和红利；获得外国贷款所发生的费用；支付技术或专门知识转让协议项下的使用费；向企业有关外国雇员支付酬金或其它津贴；汇出利润或资产清算收益。第三，对外国投资的鼓励与优惠。为鼓励并吸引外国投资，非洲很多国家规定外国投资者的进口关税和销售税可以豁免。另外，外国投资者是鼓励投资证书的持有人，还可以享受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和土地优惠。

2. 对外资经营活动的管理。为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所在地人民收入，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实行高度自由的贸易政策。第一，进出口业务管理。非洲政府大力推动和鼓励出口，大部分企业及个人均可开展对外贸易业务，没有出口配额限制，大部分商品不征收出口税和其它出口手续费等。对于经营某些特定货物，如烟、酒、药品、石油、军火、矿产、林产、野生动物等进出口的公司，需要在指定的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获得特定的营业许可。第二，劳工管理。在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有比较

严格的雇佣关系立法规定及劳工标准。在非洲国家取得“投资优惠证书”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照顾。除少数非洲国家对雇佣外国人的人数、职业等方面没有限制，没有相关雇员当地化的要求外，大部分国家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如雇佣本国工人的比例、外国专家技术人员数量、工资、签证等。第三，财务与资金管理。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有明确规定保证投资者的财产权不受侵犯，同时要求外资企业在当地有资质的银行开立账户，只要能依据相关规定证明外汇合法来源，其汇进汇出并无其它限制。但对外国人携带现金出入境有严格的限制。

（五）非洲的营商环境

非洲各国营商环境较差。非洲国家政府普遍效率低下、腐败问题严重，且社会贫富分化、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和技能低下。很多非洲国家经济依赖原材料出口，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其影响巨大，缺乏抵抗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同时，对非洲投资或多或少都存在社会治安问题。目前，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不断增加，投资合作日益增多，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中国企业现阶段投资非洲是希望与困难并存，机遇和挑战同在，但是机遇大于挑战。

表 4 2016 年非洲国家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

序号	国家	营商环境 在全球的排名	序号	国家	营商环境 在全球的排名
1	毛里求斯	32	28	塞内加尔	153
2	卢旺达	62	29	科摩罗	154
3	博茨瓦纳	72	30	津巴布韦	155
4	南非	73	31	贝宁	158
5	突尼斯	74	32	苏丹	159
6	摩洛哥	75	33	尼日尔	160
7	塞舌尔	95	34	加蓬	162
8	赞比亚	97	35	阿尔及利亚	163
9	纳米比亚	101	36	马达加斯加	164
10	斯威士兰	105	37	几内亚	165
11	肯尼亚	108	3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66
12	加纳	114	39	毛里塔尼亚	168

续表 4

序号	国家	营商环境 在全球的排名	序号	国家	营商环境 在全球的排名
13	莱索托	114	40	尼日利亚	169
14	乌干达	122	41	吉布提	171
15	佛得角	126	42	喀麦隆	172
16	埃及	131	43	刚果共和国	176
17	莫桑比克	133	44	几内亚比绍	178
18	坦桑尼亚	139	45	利比里亚	179
19	马拉维	141	46	赤道几内亚	180
20	布基纳法索	143	47	安哥拉	181
21	马里	143	48	乍得	183
22	埃塞俄比亚	146	49	刚果	184
23	象牙海岸	147	50	中非共和国	185
24	塞拉利昂	147	51	南苏丹	187
25	多哥	150	52	利比亚	188
26	冈比亚	151	53	厄立特里亚	189
27	布隆迪	152			

数据来源：CAIF 信息中心。

（六）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并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制造业竞争的加剧，一些企业纷纷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非洲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可以把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带到非洲共赢发展。近年来，中非领导人交流互访频繁，合作成果显著。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真、实、亲、诚”理念的指导下，全面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461”中非合作框架，即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等四项原则，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完善中非合作论坛这一重要平台，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将大力支持非洲的工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非常重视中国企业的投资。目前，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已经

超过 1000 亿美元，有 3100 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2015 年 12 月中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以来，中非已经签署各类合作协议 180 多项，涉及金额超过 220 亿美元。2016 年 7 月，中非又签署 60 多项协议，涉及金额 180 多亿美元，过去 15 年年均增速超过 30%。在贸易和投资额提升的同时，中非经贸合作结构和模式也不断优化创新，已从双边、单体发展为区域、集成式的合作，经贸合作区等合作平台的产业聚集效应初步形成。

三、促进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建议

（一）完善中非合作论坛平台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友好国家于 2000 年共同创立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在论坛框架下，双方就深入推进中非关系不断发展。论坛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目前已经成为引领中非关系发展的一面旗帜。

1.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高层对话。近几年，中非领导人高层互访不断、频频传出中非合作新成果。非洲已经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国，中国把非洲作为兄弟和全天候朋友，中非在战略发展的高度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

2. 认真落实论坛成果。2015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峰会”上提议，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其中，支持非洲工业化被列为十大计划之首，可见推动非洲工业化是今后中非合作领域的重中之重。中国愿在未来 3 年内同非洲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涉及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 10 个方面，中国将提供总额 6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中国企业需深刻领悟共识，全面稳步推进中非合作计划，做到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共建双赢。

（二）加强中非民间合作与交流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民间组织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近 10 年间中非民间交流逐步呈上升趋势，在促进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做出了应有贡献。

1. 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平台优势。激发民间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及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民间组织平台优势。

2. 做好中非企业间交流合作。民间组织商协会可弥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服务中国经济，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同时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提供有力的前方支援和后方保障。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在 8 年多的时间里，推动中非合作签约项目 400 多个，累计签约额

达 200 多亿元，已经成为推动中非合作发展的重要组织，得到了中非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三）了解当地法律、尊重地方风俗

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风险防范包括：战争及内乱风险、外汇禁兑风险、征收与国有化风险、治安风险、腐败风险等。需了解当地法律的渊源和外资企业进入的条件，做好市场调研以及了解当地消费习惯。非洲国家信奉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地方宗教，了解当地风俗是与其友好交流合作的基础。非洲是热爱歌舞的地区，虽然人民生活大部分比较贫困，但是他们有乐观的生活态度。

（四）正确评估风险做好应对措施

1. 做好投资成本核算。在非洲，工业产品、生活用品大部分都需要进口，物价与中国相比高出 50%~80%，而且工作效率不高，工期一般要比中国长 1 倍才能完成，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要计算的成本。以第一个走进非洲的企业华坚鞋业集团为例，华坚在非洲发展快速，目前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制鞋企业，其工资成本由中国国内总成本的 22% 下降到 3%，生产率是国内的 70%，尽管物流成本由 2% 提高到 8%，总体利润仍然大幅度提高。

2. 加强安全管理与风险防范。非洲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态度主要通过外国投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声明来表明。政策声明表明了一国在与投资相关的行政、立法上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有重大意义。在关于非洲土地、能源、矿产方面的投资一定要有国家议会的文件和批复才具有法律效力，要依照当地的法律办理各种证照与许可证。投资非洲建议通过专业的平台组织机构、专业的中介服务，合理规避法律等方面的风险。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研究与探讨

朱 杰 任超锋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以及探讨金融支持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府支持、金融支持、保险支持、“走出去”企业的建议。政府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如通过签订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维护中国“走出去”企业利益，大力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金融方面，加快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创造出更多的融资品种，缩短融资链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保险方面，完善保险市场体系，拓宽保险资金来源，加快发展再保险市场，大力发展保险中介机构；企业方面，坚持国际工程优先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注重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防范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关键词：金融 企业 走出去 工程承包 装备制造

作者简介：朱 杰，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
任超锋，中国电建集团国际事业部高级经济师。

一、引 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发展中也面临着市场空间有限，资源供应瓶颈，产业升级加快，贸易摩擦激烈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走出去”发展战略，鼓励、支持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利用国外、国内两个市场，利用国外、国内两种资源，对外直接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收购国外优质资源及优秀企业，将中国技

术、中国设备、中国产品、中国服务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十分英明，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2014 年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2015 年 1 月下旬，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这表明，国家已经把“金融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列入正式的工作安排，因此，对中国“走出去”企业加大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进行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国家之间的经济界限被逐步打破，在全世界范围内，产品与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全球市场已经基本形成。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无法逃避，只有勇敢地参与到竞争中去，要么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行业的领导者，要么成为国外大企业的附庸，要么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一个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要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者，就必须面对全球的竞争者，企业自身要做到国际化，要有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对外劳务合作中去。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背景。

从国内情况来看，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 30 多年。再过 10 年左右，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还远不是一个经济强国。要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十分注意经济发展的质量，必须培育、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的跨国公司。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难题：较多的过剩产能亟待消化，很多国内成熟产业急需向国外转移；近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需要提高其使用效率；中国企业打破西方贸易壁垒，开拓海外市场的要求十分迫切；国家寻求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的工作刻不容缓。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大金融、保险行业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支持力度。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内背景。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特点及其发展前景

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 3 万多家。中国铁路、中国核电、中国电建、中石油、中石化、华为、海尔等装备制造骨干企业积极开展跨国经营，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建、港湾、机械装备、上海建工等大型专业工程公司在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中的优势和骨干作用日益显著，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笔者以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为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特点及发展前景进行分析。

（一）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2015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跨国并购总金额 141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21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在国外各类劳务人员达 53 万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平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率稳步增长。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 1 2009—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完成数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对外直接投资	565.3	688.1	746.5	878.1	1078.4	1231.2	1412.3
同比增长率（%）		21.7	8.5	17.6	22.8	14.2	14.7

资料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表 2 2009—2015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对外工程承包	777	922	1034	1166	1371	1421	1541
同比增长率（%）		18.7	12.2	12.7	17.6	3.06	8.2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www.chyxx.com。

（二）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的特点

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呈现六大特点：一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自从 2002 年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制度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日益扩大。从 2003 年到 2015 年，中国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额从 20.8 亿美元增加到 1180.2 亿美元，13 年时间增长 56 倍以上。到 2015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超过 1 万亿美元。二是对外工程承包迈上新的台阶，2015 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分布在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项目不断增多，总合同金额超过 2100 亿美元。其中特许类工程项目 30 个，涉及合同金额超过 100 亿美元，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一运营（BOO）、公私合作（PPP）等。三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顺利，201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总计达到 148.2 亿美元，增长 18.2%；与“一带一路”相关 60 个国家签订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3987 个，合同总金额 926.4 亿美元；同期中国企业对国外电力、交通运输、通讯等直接投资累计 11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0.2%；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2%。四是民营企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新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民营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自

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及自主营销渠道，进行全球采购、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积极建立国际产业价值链。五是中国企业重视创新对“走出去”企业的推动作用，重视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及企业品牌建设，华为、腾讯、小米、阿里巴巴等企业成为走向世界的先锋队。六是集群出海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方式，到 2015 年底，中国企业组成团队，正在推进的合作区有 75 个，入区企业 1209 家，累计投资 70.3 亿元，产值 420.9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14.2 亿美元，带动了国内一大批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三）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装备制造行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与此同时，全世界产业结构出现加速调整趋势，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新的建设高潮，特别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重视。国际市场近年来出现的这些变化，为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3 年 10 月，习主席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广泛认同。2015 年 12 月 25 日，由中国倡议成立，57 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2016 年 1 月 16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举行开业仪式。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使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创造了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良好机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亚非拉广大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都非常薄弱，中国企业如果能够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合作中占有先机，将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提高起到较大推动作用，使“一带一路”和其他合作构想出现突破性进展，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市场前景广阔。近几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很大程度上是由既往经济发展模式中过于注重投资拉动所产生的，也使国内很多与此相关的行业出现了过剩产能，对目前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形成了制约力量。推动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的合作，让更多中国企业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作用，既可以为全球经济质量提升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也能够为中国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一个重要出口，为中国经济转型、提质增效创造有利条件。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方面，欧洲北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面临更新换代，推出了

庞大的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计划，旨在促进经济复苏和推动就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强劲的资金与技术需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投向桥梁、隧道、铁路、高速公路、水网电网、移动通讯设备等。这些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逐鹿全球市场提供了良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预测，发展中国家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刚性需求依然强劲，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发展机遇大于挑战。2016年以后，国际经济整体形势将明显好转，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将进入新一轮增值阶段，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10%以上。

三、金融、保险体系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在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和障碍，尤其是融资困难、金融服务不足、保险服务不力等问题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一）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的不足

1. 立法支持及政策支持方面亟待加强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全面的、完整的规范企业赴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职责不清、监督缺位、多头管理等诸多不足，不利于国家对企业“走出去”行为进行统筹规划。在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中国政府优惠贷款利息2%，而某些发达国家利率是0~1%。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较高且不能下浮。审批效率有待提高，审批链条有待缩短，一般一个工程的融资项目从立项到放贷需要一年左右时间。

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够，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太少

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其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太少、人员不足，且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对中国企业赴国外投资的金融支持服务不够完善，融资品种较少及融资数量比较小，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偏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条件和程序过于严格，很难找到符合条件并愿意提供担保费用的担保主体。

3. 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动力不足、配套支持不够

近几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其他民营银行纷纷在海外布设网点，积极

支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这些银行放贷原则以商业利益和控制风险为主。由于融资成本及利率相对较高，海外项目放贷经验不足，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支持海外投资的融资项目数量极为有限，业务量比较小，但发展潜力极为巨大。中国商业银行全球授信业务体系尚不完善，中国企业的境外子公司不能利用国内母公司的信誉与授信额度，国内母公司不能为其境外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企业跨国经营形成的资产不能作为抵押担保在境内贷款等。

4. 资本市场不健全，融资渠道单一

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尚不健全，对股票市场过分依赖，债券市场、场外市场发展滞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仅停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为企业筹资，不能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解决融资问题并提供完善的服务。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不能对接，中国企业没有海外融资权，不能通过发行债券、发行股票、成立基金的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

（二）保险系统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的问题

1. 为企业规避政治风险、信用风险而特设的保险机构尚不够完备

2001 年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对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最高赔付比率是 90%，对买方拒收货物造成损失的最高赔付比率为 80%。凡是投保的企业，一旦发生国家风险和买方风险，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先行赔偿。但目前中国缺乏保护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建立带有官方性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对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无法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中国融资型担保机构、投资保险机构数量不足，担保、保险方式不够灵活。而国外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对一些信用资质比较好的项目，无需提供银行担保和主权担保，可以直接根据借款人的信用提供保险，这种情况目前在中国还不能实现。

2. 保险机构保险费率太高，保险期限较短，保险赔付金额较少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费费率是由政府制定的，只能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上浮而不能下浮，保险费率偏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水电站建设等项目融资的商业风险赔付率为 50%，而西方国家对同类项目的赔付率是 92%。低赔付率降低了国内银行为海外项目提供融资的积极性，提高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综合成本，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竞标难度。中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取方式不够灵活，多采取一次性收费的方式，而国外保险公司可以分多次缴纳保费。

3.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够完善，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不足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负责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经营的机构，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这个机构不以盈利为目标，以保护中国海外投资为目的。其次，不能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家垄断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中国实力比较强的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如太平洋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中国人寿等也可以对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以分散企业风险。

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举措

为了进一步实施金融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应该在以下四方面共同努力。

（一）政府支持

1. 政府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建议政府加快推进有关企业海外投资、跨国经营的立法工作。建议我国政府尽快启动立法程序，首先将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促进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制度、规章、条例等经过修订整合以后纳入法制化轨道，例如政府主导制定的《企业跨国经营基本法》《海外投资促进法》等，为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其次，制定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及管理境外国有资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企业海外投资资金使用、金融工具使用、税收优惠、经营责任、审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企业海外投资经营进行监管，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 政府通过签订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维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利益

2014年10月1日，中国与加拿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正式生效，包括35条和6个附加条款。截至2015年1月，中国与123个国家签订了134份双边投资贸易保护协定。这些协议为保护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建议我国政府继续努力，争取早日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另外，当中资企业与已经签约的国家出现经济纠纷时，要迅速启动谈判机制，调动一切资源，据理力争，保护中资企业利益。

3. 政府要大力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培育一大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如果中国拥有一大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将显著增强中国主动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增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政府支持、培育中国优势企业成为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快国内立法，完善法制环境；增强对优势企业的金融支持与融资服务；建立为中国跨国公司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加大税收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加强人才培养服务；

加强信息服务；加强保险服务；加强企业海外权益保护；加大宣传及公关力度，改善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金融支持

1. 加快银行业本身的国际化进程

大力发展国家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民间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国家支持这些银行通过参股、收购外资银行等方式取得国际资源和经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以外汇储备多元化、社会资本多元化等方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长期外汇支持。政府在结算、保险、信息、法律、海外领事等方面，进一步落实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协调。加快境外人民币清算中心建设，在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金融与商贸中心城市陆续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与合作银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高效的货币直通渠道。

2. 创造出更多的，适合我国企业的融资品种

虚心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创新。中国企业除了通过传统的国内银行贷款、国外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融资以外，还可以采用金融租赁融资、票据贴现融资、股权出让融资、产权交易融资、增资扩股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以满足中国企业的资金需要。中国金融机构现在拥有充足的外币头寸，应主动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改变传统的企业找到工程项目再寻求金融机构来解决融资保险的局面，通过金融机构与业主所在国签署战略框架，形成先有资金后有项目的贸易方式，提供集中高效的信用服务。

3. 缩短融资链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银行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对于直接与贷款联系，但没有实质内容的收费项目，完全取消。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登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机构的收费行为，不得超过规定标准。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和发放效率，通过提前进行年度审核制度、续贷审批、设立循环贷款等减少企业高息融资。对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直接进行滚动融资，优化审批程序，缩短审贷时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扩大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降低商业银行发行企业金融债的门槛，简化审批流程，扩大发行规模。

4.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首先要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完善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制度，发展适合不同投资者群体的多样化债券品种，促进债券跨市场顺畅流

转，加强债券市场信用约束，健全债券违约监测和处置机制，防范道德风险；最后，大力发展私募市场，私募市场主要指面向特定对象，采取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进行交易的金融市场。私募市场在我国刚刚起步，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巨大，培育私募市场，可以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拓展市场服务范围，增强对新兴产业、企业的服务能力，有效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

（三）保险支持

1. 完善保险市场体系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国家唯一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充分发挥其对中国“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的作用。公司要进一步完善业务流程，增强海外信息收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提高网络平台处理能力，帮助我国企业及时获得高质量的国别、行业、企业资信及采购商等商业信息，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稳步提高服务质量，合理降低保险费率，实行差别待遇，对于信誉好，自控能力强，赔付率低的企业，给予优惠的保险费率。建议政府增加保费补贴金额，降低出口企业投保成本，促进出口信贷业务的发展。

2. 拓宽中国信保的资金来源，推进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扩展

建议国家要按照国际惯例为出口信用保险基金建立合理的补充机制，根据出口规模、国家财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适时补足风险基金。此外，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手段拓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本金来源。放开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吸收国内有实力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营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使中国出口企业更容易获得贸易融资，出口企业的风险也降到最低程度。扩大政策性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区域性、专业性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应当多渠道、多形式“走出去”，为中国海外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3. 健全政策体系，加快发展再保险市场

中国的再保险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目前有9家中、外资专业再保险公司，境外有200多离岸再保险人接受中国再保险业务。再保险有效分散了风险，减轻直保公司现金流压力，在支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再保险通过提供稳定的承保能力和向全世界分散风险，有力地支援中国钢铁、电力、通讯、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建设，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与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发展。下一步还要加速培育和发展再保险市场主体，引导国内资本投资成立再保险公司，吸引更多的国际保险人来华设立再保险公司。强化再保险对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支持保障功能。

4. 大力发展保险中介机构

保险中介机构是中国保险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险中介机构肩负着促进中国保

险业转型，助力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使命。中国要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成分、多形式的保险中介机构市场体系。首先，要培育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龙头型保险中介机构；其次，还要发展一大批微小型、社区化、店面化经营的保险中介机构，建成功能定位清晰、准入退出顺畅、要素流动有序的保险中介市场体系。政府要大力支持保险中介机构提升专业能力，在保险产品开发、风险定价、防灾防损、理赔服务、损失评估、反保险欺诈调查等方面主动作为。支持龙头型保险中介机构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鼓励龙头型保险中介机构主动服务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一带一路”和海外项目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与保险安排服务。

（四）企业“走出去”

1. 坚持国际工程优先发展战略

中国装备制造及工程承包企业要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及“走出去”战略，建立企业的远期战略规划，中期战略重点及近期目标。例如，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发展核电列为重点，未来 10~20 年，全球计划建造核反应堆 158 座，新增约 1.5 万亿美元投资，我国核电企业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平台，把中国核电企业打造成一个包括技术输出、装备输出、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的总承包商。远期目标是占有全球核电市场近 1/3 份额；中期战略是制定好“十三五”核电“走出去”发展规划，并切实执行；近期目标是建设好英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阿根廷四个核电总承包项目。

2.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需要

中国“走出去”企业可以通过不同层次的国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可以通过传统股票市场募集资金，还可以通过企业发行债券融资；不断拓宽外汇来源渠道，除了从国内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民营银行贷款以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设立海外投资基金是世界各国推动本国海外投资的普遍做法，建议单独设立海外投资基金，支持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基金适用程序与方法应该简明、扼要、透明、规范，便于企业申请与使用；企业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创新等方式筹措资金，例如可以通过可转换债券、股权租赁、票据等来融资。

3. 注重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培养复合型的高端国际化人才

企业要有全球化思维，国际化视野。加强自己的核心能力建设，按照企业国际化的规律行事，投资以前要做足功课，对跨国并购、承包海外工程的目标、手段、优势、不足等要有清醒的认识，不急于求成，不盲目投资。中国企业要把队伍建设放在最重

要的地位，吸收、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政治，熟悉国际商务环境，具有谈判能力与谈判经验的国际业务营销人才，吸收、培养一批既懂得技术，又了解投资对象国语言、环境、文化的国际管理人才，吸收、培养熟悉本企业业务的国际法律人才或者雇佣当地著名律师、资深人士维护我国企业利益。

4. 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

中国“走出去”企业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爱护当地资源，保护当地环境。企业要做到人员国际化、生产国际化、销售国际化、研发国际化。在当地销售产品，将利润汇回国内，在投资国扎根，在东道国发展。全面实现本土化，才能成为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实行本土化经营，可以促使中国企业利用当地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减少生产成本，降低商品库存，缩短生产周期，节约运输费用，取得竞争优势。实行本土化经营策略还可以打破所在国的贸易壁垒，分散客户风险，享受关税优惠，对冲汇率风险，取得原产国生产和避税优势。

5. 企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还存在着国家资源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政局动荡、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危及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投资安全及人员财产安全，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万全的应对策略。中国企业在参加招标投标时，报价不能太低，尽量争取一些优惠的合同条款；承接到项目以后，可以通过分包、转包的方式转移一部分风险，当然要减少一些利润；当判断某些风险由于不可抗拒原因无法避免时，果断停止实施项目，及时撤走人员设备，尽可能减少损失；还可以选择多家国内外有实力的保险公司投保，转嫁风险；与国内同类企业和西方国家大公司充分合作，共同防范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人民日报》2015年1月29日。
2. 梁琦：《关于我国优势产业国际化的思考》，《开发研究》2009年第4期。
3. 徐忠等：《金融如何服务企业走出去》，《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
4. 杨韬：《中国海外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期。
5. 朱杰：《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探讨》，《全球化》2014年第6期。
6. 刘英奎：《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艾 冰

· 宏观经济 ·

建设循环城市，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杨 亮 陈波平

摘要：中国的城市 and 城市化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压力，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国际社会的探索表明，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不仅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要进一步追求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即建设循环城市。循环城市理念超越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涵盖广泛的制度、金融、经济、技术创新，旨在创造宜居、健康、参与性和服务性的城市。它还意味着必须提升城市的能源和资源自给率，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以及气候适应能力。循环城市也反应了中国的“新常态”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以人为本、中速发展、鼓励创新、扩大内需等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循环城市的建设要求决策层有长期的视野、强烈的政治决心和高效的领导能力，同时鼓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充分利用公众参与，推动合理的规划和发展，并加快整个转型过程。

关键词：循环城市 资源循环再生 新型城镇化 海绵城市

作者简介：杨 亮，世界未来委员会中国项目研究员，德国基尔大学景观—人类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陈波平，世界未来委员会中国项目总监。

一、循环城市理念

（一）国际背景

全球 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 2030 年，近 60%的世界人口，即约 50 亿人将聚

居在城镇地区。作为商业、文化、科技、生产生活、社会发展的枢纽，城市在带给人们空前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快速的城市化导致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贫富差距、文化冲突等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可持续的城市繁荣与发展已成为 21 世纪全球社会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因此，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倡导新型可持续的发展，并赋予城市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引领作用。2015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批准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一政府间协议的第 11 个具体目标，也被称为城市 SDG，特别强调了“使城市和人类居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有恢复能力和可持续”。

继联合国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2016 年 10 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Quito）举行了联合国全球峰会——人居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近 200 个联合国成员国共聚一堂，共同发布了一个“新城市议程”。该议程提供了一个协议性的、不具约束力的准则和策略，为未来 20 年全球城市居住区的发展提供指导。该文件预计将协助各国政府制定明确的指南，支持构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发展政策框架，以应对城市化挑战。

当前，全球许多城市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消耗和浪费着各种资源，也正在遭受着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诸多严峻的环境威胁，很明显，维持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不行的。无论是新城市的规划管理还是旧城区的更新改造，其现有发展模式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转变。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批准以及全球新城市议程将毫无疑问地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带来广泛的发展机会。这意味着要超出传统上的可持续性概念，建设循环再生型城市，即不再把重点放在维持城市的资源环境系统运行，而是强调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真正满足城市发展和环境改善同步的要求。

（二）循环城市的基本理念与目标要求

循环城市可以被定义为：能够循环利用资源并持续地恢复和改善其与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城市。具体来说，循环城市就是要重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循环与互动关系。循环城市发展理念使城市从线性的“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的系统转型为与周围生态环境互惠共生的系统（图 1）。传统的可持续理念要求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循环再生理念则追求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在循环城市系统中，城市不仅消耗资源而且还能够自我生产资源以及再利用所产生的废弃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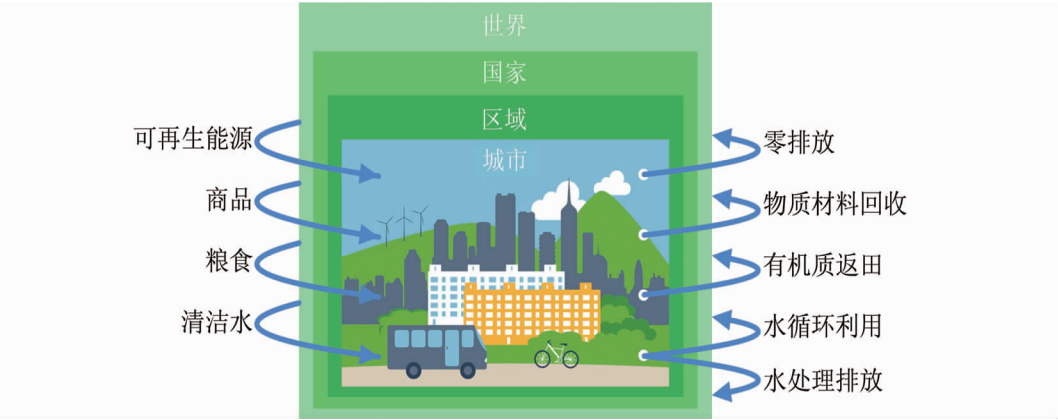


图 1 循环城市概念

循环城市的发展包含三种基本的循环特点（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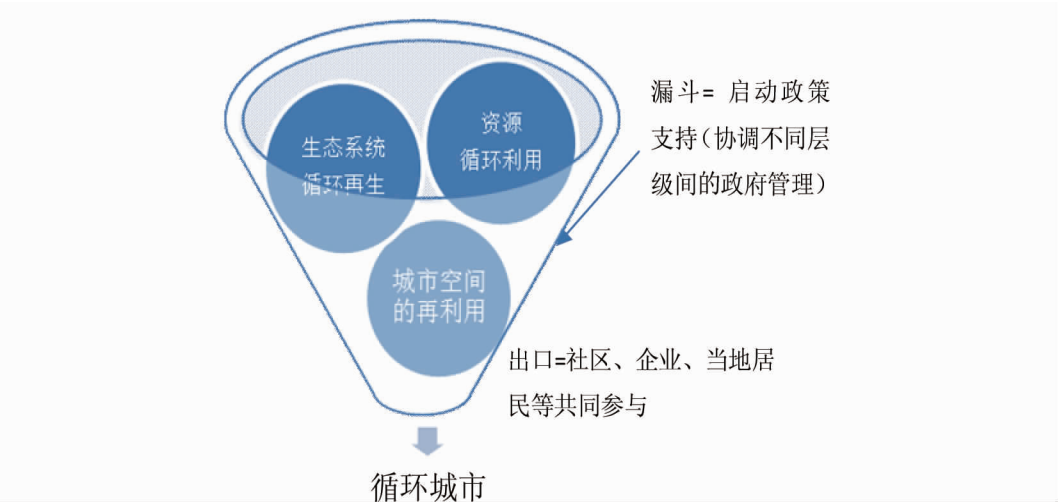


图 2 循环城市的基本循环特点

1. 资源循环利用

高效化：减少资源消耗，要求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源头上减少消耗，节约资源使用量。循环化：向垃圾要资源，要求大力提升垃圾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率。服务化：提倡功能性超越所有权的理念，要求注重资源的实用性，将资源配置在最能发挥其功效的地方，而不是低效或闲置于拥有者手中。

2. 生态系统循环再生

城市是生态系统循环再生的中心：激励城市扮演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循环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城市是生产系统的枢纽：将城市从单纯的资源消费者转变为同时也是自然资源生产者。城市是决策管理的领导者：推动分散化管理和相关的政策支持，

鼓励基层组织或个人积极参与循环发展实践。

3. 城市空间再利用

紧凑结构：更新升级现有的布局而不是大规模扩张，利用高效紧凑的规划设计提升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以人为本：建设包容性、安全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社区，以居民生产生活总体方便舒适为核心。绿化空间：鼓励推行绿色建筑发展，充分考虑绿化区域的规划建设。

循环再生愿景的核心在于建立和促进城市与其周边区域之间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循环城市发展就是希望模仿自然界的循环代谢系统，闭合城市资源循环系统。比如，循环城市将处理后的水重新引入到自然水系统中，提高对当地（周边）粮食的需求比例，处理并提取城市污水和废弃物中的肥料物质应用到周边农田里，极大地降低对石油产品的依赖并加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时，积极探索回收再利用废弃的资源 and 物质，使循环城市成为一个生产中心，促进城市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和谐互惠发展。这些措施有助于在本地、区域以及全球范围内增强生态系统的可再生能力。

二、循环城市理念符合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虽然让中国在减贫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受益匪浅，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压力，如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态退化等，对人民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并危害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人口城镇化不彻底、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均等、服务业发展滞后等主要问题。

第一，城镇建设比较粗放，占用土地过多，集约化程度不高。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扩张下，一些城市新开发地区住房、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粗放式蔓延，利用效率低下。而且由于大面积的土地扩张，生产发展和生活配套设施跟不上，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也导致集约化程度不高。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前提下，如何满足城镇化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提高人居环境质量，都是今后一个时期诸多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二，城镇化体系不合理，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甚至过分拥挤。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过度发展带来城市的臃肿和效益下降，中小城市发展步伐缓慢，未形成较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差距过大，城市间的协调互惠体系难以

建立，区域经济基础薄弱，城市极化效应突出，为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带来困难。

第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当前很多城市仍然偏向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对关系城市居民生活的社会性公共服务缺乏足够的重视。老城区在长期的发展中虽然有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系统，但随着人口的集聚，公共服务支撑能力已经严重不足。新城区以及郊区普遍存在着环境污染、入学困难、医疗卫生设施缺乏、公共安全风险较大等问题。尽管大部分城市各项公共服务水平都在改善，但总体来说还处于较低水平，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

鉴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严峻挑战，转变思路，改变现状，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应该充分考虑建设循环再生型的城市，以建立城市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这种循环再生型城市发展也反应了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当前被广泛讨论的“新常态”。“新常态”概念指出了当前中国发展中的实质性转变：廉价土地资源减少，廉价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速下降，日趋严重的环境威胁，并且指出了以人为本、中速发展、鼓励创新、扩大内需等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发展策略，这也正是循环城市发展所提倡的。

（二）循环城市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作用

作为区别于以往的城镇化，我国新型城镇化由过去的限制外来人口进入城镇向积极稳妥地将转移人口市民化转变，城镇建设和发展由过去的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城镇由过去的过分注重经营向服务市民转变，城镇政府公共服务由过去的只面向户籍人口向覆盖到全部常住人口转变，最终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并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城市群的科学、合理的体系。在实践中，这些转变需要更加具体的策略予以实施，而循环城市在诸多方面都可以满足上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并能够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图 3）。

第一，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循环城市强调城市与周边郊区在生产生活多方面紧密联系，增加从周边区域获取资源来满足发展需求，比如带动郊区农业、城市立体农业的发展，减少从世界各地的粮食进口。循环城市还要求增加利用本地资源，致力于提高能源资源自给率，比如开发屋顶太阳能、郊区风电等等。这些对本地资源需求的增加将带动乡村人口就业，加强这种城市一周边的紧密联系，城乡互动更加频繁，也有利于城乡统筹，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循环城市还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业人口，建议放宽中小城镇的落户条件。

第二，完善土地利用机制，创新投融资机制。循环城市要求城市空间集约型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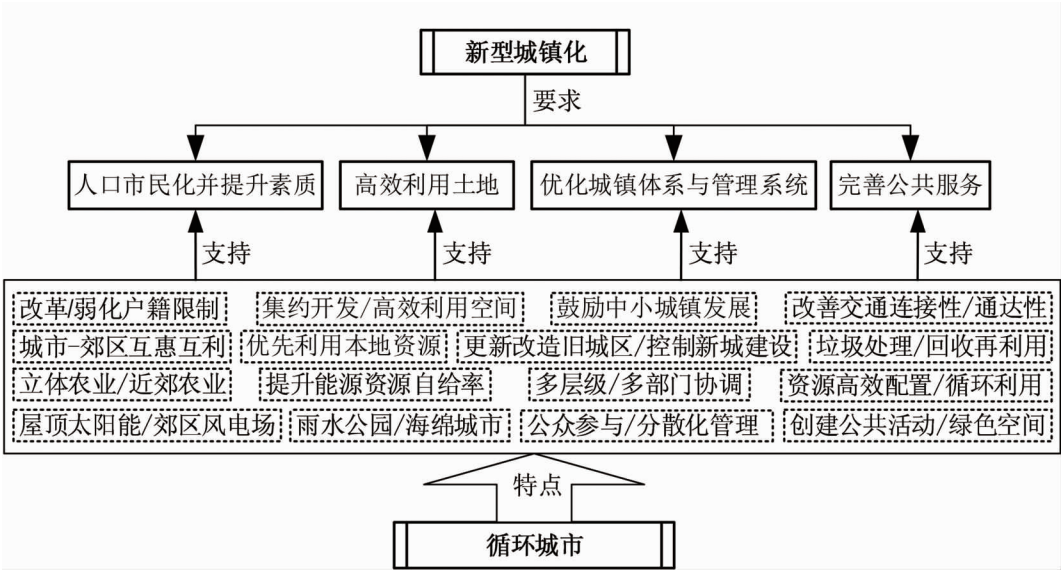


图 3 循环城市在多方面符合并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

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交通通达性和创造便利的人员交流空间，这种集约型开发有利于遏制城市扩张的冲动。同时，循环城市极力提倡可再生能源利用、智能科技创新和投融资创新。循环城市建设激励创新型土地、财政、投融资等政策，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的动力。

第三，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循环城市强调大中小城镇的互补性协调发展，比如城市中心发展高科技和服务业，郊区开发利用新能源，农村发展新型农业等。循环城市的区域性差别化发展导向引导人口均匀有序分布，合理优化城市体系和格局，实现以大带小，以小促大，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共同发展。

第四，全面提升城市多功能性，尤其是服务功能。循环城市提倡在城市及郊区开发新能源，如屋顶太阳能和风电场建设，规划城市立体农业，建设雨水公园和海绵城市等等，使城市自身成为能源、粮食、水资源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同时这些新型设施和空间还可以成为市民休憩、健身以及交流互动的场所。循环城市所强调的加强垃圾处理、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也有利于建设和维护清洁健康的城市环境。

第五，健全新型城镇化工作推进机制。循环城市理念旨在将城市多部门、多产业联合在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大系统中，因此它非常强调协调不同行政级别之间以及城市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过去的城镇化，除了创新不够、绿色不够、共享不够，还有协调不够。因此，除了创新发展之外，循环城市提倡的多层级协调和多部门协调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在这些方面，循环城市以城乡互动、产城一体、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础特征，高度契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三、循环城市发展的路径

世界各地的许多案例研究表明：循环再生的城市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好处（表 1）。如何充分调动城市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循环发展的实验田与领头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根据对循环城市理念的解读，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起步，部分地或部门性地进行循环城市建设试点。

表 1 国内外循环城市（区）案例及其发展路径

城市	领域背景	发展特点	关键路径启示
德国 法兰克福	能源：2010 年 87% 电力来源于煤、气、油。	目标在 2050 年实现 100% 利用可再生能源 (RE)； 主要靠提高能源效率节约约一半的能源消耗 扩张热电联产系统； 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	把节能增效放在首位。
加拿大 温哥华	能源：2015 年 RE 已占能源消耗的 32%，其中电力的 90% 为水电。	目标在 2050 年实现 100% 利用可再生能源； 电力、交通、供暖和制冷等行业逐渐采用 RE； 尤其在建筑行业大力降低能耗，并增加 RE 利用。	合理的时间规划，依次逐渐展开。
加拿大 卡尔加里	水资源：100%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已经成熟运行中。	城市废水处理、循环再利用； 污水中的有机质被提取，作为肥料还田； 处理后的水排放到当地河流； 沼气用作能源燃料维持处理厂运转。	政府引导，企业牵头，着眼于长远利益和社会效益。
丹麦 卡隆堡	工业：成熟的产业共生系统。	企业之间利用彼此的副产品或废弃物，降低运营成本； 发电厂产生的热蒸汽用于为周边工厂供热； 水泥厂使用电厂回收的粉尘等等； 城市工业系统年节约生产成本约一千万美元。	将企业废弃物或副产品重新利用，开发新价值。

续表 1

城市	领域背景	发展特点	关键路径启示
德国 汉堡	能源：在城市新区开发中力推 RE 应用，2015 年已实现 50% 的建筑用电来源于清洁能源。	到 2025 年全部建筑用电将由本地 RE 提供； 2050 年供暖系统也将全部使用 RE； 对新建建筑和更新改造全部采用严格高标准大幅降低能耗； 充分挖掘本地（易北河岛屿上）风能资源。	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 RE 潜力。
美国 旧金山	能源/电力：2010 年电力来源 19% 是核能，24% 是化石能源。	目标在 2050 年实现 100% 清洁电力； 在电力部门率先执行；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增加分散式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 促进水电和太阳能开发应用。	将供热和制冷系统电气化，从而使用清洁电力。
印度尼西亚 梭罗	发展规划：分散式参与式城市规划策略。	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城市政府完全自主决定城市规划发展； 法律规定至少 30% 开放空间，其中至少 20% 要对公众开放； 城市之间以及上下级行政部门之间有效沟通协调。	最大化公众参与，充分考虑基层民众需求。
德国 弗莱堡	绿化：最绿色的城市，德国“绿色之都”。	广泛开发生态建筑，被动建筑，节能建筑； 建设自行车道，推广屋顶太阳能，推广公共电车； 充分开发 RE，建设碳中和城市。	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切实的努力，促进交流和创新性思想碰撞。
中国 哈尔滨	水资源：城市雨水汇集、疏导和综合利用。	规划城市雨水公园，建设海绵城市； 雨水公园收集、净化和储存雨水； 雨水渗透到地下含水层，自然补给地下水； 保护并恢复当地自然栖息环境； 提供艺术美观的公共休闲空间。	超越传统的思维创新，先进的规划理念引导。

（一）加强资源高效利用和回收再利用

循环城市发展希望模仿自然界中的循环代谢系统，这就需要城市发展从旧的线性代谢转变为新的循环代谢。这也意味着要闭合城市资源利用系统，发掘城市废弃物的价值并投入到本地其他部门的再生产中。具体来说，应努力减少资源利用量，着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比如，推广绿色建筑，从源头上节约建筑材料和降低能源消耗，最大限度地减少垃圾和污染。再如，发电厂产生的废热可用于为周边工厂供热，各种工厂产生的粉尘、废渣等可以提供给周边的水泥厂、

砖瓦厂作为原料。加强垃圾分类管理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回收钢铁、塑料、纸张、玻璃、有机质等用于再生产，并将有机垃圾转化为能源或者肥料。

循环城市的能源目标是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因此要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本身也是一种适应性措施，因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实现在城市和周边区域分散化布局能源生产企业，这能够减少因某个能源工厂关闭（比如在洪水、技术故障或外界破坏等情况下）而影响到总体能源供应的风险。此外，相比常规发电而言，大多数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需要更少的冷却用水。

（二）促进城市与区域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城市资源自给能力的提升以及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是循环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能够生产自身所需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从而与它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循环发展。具体措施有：第一，城市的粮食供应可以由都市农业补充，包括建设立体农业工厂，鼓励小规模分散式屋顶农业发展，促进郊区农业发展等，提升本地粮食供应能力。第二，通过区域性雨水收集存储或通过大量城市绿地设施促进雨水下渗到地下水中以便存储利用，建设海绵城市就是这种典型的生态型水资源开发策略。第三，循环利用水资源。城市需要一个多级联动的水资源利用体系，以回收和再利用废水并从中提取有价值的营养物质，再将处理过的水排放到河流和海洋。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市（Calgary）就是一个优秀的例子（见表 1）。第四，通过在城市周边和部分城区人工植树造林，增强树木在城市中的生态和环境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木材等原材料。第五，大量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如屋顶花园、园林建筑，以减少污染物、固定 CO₂、调蓄水量、净化地下水源和缓解洪涝灾害等等。

建设循环城市需要通过促进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代谢，维护城市与周边环境的生态功能。除了粮食、水、土、绿地等生态系统，城市的工业、商业以及居民生活领域也应该加强探索促进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模式。这种城市生态系统自身生产能力的循环更新将引导城市与其周边区域乃至城乡之间，建立新型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三）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

随着我国城市从传统的扩张性布局向现代功能性布局转变，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和优化越来越显示出必要性和紧迫性。推动循环城市建设正好可以借助于这个大背景，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着手。

第一，更新改造现有城区，实现土地集约化高效利用。相比较于大量扩充新建设用

地而言，城市化进程的重点应该放在改造现有的城市结构和更新升级当前的布局方面，以提升城市发展密度。增加密度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有好处，比如高效利用能源、资源、物质、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等。同时，中心城区应适时抓住产业转型升级契机，进一步挖掘潜力、整合资源、突出重点，集约发展。针对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切入点可以是旧城改造、新区规划、存量土地盘活、工业用地腾退、产业功能组团式集中等。

第二，划定城市增长刚性边界，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特大城市有必要划定增长刚性边界，大中等城市也可以视情况划定区段性建设边界，以控制建设用地蔓延式增长。城镇建设项目选址建设均应控制在城市增长边界以内，以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为未来城市主要的建设空间，这同时也会激励集约化和高效率的空间利用形式。

第三，优化交通设计，提高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达性。循环城市强调要让城市以人为中心，增加交通通达性、交流便利性和社会包容性。实际建设中，应突出公共交通优先的理念，优化公交系统的网络布局和换乘便利性。

第四，开展组团式、廊道化的城市布局规划。组团式即按照功能性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优化重组城市功能，明确各城区组团的功能定位，错位发展，同时也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打造特色城区品牌。廊道化即建设城市通风廊道、绿道、“蓝网”、文化带等系统，确保城市有丰富的自然通风、植被绿地、水域湿地和文化休闲区域，像血脉一样联通城市的各个特色组团。

四、中国循环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虽然循环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均已取得了蓬勃发展，但迄今为止，全球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循环城市，甚至对于循环城市也没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概念。纵观国内城市编制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其所依据的思维观念、基本原理和采用的模型方法多有缺失和弊端，因此，完善循环城市概念内涵，推动循环城市在中国的发展仍需要各个层面的协同努力。

（一）制定发展愿景，发挥引领作用

循环城市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无法勾勒出一个不同于现状的未来，同时人们也缺乏对这种未来必定会实现的信心。因此，能够设想一个不同于目前现状的未来情景是摆脱不可持续发展桎梏的关键。这样一个设想的良好生活环境就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也是指导行动的纲领。比如，美国旧金山市前市长积极参与制定全市 100% 可再生能源发

电目标和计划，德国法兰克福也以 100%可再生能源为发展目标。上述愿景说明，如果集中于城市优势领域，率先实现部分目标，则能引导长远目标的逐步实现。具体到中国的城市，第一步就是要设立定性或定量的目标。设定目标能够显示并传达政治意愿、决策勇气、领导能力和远见。目标的设定直接为行动提供了动力，能够促进变革；设定目标还会激励更多的参与者参与进来。因为，明确而直接的政策导向让人感觉到投资的安全性，更能吸引投资者。但仅设定目标并不能确保方案落实到位，还要有相应的发展路线图、渐进式发展策略以及阶段性评估指标作补充，总目标的设定才能更加行之有效。

中国的城市也应该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居Ⅲ的倡议，并承担更大的责任，率先推动转型发展。中国的城市不能再被动地等待来自国际同行与国家立法方面的推动，而应在国际规则的起草工作中主动积极发挥作用，并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尽管各国政府是制定总体政策框架的关键，但城市和地方政府才是真正要落实具体解决方案的主体，当地的发展意愿与领导力至关重要。

（二）创新激励机制与投融资机制

目前大部分城市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经济发展，缺乏催生城市生态环保创新的有效机制。生态环境建设融资难的根源也并不是缺资本，而是难以吸引资本。要催生这种创新，必须要有有力的激励机制，让生态环保创新能够有利可图。

第一，建立对政府官员评估的新机制和新标准。这些机制包括新的官员奖惩措施和面向过程的考核指标，比如摒弃“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唯一标准”，建立“终身问责制”。一个正式的评估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评估地方官员在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绩效，并可能成为他们优先推动环境保护的动力，这也将有助于明确责任和建立问责制。

第二，针对循环城市理念所强调的公共服务、资源效率、生态修复等领域，可以适时放开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等，引进新的和替代性的融资机制以在局部范围内调动金融资源。包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私募融资等。同时建议改进公共资金分配方法（例如参与式预算方案）。适当条件下也可以在市域范围内采用创新性和地方性的税收制度试点，如碳税、垃圾税或污染税以及其他财政或税收为基础的机制，以保证相对于资源密集型的项目来说污染较少的项目能够更加受到青睐。

第三，大力支持绿色科技研发，围绕智能和高科技解决方案而发展的城市经济将是循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急需发展和扩张的重要技术领域有：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提升、废弃物管理与回收、交通运输管理、都市农业、生物修复、可持续绿色建筑等。

（三）加强城市资源环境标准、准则的制定

首先，部分城市可以尝试建立操作性强的城市资源环境建设标准或指南，明确实施资源环境规划和建设的具体工作细则、范围、内容、职责分工、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等，使资源环境的规划和建设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其次，应尽快对城市环境建设立法，使环境建设有法可依。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制度准则，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尽快制定与国际标准趋同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环境规划建设准则，使城市环境的标准规定全面、操作性强、应用广泛，避免随意性、片面性和局限性。第三，建立环境审计制度。可以参考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资源环境审计委员会的《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等资料，建立适合于我国的资源环境操作规程与作业方法，其内容应考虑资源环境审计的基本技术标准和评价指标，并考虑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环境绩效审计、环境风险评估等方面。其中的评价指标应从不同的审计对象与审计目标出发，分别建立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施开放发展策略，吸引全社会积极参与

一方面，有力的领导和强烈的发展愿景还需要辅以宣传、教育和良好的沟通才能促进落实。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不应只是循环城市发展的受益者，他们也应参与到规划管理过程中。同时，广泛的民众支持也会让循环城市发展的宏大目标更容易实现。

吸收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划过程有利于考虑多样化的诉求，这已被证明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除了让那些积极主动的群体参与进来，循环城市发展的领导者们还应该有意识地接触那些通常被忽视的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例如，残障人士也应被考虑列入利益相关方参与社区规划过程，他们的特别需求和权利也应在最终的方案中得到体现。同样，移民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比重较大的城区，相关发展规划的设计也应该适当考虑他们的想法。公众参与城市改造与发展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那些对自己城市感到自豪的居民会感受到更强的主人翁地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收获”，当地居民会更加投入地参与到改善自身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来。

（五）加强城市部门及区域间协调

城市系统是个多要素相互交织的网络，某一点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整个网络的变化。资源问题不仅超越城市边界，其与外界的广泛联系更涉及到很多个城市部门。而在单一部门范围内考虑任何问题都会是低效的或者远远不够的。循环城市就是要放弃封闭单一

的方法，综合考虑多种资源利用系统，跨部门寻找资源利用的最佳方式。

一种方法是建立专门的机构或办公室来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寻求综合性发展战略，促进跨部门的规划、实施和协同增效，实现统一行动。构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采用更综合的办法不仅有利于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利于推动创新，大部分的创新和创造性的想法得益于自由思考和跨界合作。我们建议创建正式的、制度化的平台以促进和协调跨部门的合作。同时，城市的循环发展也要求跨区域的合作。比如在水资源的管理与供应中，就必须要考虑整个流域的情况，这就要求城市当局与周边更大区域的管理机构进行沟通。加强地方、区域以及中央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也有利于推动从国家层面出台激励性城市发展政策，鼓励更多的地方机构采取大胆的行动或实施改革措施。国家层面的管理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可以适当地推动分散化管理。循环城市发展中的高效治理遵循辅助性原则，即提倡政府将部分权力和职责下放至能够有效履行此种权力和职责的最低管辖层次。

（六）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优秀的解决方案及其实施通常是由广泛的合作和开放的对话所促成。全球的城市都在以日趋开放的心态，与其他城市分享他们的问题、挑战与解决方案，中国城市也应积极加入进去。当前，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合作交流的平台已经很多，各地政府部门应该有选择性地支持这种平台的建设。例如，许多中国城市和世界其他城市结成姐妹城市，这种联系可以用于加强知识交流或者是促进建设性的竞争。前面提到的联合国的平台与倡议，包括近期举行的人居Ⅲ会议，都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展示形象、分享经验和交流学习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仇保兴：《城市生态化改造的必由之路——重建微循环》，《城市观察》2012 年第 6 期。
2. 格林斯坦等著，丁成日等译：《循环城市：城市土地利用与再利用》，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4 月版。
3.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行政管理改革》2014 年第 4 期。
4.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6）8 号]》，2016 年 02 月 06 日。
5.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 号]》，

2015年10月11日。

6. 李伯华、何清华、刘沛林：《循环城市建设的动态测度及实证研究——以衡阳市为例》，《生态经济》2010年第12期。

7. 李树华：《共生、循环——低碳经济社会背景下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基本思路》，《中国园林》2010年第6期。

8. 世界未来委员会（WFC）：《循环城市——通向理想城市之路》，2015年。

9. 唐双成、罗笸、贾忠华、袁黄春：《西安市雨水花园蓄渗雨水径流的试验研究》，《水土保持学报》2012年第6期。

10. 王雯雯、赵智杰、秦华鹏：《基于SWMM的低冲击开发模式水文效应模拟评估》，《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1. 邢薇、赵冬泉、陈吉宁、王浩正：《基于低影响开发（LID）的可持续城市雨水系统》，《中国给水排水》2011年第20期。

12. 张彪、谢高地、薛康、王金增、肖玉、张灿强：《北京城市绿地调蓄雨水径流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生态学报》2011年第13期。

13. 章林伟：《海绵城市建设是中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建设报》2015年11月12日。

14. 住房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2014年10月。

责任编辑：艾 冰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 年 10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化放缓对经济构成威胁

联合国 2016 年 10 月 6 日警告称，全球各地企业海外投资的放缓将威胁贸易增长和整体经济，并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全球化和避免对有国际业务的企业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一份报告中称，全球企业今年的海外投资规模将减少 10%~15%，外商直接投资（FDI）从 2015 年的 1.76 万亿美元下降至 1.5 万亿~1.6 万亿美元。预计 2017 年全球 FDI 将增长 8%，但规模仍将低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普遍水平。预计二十国集团成员 2016 年 FDI 流入将减少 5%~10%，亚太经合组织成员 FDI 流入将下降 15%~20%，但金砖国家 FDI 流入有望增长约 10%。

贸发会议称，导致 FDI 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缓慢和利润下滑，各国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鼓励跨国公司将总额 6 万亿美元现金的一部分用于投资。2016 年 FDI 下滑主要反映出全球经济脆弱、整体需求持续疲软、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部分跨国企业营收暴跌等。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表示，全球 FDI 的下滑趋势令人不安，因为全球经济正急需投资拉动和刺激。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称，企业没有将上述现金转化成真正的投资，部分原因是缺乏需求和投资机会，但主要是因为政策环境欠佳。政策制定者应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时期，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活动面临的监管和行政障碍似乎影响不大，但在经济困难时期，这些不利因素却会成为商业活动面临的大问题。

（二）全球经济将持续低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 2016 年 10 月 14 日在“2016 浙商·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经济低速增长、低投资、低贸易增长、低全球资本流动增长、低油价、低通货膨胀，这是很多年里没有见过的现象，是一个全球经济的新变局。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低”的世界经济格局之中会是大概率事件。

未来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会下降。第一是投资下降，相比 2007 年，发达国家整个投资水平跌了 20%~25% 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其中主要跌在企业，很多企业不投资，而低投资是决定低增长的主要方面；第二是全球处于一个人口结构大变化的根本格局变动之中，虽然人口持续增加，但是发达国家人口逐渐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只有非洲或者南印度地区人口在增长，人口增长从高生产力、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低生产力、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全球人口的根本变化，也拉低了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全球收入分配恶化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中产阶级收入下滑，是总需求下降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提高，居民对贸易产品的需求弹性下降，以前从来没有过，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个现象。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也是投资下降和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科技进步给企业的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滴滴、空中食宿的崛起对传统汽车制造业、旅馆业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创新对企业投资的冲击是双面的，因为企业不确定未来在哪儿。

过去五年来，很多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财政刺激不断上升，许多国家也采取了负利率政策，货币政策的空间也不大了。全球经济活动在普遍的“低”水平，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所以全球经济低迷还将持续。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经济担忧被夸大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近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着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担忧被夸大，他相信中国能够实现对经济结构改革所做的承诺，中国经济能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型社会，同时成功地躲开周期性阻力。假如没有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可能早已陷入衰退。根据 IMF 数据，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 17.3%（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6.7%。假如没有中国，IMF 所预测的 2016 年全球经济 3.1% 的增速将放缓至 1.9%，远低于被视为经济衰退门槛

的 2.5%。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将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和巴西等资源型经济体将遭受重创，这些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接近 9%。中国在亚洲的贸易伙伴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 6 个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总计为 11%，如果中国经济崩溃将至少导致它们的总体经济增速被拉低 1 个百分点。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前者经济若崩塌或拖累后者原本低迷的经济增速下拉 0.2~0.3 个百分点。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其严重依赖出口，如果中国经济崩溃将大幅拉低德国的经济增长，进而导致整个欧盟的经济受挫。

据 IMF 估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和巴西这五大经济体今年经济共计将下降 0.7%；美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为 1.6% 左右。罗奇称，他将是第一个承认假如没有中国经济增长、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将陷入巨大困境的人。看空中国的人需要对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后果十分小心。

（二）中国短期增长承担的代价是中期风险加剧

惠誉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已经超过五年，期间多个重要方面已经取得再平衡。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工业退居其次。与此类似，收入的上升促进了消费者支出的良性增长，有助于抵消投资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惠誉认为，对重工业和投资依赖程度较低的增长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持续性。

惠誉高级分析师 Dan Martin 认为，结构再平衡之路仍然漫长，尤其是经济增长仍然持续依靠信贷扩张刺激。2016 年 8 月份，虽然增速相对数年之前有所放缓，但银行贷款同比上升，且远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预计到 2018 年底中国的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高达 269%。较大比重的新增信贷流向了居民部门，特别是以住房抵押贷款的形式，而流向杠杆率较高的企业部门比重较低。与美国和韩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较低，这意味着他们能增加借贷而不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住房抵押贷款有严格的贷款限制，以确保放贷标准不会下降得太多。尽管如此，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仍然可能有潜在隐患，并且似乎正在助长房地产价格的急升。此外，还可能存在企业以价格飞涨的房地产作为抵押品以获得借款的风险。

总体信贷增长回升是因为政府致力于达到经济增长目标。2015 年，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偿债成本，并使借款人更容易获取信贷。目前增长已经趋稳，整体看来可能与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6.5%~7.0%）以及惠誉预期的增长率（6.5%）大致符合。因

此，2016 年下半年进一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已经得到缓解。然而，短期增长所承担的代价就是中期风险加剧。银行业资产质量显著恶化的风险持续上升。惠誉研究显示，一次性全额计提不良贷款有可能造成银行面临 1.1 万亿~2.0 万亿美元的资本缺口，如果信贷继续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本缺口在未来数年内会进一步扩大。

（三）中国经济再平衡惠及全球

2016 年 10 月 9 日，为期一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结束。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表示，大家对中国的论调完全变了，从 2015 年的股市危机到现在，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并证明了其稳固实力，可以看到这次会议上对中国的担忧变少了，更多谈到中国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

中国经济的成功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下去，而且可能有助于支持全球复苏，但是，中国若要能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则需进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IMF 正在与中国合作，确保相关改革能够落实。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说，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对全球系统有重要性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有巨大的溢出效应，这体现在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上，也越来越体现在金融体系上。IMF 最新的报告显示，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与开放程度，中国在过去 10 年对全球进口需求的激增使得中国成为世界 100 多个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市场，而这 100 多个经济体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80%。

标准普尔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万达表示，中国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过程非常明显，对提升整体的区域经济有明显作用。制造业升级对周边国家工业化有良好影响，另外，在中国向消费经济转型中，目前对服务业的进口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世界银行和 IMF 年会对中国的另一大论点为，中国仍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其中信贷的扩张、房地产的风险令人担忧。从长期来看，建议中国征收房产税，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有利于更好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房产税从立法到实施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应对短期房价过快上涨问题。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也建议中国出台房产税。李昌镛还警告称，信贷增长过快、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国企改革缓慢可能会给中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

（四）外资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摩根士丹利在 2016 年 10 月上旬发布的报告中将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此前的 6.4% 和 6.2% 分别上调至 6.7% 和 6.4%。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中国政府财政支持会带来周期性增长势头，且外部需求更强劲。

瑞银集团也小幅上调中国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6.7%，理由是受益于消费等内需稳

定，工业生产同比增速持平，服务业增加值有望在房地产业的推动下小幅改善。该集团分析师指出，2016 年以来强劲的房地产活动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和工业投资，并提振相关消费。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上升，成为驱动增长的动能所在。有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和工业增加值稳定增长，消费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不断增强。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也发文驳斥了“中国经济崩溃论”。他认为中国有战略、财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将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型社会，同时能规避周期性危机。

高盛认为，中国经济正从投资、制造和出口型为主的“旧经济”向消费与服务型为主的“新经济”转型，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的地位显示出升级趋势。

“新兴市场教父”邓普顿新兴市场团队执行主席麦朴思表示，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发动机，乐见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内消费，以及人均收入增长的事实。像阿里巴巴这样的超级电子商务巨头的出现，足以证明中国国内需求逐渐上升。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消费增长，预计这种增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新兴市场之一。

（五）中国经济指数明显回暖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和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2016 年 11 月 7 日联合发布的第 39 期中国经济调查（CEP）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指数明显回暖，中国经济景气指数从 -13.89 上升至 -7.1。尽管中国化解产能过剩，释放金融风险的压力不容忽视，但中国经济继续得到政府财政发力和改革红利的推动，全线上扬。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 6.68%，与 2016 年 9 月份调查数据相比，上调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未来三个月中国通胀率为 2.08%，未来一年的通胀率为 2.35%。物价环境明显受到资源价格改善和对未来经济景气乐观态度的影响，长短期消费者价格指数预测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弹格局。本期商业银行景气指数比 9 月份调查数据上升约 2 点；投资银行的景气指数上调约 17 点；保险的景气指数上调约 13 个点。受到财政发力和国企改革的利好影响，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景气指数双双呈现上扬的态势。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0 月)				
世 界	3.4	3.1	3.1	3.4
发达国家	1.9	1.9	1.8	1.8
美 国	2.4	2.4	2.2	2.5
欧元区	0.9	1.5	1.6	1.4
日 本	0.0	0.4	0.3	0.1
发展中国家	4.6	4.0	4.1	4.6
印 度	7.3	7.5	7.4	7.4
俄罗斯	0.6	-3.7	-1.2	1.0
巴 西	0.1	-3.8	-3.3	0.5
世界银行(2016 年 6 月)				
世 界	2.6	2.4	2.4	2.8
发达国家	1.7	1.8	1.7	1.9
发展中国家	4.2	3.4	3.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1 月)				
世 界	2.8	2.9	2.5	2.8
美 国	2.4	2.6	1.5	2.2
欧元区	1.2	2.0	1.6	1.3
日 本	0.0	0.5	0.6	0.9
印 度	7.2	7.6	7.6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7	2.6	2.3	3.8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2	2.4	3.9
发展中国家	3.7	-0.6	2.3	4.1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6	1.8	3.5
发展中国家	2.9	1.3	2.9	3.6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为出口量增速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0 月)				
发达国家	1.4	0.3	0.8	1.7
发展中国家	4.7	4.7	4.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1 月)				
世 界	2.6	1.9	2.5	2.7
美 国	1.6	0.1	1.2	2.3
欧元区	0.4	0.0	0.2	1.3
日 本	2.7	0.8	-0.2	0.4
印 度	6.0	4.9	5.0	5.1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4	0.3	2.5
	9 月	1.5	0.0	2.7
	10 月	1.5	0.2	2.2
	11 月	1.5	0.2	2.4
	12 月	1.5	0.3	2.9
2016 年				
	1 月	1.5	0.5	2.7
	2 月	1.4	0.3	2.9
	3 月	1.2	0.1	2.6
	4 月	1.6	0.3	3.0
	5 月	1.6	0.1	2.7
	6 月	1.3	0.4	2.6
	7 月	1.4	0.5	2.7
	8 月	1.1	0.5	2.6
	9 月	1.3	0.6	2.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0.5	-3.3	3.8			
	10 月	1.9	1.0	3.3	51.1	51.6	51.7
	11 月	1.2	0.3	3.2	51.0	52.2	51.2
	12 月	0.6	-0.9	3.0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9	0.7	3.2	50.9	51.4	51.4
	2 月	1.9	-0.4	3.8	50.0	50.4	50.4
	3 月	1.2	-0.7	3.8	50.6	51.4	51.4
	4 月	1.2	0.1	3.5	50.2	50.4	50.4
	5 月	1.9	-0.2	3.9	50.1	50.0	50.3
	6 月	2.5	0.0	4.3	50.4	50.4	50.7
	7 月	1.2	-0.1	3.5	51.0	52.0	51.4
	8 月	1.8	0.7	3.9	50.8	52.0	51.0
	9 月				51.0	51.9	51.3
	10 月				52.0	53.6	52.8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4 季度	2.3	4.6	-0.4
2015 年		2.6	3.2	1.8
	1 季度	2.0	2.4	2.6
	2 季度	2.6	2.9	3.2
	3 季度	2.0	2.7	1.9
	4 季度	0.9	2.3	1.0
2016 年				
	1 季度	0.8	1.6	1.6
	2 季度	1.4	4.3	-1.7
	3 季度	2.9	2.1	0.5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5	4.3	4.4
	4 季度	1.3	4.5	11.2
2015 年		4.0	0.1	4.6
	1 季度	3.7	-5.8	5.6
	2 季度	4.3	2.9	2.9
	3 季度	5.7	-2.8	1.1
	4 季度	-0.2	-2.7	0.7
2016 年				
	1 季度	-0.9	-0.7	-0.6
	2 季度	-1.1	1.8	0.2
	3 季度	-0.6	10.0	2.3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4 季度	2.5	3.5	0.3
2015 年		2.6	3.2	1.8
	1 季度	3.3	3.6	1.2
	2 季度	3.0	3.4	2.0
	3 季度	2.2	3.1	1.8
	4 季度	1.9	2.6	2.2
2016 年				
	1 季度	1.6	2.4	1.9
	2 季度	1.3	2.7	0.7
	3 季度	1.5	2.6	0.3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5.5	4.3	4.4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4 季度	5.3	3.1	6.1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2015 年		4.0	0.1	4.6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1 季度	4.9	2.2	6.3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2 季度	4.2	0.8	4.5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3 季度	3.8	-0.4	5.1	2016 年								
	4 季度	3.4	-2.2	2.5	1 月	1790.7	-2.2	-6.7	2221.0	-1.1	-5.1	-430.3	
2016 年					2 月	1810.0	1.1	-4.7	2262.6	1.9	0.1	-452.6	
	1 季度	2.2	-0.9	1.0	3 月	1788.0	-1.2	-6.1	2157.3	-4.7	-9.6	-369.3	
	2 季度	0.8	-1.1	0.3	4 月	1815.5	1.5	-5.3	2201.4	2.0	-5.3	-386.0	
	3 季度	-0.7	2.0	0.7	5 月	1813.9	-0.1	-4.7	2233.9	1.5	-3.1	-420.0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6 月	1829.2	0.8	-3.9	2275.8	1.9	-2.5	-446.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7 月	1863.8	1.9	-2.0	2259.3	-0.7	-1.8	-395.5	
					8 月	1881.6	1.0	0.8	2286.2	1.2	-1.1	-404.6	
					9 月	1892.0	0.6	0.9	2256.4	-1.3	-1.3	-364.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716.0		2922.8		-1206.8							
	3 季度	1083.4		1001.7		81.6							
	4 季度	774.2		619.7		154.5							
2015 年		3484.0		3031.8		452.3							
	1 季度	1981.1		932.3		1048.8							
	2 季度	809.4		864.3		-54.9							
	3 季度	429.8		502.5		-72.7							
	4 季度	263.7		732.6		-468.9							
2016 年													
	1 季度	985.1		767.0		218.2							
	2 季度	1533.8		988.1		545.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1.1	0.8	0.6
	4 季度	0.4	0.5	0.1
2015 年		2.0	1.8	1.4
	1 季度	0.8	0.4	0.5
	2 季度	0.4	0.4	0.4
	3 季度	0.3	0.5	0.4
	4 季度	0.5	0.3	0.6
2016 年				
	1 季度	0.5	0.6	0.6
	2 季度	0.3	0.2	0.2
	3 季度	0.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5	4.4	4.8
	3 季度	0.7	1.7	1.5
	4 季度	0.5	1.5	1.4
2015 年		3.2	6.5	6.4
	1 季度	1.6	2.6	2.4
	2 季度	0.0	1.2	0.7
	3 季度	0.6	0.4	1.3
	4 季度	1.4	0.7	1.4
2016 年				
	1 季度	0.5	0.1	- 0.2
	2 季度	1.1	1.2	1.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9 月	0.0	0.9	52.4	10.6
	10 月				10.6
	11 月				10.5
	12 月				10.5
2016 年					
	1 月				10.4
	2 月				10.3
	3 月	0.2	0.2	53.9	10.2
	4 月				10.1
	5 月				10.1
	6 月	- 0.1	0.9	54.6	10.1
	7 月				10.0
	8 月				10.0
	9 月				10.0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1.1	0.8	0.6
	4 季度	1.3	1.2	0.6
2015 年		2.0	1.8	1.4
	1 季度	1.8	1.7	1.1
	2 季度	2.0	1.8	1.3
	3 季度	2.0	1.9	1.3
	4 季度	2.0	1.7	1.8
2016 年				
	1 季度	1.7	1.8	2.0
	2 季度	1.6	1.6	1.8
	3 季度	1.6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5	4.4	4.8
	3 季度	0.9	4.8	4.8
	4 季度	1.1	5.3	5.5
2015 年		3.2	6.5	6.4
	1 季度	2.4	7.1	6.9
	2 季度	2.8	7.2	6.2
	3 季度	2.8	5.8	5.9
	4 季度	3.8	5.0	5.9
2016 年				
	1 季度	2.6	2.4	3.1
	2 季度	3.7	2.4	3.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月份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	(%)		(%)	(%)	口额
2015 年	20430		5.3	17964		2.2	2466
9 月	1732	0.3	0.7	1540	0.4	-0.4	192
10 月	1808	1.8	0.3	1573	0.8	-0.4	235
11 月	1737	-0.1	6.2	1505	-1.3	4.6	232
12 月	1687	1.4	4.0	1437	0.7	3.7	250
2016 年							
1 月	1449	-2.0	-2.1	1397	-0.8	-1.1	52
2 月	1632	-0.3	1.4	1446	0.2	2.0	186
3 月	1792	0.8	-1.9	1504	-2.3	-8.1	288
4 月	1724	0.3	-0.7	1451	-0.2	-5.4	273
5 月	1676	-1.8	2.1	1433	-1.3	-2.0	243
6 月	1799	1.1	-1.5	1501	1.6	-4.7	298
7 月	1677	-0.8	-9.3	1418	1.0	-8.3	259
8 月	1602	2.2	8.3	1419	0.8	3.7	183
9 月	1767	-0.5	2.0	1502	-1.6	-2.4	265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9 月	597.0	298.0	299.0	
	10 月	426.0	405.0	21.0	
	11 月	-450.0	-490.0	-4.0	
	12 月	23.0	75.0	-52.0	
2016 年	1 月	-99.0	66.0	-165.0	
	2 月	220.0	665.0	-445.0	
	3 月	121.0	259.0	-138.0	
	4 月	389.3	446.2	-56.9	
	5 月	458.6	558.6	-100.0	
	6 月	-133.0	-109.0	-24.0	
	7 月	-35.0	158.0	-193.0	
	8 月	141.0	606.0	-465.0	
	9 月	-202.0	-126.0	-76.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4 季度	0.5	0.6	0.3
2015 年		0.5	-1.2	1.2
	1 季度	1.2	0.1	0.2
	2 季度	-0.5	-0.6	0.4
	3 季度	0.5	0.4	0.2
	4 季度	-0.4	-0.8	0.8
2016 年	1 季度	0.5	0.7	0.9
	2 季度	0.2	0.1	-0.3
	3 季度	0.5	0.1	0.4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4 季度	0.1	3.4	1.1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2.0	1.7	1.1
	2 季度	-0.2	-4.2	-1.8
	3 季度	0.2	2.6	1.2
	4 季度	0.0	-0.9	-1.1
2016 年	1 季度	-0.5	0.1	-0.6
	2 季度	1.1	-1.5	-0.6
	3 季度	0.2	2.0	-0.6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4 季度	-1.0	-2.1	0.3
2015 年		0.5	-1.2	1.2
	1 季度	-1.0	-4.1	0.6
	2 季度	0.7	0.1	1.3
	3 季度	1.8	0.4	1.2
2016 年	4 季度	0.7	-1.0	1.6
	1 季度	0.2	-0.2	2.2
	2 季度	0.6	0.5	1.5
	3 季度	0.9	0.1	1.6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4 季度	-3.1	11.2	3.6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3.8	7.4	-0.6
	2 季度	0.7	1.9	0.8
	3 季度	2.4	3.1	1.5
	4 季度	1.8	-0.9	-0.5
2016 年	1 季度	-0.4	-2.5	-1.9
	2 季度	1.1	-0.2	-0.3
	3 季度	0.9	-0.4	-3.1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5 年		-1.4	1.80	3.4
	9 月	-2.6	1.83	3.4
	10 月	0.5	1.86	3.1
	11 月	0.1	1.90	3.3
	12 月	-2.8	1.90	3.3
2016 年	1 月	-4.2	2.07	3.2
	2 月	-1.2	1.92	3.3
	3 月	-1.7	1.90	3.2
	4 月	-3.1	2.06	3.2
	5 月	0.7	2.09	3.2
	6 月	-2.3	2.01	3.1
	7 月	-2.8	2.01	3.0
	8 月	5.2	2.02	3.1
	9 月		2.09	3.0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10 月	62090	-0.1	-2.1	63071	-2.6	-13.4	-981
11 月	62393	0.5	-3.3	61138	-3.0	-10.2	1254
12 月	59674	-4.3	-8.0	58987	-3.7	-18.0	688
2016 年							
1 月	59886	0.2	-12.9	58500	-0.9	-18.0	1386
2 月	58005	-2.7	-4.0	56456	-3.8	-14.2	1549
3 月	58069	-0.1	-6.8	55362	-2.0	-14.9	2707
4 月	57338	-1.2	-10.1	53552	-3.9	-23.3	3786
5 月	56457	-1.3	-11.3	54045	0.9	-13.8	2412
6 月	57429	1.1	-7.4	54064	0.3	-18.8	3365
7 月	56419	-1.7	-14.0	53357	-1.7	-24.7	3062
8 月	56527	0.0	-9.6	52818	-1.3	-17.3	3709
9 月	56773	0.3	-6.9	53188	0.6	-16.3	3585
10 月	57685	1.6	-10.3	52942	-0.5	-16.5	4743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510	159884	-160394
	9 月	-1884	11442	-13326
	10 月	833	16580	-15747
	11 月	1490	13146	-11656
	12 月	1490	14725	-13235
2016 年				
	1 月	177	10377	-10200
	2 月	3154	15885	-12731
	3 月	9592	20913	-11321
	4 月	-3130	7218	-10348
	5 月	3574	9330	-5756
	6 月	12596	15971	-3375
	7 月	18118	23090	-4972
	8 月	-12763	-14072	1309
	9 月	-173	44715	-44888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1	2.3	1.2	-3.8	7.6	-3.7
	1 季度	2.0	2.8	2.5	-2.0	6.7	-2.8
	2 季度	1.0	2.4	1.2	-2.9	7.5	-4.5
	3 季度	1.0	1.9	0.8	-4.5	7.6	-3.7
	4 季度	0.3	1.7	0.5	-5.9	7.2	-3.8
2016 年							
	1 季度	1.2	1.9	-0.1	-5.4	7.9	-1.2
	2 季度	0.9	2.1	0.6	-3.8	7.1	-0.6
	3 季度		2.3				-0.4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6	5.0	4.8
	1 季度	2.4	2.6	2.4	4.0	5.7	4.7
	2 季度	2.2	2.3	3.1	0.6	4.9	4.7
	3 季度	2.8	2.7	2.3	-0.8	4.7	4.7
	4 季度	3.1	2.4	1.9	-0.9	4.5	5.0
2016 年							
	1 季度	2.8	2.4	0.8	-0.3	4.2	4.9
	2 季度	3.3	2.5	1.7	0.7	4.0	5.2
	3 季度	2.7	2.0	1.9	2.1	4.3	5.0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10 月	7.0	5.2	8.9	5.5	
	11 月	7.1	5.1	9.0	5.8	
	12 月	7.1	5.1	9.0	5.8	24.5
2016 年						
	1 月	7.2	5.1	9.5	5.8	
	2 月	7.3	5.1	10.2	5.8	
	3 月	7.1	5.1	10.9	6.0	26.7
	4 月	7.1	5.0	11.2	5.9	
	5 月	6.9	4.9	11.2	5.6	
	6 月	6.8	4.9	11.3	5.4	26.6
	7 月	6.9	4.9	11.6	5.3	
	8 月	7.0	4.9	11.8	5.2	
	9 月	7.0	4.8	11.8	5.2	27.1
	10 月	7.0			5.4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10 月	3.4	4.6	3.3	3.8	3.1
	11 月	3.5	4.0	3.3	3.8	3.2
	12 月	3.5	4.0	3.3	3.9	3.4
2016 年						
	1 月	3.5	4.2	3.3	3.9	3.4
	2 月	4.1	4.2	3.3	3.9	3.4
	3 月	3.8	3.7	3.4	3.9	3.5
	4 月	3.7	3.8	3.4	4.0	3.5
	5 月	3.7	4.0	3.4	4.0	3.4
	6 月	3.6	3.9	3.4	4.0	3.4
	7 月	3.6	4.0	3.4	4.0	3.5
	8 月	3.8	4.0	3.4	4.0	3.5
	9 月	4.0	4.1	3.4	3.9	3.5
	10 月	3.7		3.4	3.9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9 月	345.6	347.9	-2.3	392.5	534.3	-141.9	10 月	433.5	367.6	66.9	341.0	364.9	-23.9		
10 月	336.2	353.2	-17.0	380.2	574.7	-194.5	11 月	442.9	340.5	103.5	310.2	333.9	-23.7		
11 月	322.3	337.0	-14.7	377.4	532.9	-155.5	12 月	423.8	354.6	71.4	311.7	326.8	-15.1		
12 月	335.0	318.0	17.0	406.4	468.3	-62.0	2016 年	1 月	362.7	313.4	49.3	246.9	287.3	-40.4	
2016 年	1 月	307.8	292.1	15.7	315.8	451.0	-135.2	2 月	359.3	291.4	67.8	289.7	305.4	-15.7	
2 月	300.7	311.5	-10.8	343.4	497.4	-154.0	3 月	430.1	333.2	96.8	314.9	322.1	-7.2		
3 月	329.0	345.1	-16.1	350.7	568.5	-217.8	4 月	410.8	323.8	87.0	304.2	333.8	-29.7		
4 月	312.7	342.9	-30.2	352.3	580.9	-228.6	5 月	397.4	330.0	67.4	313.2	326.9	-13.7		
5 月	315.3	343.6	-28.4	340.5	525.8	-185.3	6 月	452.1	338.4	113.7	319.4	333.4	-14.0		
6 月	331.7	358.2	-26.5	350.2	572.2	-222.0	7 月	408.9	333.7	75.2	297.7	324.5	-26.8		
7 月	302.6	321.9	-19.2	314.2	524.5	-210.3	8 月	401.3	350.2	51.1	324.2	352.7	-28.5		
8 月	336.1	356.1	-20.1	306.8	542.4	-235.7	9 月	408.6	339.5	69.1	326.2	351.5	-25.3		
9 月	336.5	361.8	-25.3	335.5	600.2	-264.7	10 月	419.7	350.0	69.7	325.9	344.0	-18.1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进出口贸易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10 月	63.0	79.5	-16.5	160.5	146.3	14.2	10 月	450.1	485.9	-35.8	244.5	187.1	61.3		
11 月	66.0	65.8	0.1	138.1	131.7	6.4	11 月	454.6	480.9	-26.4	226.0	204.6	27.5		
12 月	58.5	53.7	4.7	167.8	110.2	57.6	12 月	468.8	500.8	-32.0	225.5	184.0	41.7		
2016 年	1 月	42.6	54.5	-11.9	112.5	107.2	5.2	2016 年	1 月	406.4	425.0	-18.6	221.9	186.8	35.2
2 月	57.3	58.0	-0.7	133.5	107.6	25.9	2 月	290.2	332.2	-42.1	177.6	136.2	41.4		
3 月	61.7	60.2	1.5	159.9	120.6	39.3	3 月	400.8	429.9	-29.1	227.2	182.2	45.0		
4 月	62.7	63.0	-0.3	153.7	109.8	44.0	4 月	413.6	417.3	-3.6	222.4	174.5	48.0		
5 月	68.0	56.0	11.9	175.7	115.9	59.8	5 月	436.5	436.2	0.3	235.4	200.4	35.0		
6 月	69.5	61.5	8.1	167.4	133.3	34.2	6 月	433.9	470.5	-36.6	228.7	193.0	35.7		
7 月	66.3	62.8	3.5	163.3	122.5	40.8	7 月	461.8	467.0	-5.1	241.0	205.2	35.8		
8 月	65.3	71.8	-6.5	169.9	134.1	35.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7	39.8		
9 月	70.5	65.8	4.8	158.0	125.2	32.8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9	43.7		
10 月				137.2	118.7	18.5	10 月				267.5	223.7	43.8		
表 33 进出口贸易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10 月	214.6	311.5	-96.9	269.6	169.1	100.5	10 月	177.5	149.1	28.4	121.2	111.1	10.1		
11 月	195.3	297.0	-101.7	254.0	164.6	89.4	11 月	156.8	133.2	23.6	111.1	115.2	-4.1		
12 月	225.5	340.8	-115.3	287.5	174.4	113.1	12 月	159.5	140.0	19.5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211.0	287.6	-76.6	170.6	98.5	72.1	2016 年	1 月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208.1	272.7	-64.6	200.2	129.0	71.2	2 月	135.5	117.9	17.6	113.1	101.8	11.4		
3 月	227.9	270.0	-42.0	231.7	154.5	77.3	3 月	163.3	135.9	27.5	118.1	113.0	5.1		
4 月	208.3	257.5	-49.2	217.4	152.2	65.3	4 月	157.1	133.9	23.2	114.8	108.1	6.6		
5 月	223.6	283.3	-59.7	220.6	144.6	76.0	5 月	148.1	140.0	8.1	115.1	111.4	3.7		
6 月	228.1	310.9	-82.7	240.9	159.7	81.2	6 月	162.6	149.1	13.5	129.7	121.0	8.8		
7 月	217.1	294.8	-77.7	225.3	160.4	64.9	7 月	148.9	144.2	4.7	95.3	90.2	5.1		
8 月	215.2	291.5	-76.3	233.0	183.8	49.3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228.8	312.2	-83.4	255.5	181.6	73.8	9 月	165.7	147.3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235.1	336.7	-101.6				10 月				126.8	114.7	12.1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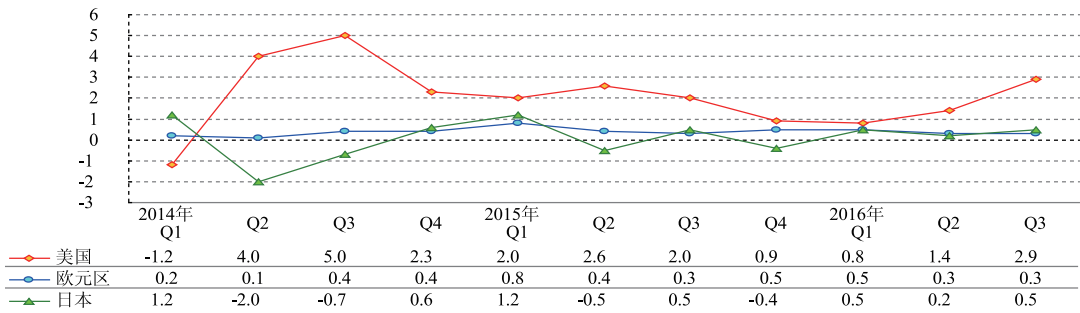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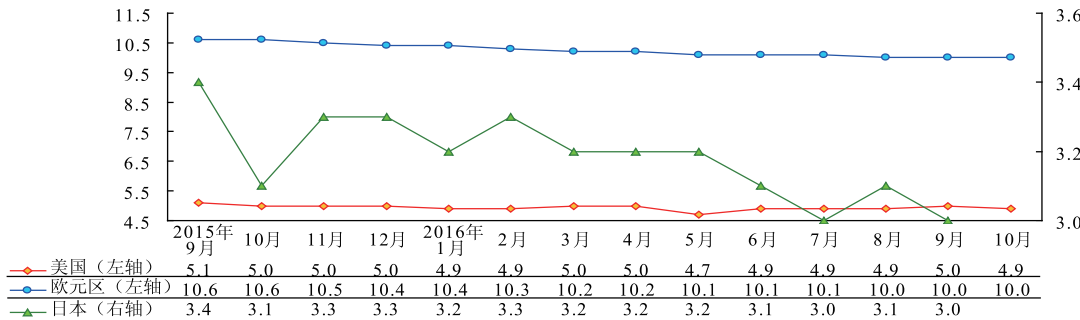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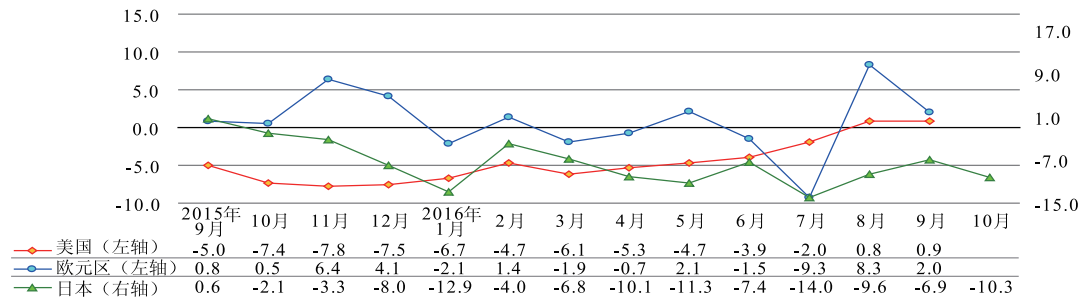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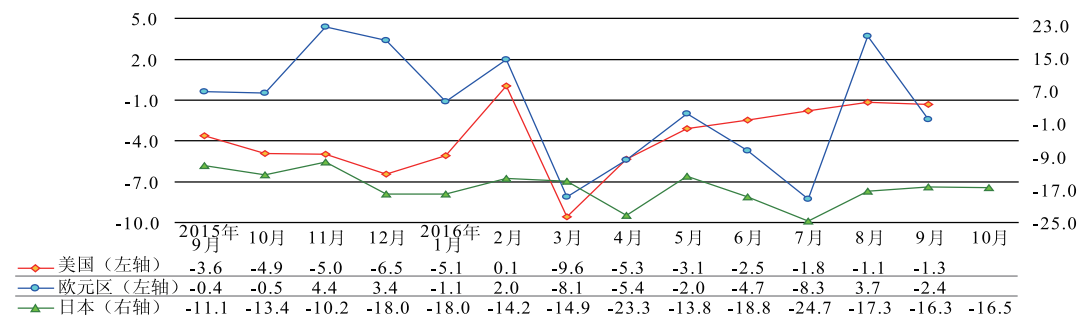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1~图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in the future

Wei Liquan

At present,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is lack of power, the uncertainty is increasing,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twists and turns, both develop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are facing the urgent task of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hina’s promo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a richer conno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a large economy to economic pow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six areas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green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consump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changing economic growth mode, improving the opening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choose a good path and ensure the two aspects of a good grasp of the new development idea and adherence to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2)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largest new momentum

Zheng Xinli

Forming new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b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to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from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to policy measures. The reasons wh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been able to create economic miracle are continuing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o undergo three major conversions. At present, we should mainly focus on three thing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to have citizenship,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form 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al property rights of farmers on the l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opening the lak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the capital market,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equal public services for farmers settled in the city.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form needs to clarify four errors in our understanding.

(3)Logical thinking and realistic observa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Huang Zhiling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argues that overproduction leads to the block of value circulation, reproduction difficult to continue, leading to economic recession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then the outbreak of credit default ma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llapse of a large number, resulting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economic crisis especially the subprime crisis in 2007 showed the economic bubble boosted by macro – policies burst in the rapid tightening of monetary policy, causing massive credit default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n transferring to the real economy, resulting in economic crisis caused by the economic recession. Based on the post – subprime – crisis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Chinese economy,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the log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crisis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at this stage and the key points needed to pay attention to. Combin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judgment tha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ight happen again at a very low probability in the short term.

(4)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of Germany nursing service industry

Song Qun, Jiao Xueli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Germ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the Sino German Pension nursing training project, choosing three pilot cities: Chengde, Zigong and Guiyang city. The project plans to implement the four phases of training activities, targeting at senior managers and middle managers of pilot city nursing homes, hospita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and workers and hospital nurses of nursing home care. Two trainings were completed in 2015. Through training and research we found that, because the nursing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not complet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guidance are lagging behi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ursing service industry are seriously affected. We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 from Germany, and carry out top – level design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cal support combined nursing services.

(5) The evolution and crisis of the Wall Street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Chen Jinming, Ren Zaiping, Li Guoju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dollar – Wall Street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establishment, evolution and its crisis of the dollar – Wall Street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the dollar – Wall Stree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on the euro,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and other emerging currency, by creating a bubble index and analyzing the early warning valu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ssence and origi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generated by the crisis, and th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some warning and reference for Chinese FTA financial reform.

(6)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 dynamic perspective

Li Yongjia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volue of service industry, the per capita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opening – up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long – term growth situation of 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ses China’s service industry’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future trend of growth. Research shows that, although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growing rapidly, the total amount ranks the second highest in the world,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from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world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percentage of service sector over GDP, per capita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dustry’s external growth.

(7) New international tax order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strategy of BEPS

Zhen Zhe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tax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transfer (BEPS)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tax topics in the world. After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order and BEPS based strategy and combing the practice on BEP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China can adapt to the “BEPS action plan”,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f promo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tax discours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of fair and reasonable tax,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ax sovereignty countries to prevent tax loss and maintain cross – border tax balance, promote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to form profit the new situation of profit – sharing and international tax base of healthy competition, mor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BEPS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tax China that conforms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the state a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8) The influence of African countries'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Cheng Zhigang , Li Rui

At present,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tepped into the middle or middle – late leve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is in the bud, Chinese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root in Africa. Africa has the potential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China enterprises in Africa highly depends on the polic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ving higher enterprise operation cost, the shortage of skilled workers, and low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African countries provide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China enterprises, such as land, taxation, em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9)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how to financially support “going out” enterprises in China

Zhu Jie, Ren Chaofe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o out” situation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enterprises, and examin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upport enterprises to “going out” by government support,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sur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for example by sign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hina’s “going out” enterprises; at financial aspects should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create more financing products, shorten the financing chain, reduce the cost of corporate financing, broaden the financing channels for enterprises; at insurance aspect, should improve the insurance market system, broaden the source for insurance fund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insurance market and insurance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s; at enterprise aspect, should adhere to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channels to raise funds for constru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enterprise core ability construction, implement loc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event all possible risks.

(10)Constructing recycling c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Yang Liang, Chen Boping

China’s urban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facing severe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imperativ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dicate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s not only to reduce th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of circular city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institutional, financi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comfortable. healthy and participatory and service cities. It also mean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ity’s energy and resource self – sufficiency rate, improve the city’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adaptation capacity. Circular city also reflects China’s “new normal” mode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beneficial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eople – oriented, middle – speed of development, encouraging innovati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rcular city requires decision – makers to have long – term vision, strong political determination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encourage cooper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 make full us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mote the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 the entir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Editor: Huang Yongfu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2183

欢迎订阅 《全球化》 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2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5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7 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 元/年（12 期）	总计金额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